

血红的土地

—— 中共土改采访录

谭松 著



谨以此书

祭奠歿于中共土地改革的亡灵

守住我们民族苦难的历史

在中共专制下的中国，有一个群体：他们最早遭受迫害，受迫害所持续的时间最长，受害的人数最多，程度最深；至今没有得到平反，更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他们的苦难也被遗忘得最彻底——这个群体就是地主和富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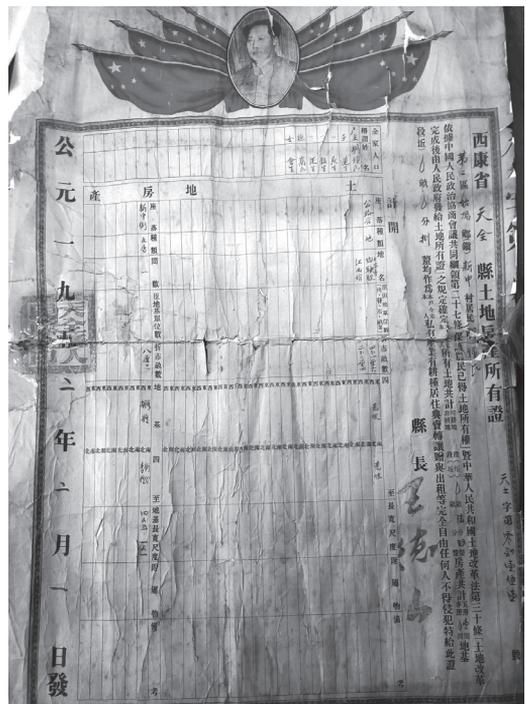
地主富农是中共专制下最大的受害群体，估计总人数至少有两千万以上。1979年，中共宣布给地富“摘帽”，此时距土改已有三十年，绝大部分地富都已经死掉。据《北京周报》报导，被摘帽的地富还多达400万。土改中一共杀了多少地主富农？保守的估计也在200万以上。（胡平）

土改过去半个多世纪，地主尸骨早已灰飞烟灭，悲惨的记忆渐渐淡漠……土改的罪恶将随着人世沧桑而湮灭。人类的良知呼唤正义，呼唤历史的真实，幸存者有责任把当时的真相告诉后人。（陈沅森）

土改是我所知道的最血腥的运动，它采用最下流最残暴最野蛮的手段去侮辱与迫害一些没有任何罪过也完全没有反抗能力的人。一个普通的民兵可以任意剥夺别人的生命。在人类朝着文明社会前进的过程中，出现如此黑暗如此野蛮如此残暴的迫害是不可思议的。（胡永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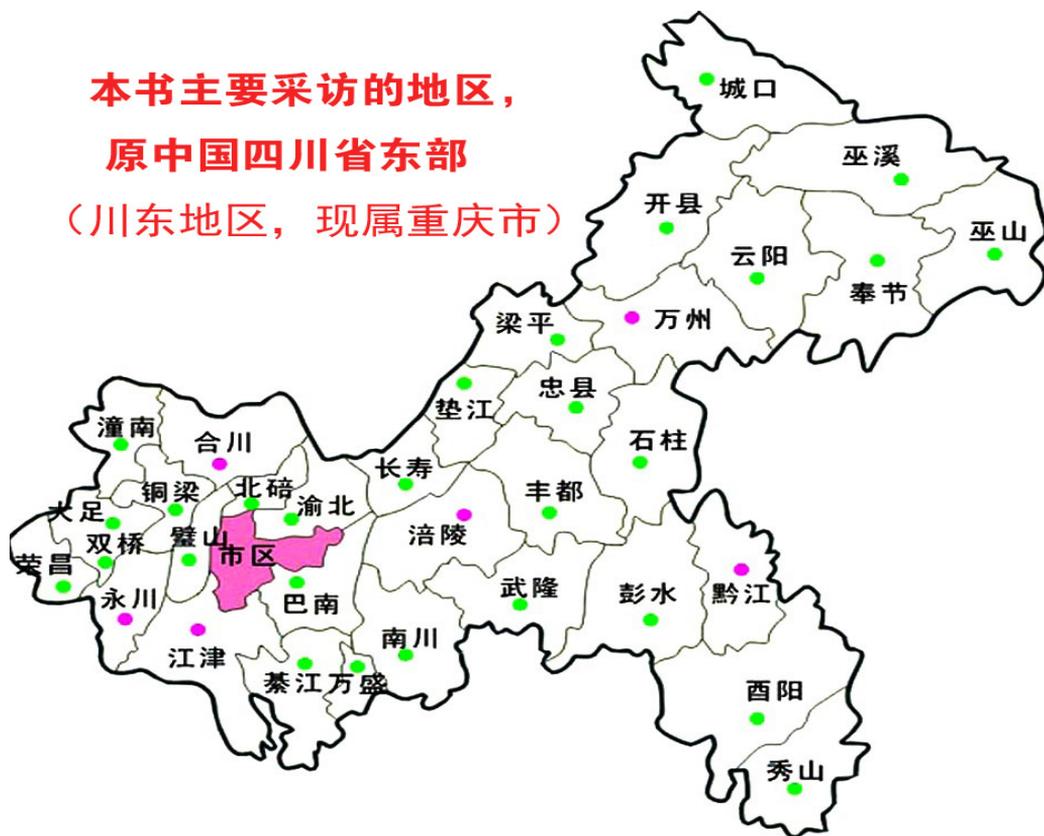


镇反、土改时的杀人现场



土改时四川广汉县和天全县农民分到的“胜利果实”——

**本书主要采访的地区，
原中国四川省东部
(川东地区，现属重庆市)**



川东丰都县

蜀人何以得譚君？

——譚松教授新作《血紅的土地》序

辛灝年

一、同是神州亡命人，相逢相惜在金山

我第一次見到譚松先生，是在舊金山。

我不是一個喜歡趕場的人。今年的「六四」，我卻因路過舊金山而趕上了這裡的紀念會。遇上了，就不能不參加，因為這是紀念「六四」的死難烈士們。過去，但逢此日，我都是在家裡「默然一天」。可是，這一次卻是躬逢盛會——舊金山參會的就是多。在聽了許多的發言，特別是聽了那些年輕人激越的「革命言辭」之後，我原來和大家一樣有些壓抑的心情，顯然鬆快了許多。

正在我因為一個又一個年輕的發言人而感到難得的興奮時，一個名字忽然被主持人趙昕先生喊了出來。我心裡不覺一動——是他。

他走到了臺上，我看到了他那張毫不見老的臉——一條「漢子」的臉，雖然嚴肅，卻含著幾分笑容，作派也是落落大方，既不失一個知識人的斯文勁，又顯然讓人感到他身上藏著股「定力」。尤其是他那雙黑黑的劍眉下，那一對目光銳利的眼睛滿透著堅毅之情；還有那寬闊厚實的胸膛，會立即讓人感覺到他是一個有氣勢、有力量、想擋也擋不住的人。

「他就是譚松。」我在心裡輕輕地、卻不無欣喜地叫了一聲。

他講的我全聽進去了，他講的我全部同意。我從他講的那些話裡，感到他正是我孜孜難求的那種人——而今一個有理想、有人格、有膽量和令人欽佩的知識分子。在千千萬萬陷落在「民主自困」中的當代中國知識人裡，他毫無疑問地可以稱做一個「出類拔萃」者。尤其是在我聽到他敢於在安裝著攝像頭的大學教室裡，公然告訴「無知」的新一代，「中共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那一天，對北京的學生和市民施行了大屠殺」時，我不能不從心底裡對他湧出一個真正的「敬」字來。在海外，能夠喚起我如此這般激情的機會，實在是太少了。雖然他曾七次失去了工作，也曾因寫作被中共當局抓捕關押，但是他矢志不渝，絕不似海外一些因「名利之誘」便極易「變節」的所謂民運文化人。

會議結束時，他發現了我，便客氣地喊著「辛老師」，穿過人群急急地走了

過來，拉著我的手大聲地說：「今天沒想到能見到你，真是太高興了！」他那一口爽利的四川話，帶著四川話特有的起伏節奏，還有那股子川味，聽起來讓人感到十分真誠。我打小就喜歡聽四川人說話，抗戰的整個歲月，我的父母和兄姐們都是在陪都重慶度過的，雖然那個時候還沒有我，但是後來哥哥姐姐們在家裡常常要說幾句四川話的興頭，還是讓我從小就喜歡上了四川話那種特有的韻味。

我為他的熱情所感染，緊緊地握住他的手，開心地說：「我可是一直在關注著你！」

當天晚上，因著名報人陳凱兄「強行」宴請，我們幾個人便在唐人街的一家中餐館邊吃邊談，我不時地為他的豪情所感染，也為他「自找」的命運所感嘆，更因為海外來了一個真正的戰友而欣喜，因為這樣的戰友實在是太少了。

他還向我介紹了一位曾不畏凶險地製作土改紀錄片，挽救「血史」的年輕女大學生丁然。譚松是在擔心中共會對她下手時，匆匆叫她出走美國的。可是，沒想到剛跑掉了學生，他這個老師又因為「為地主翻案」而被學校開除了……。聽著他們那些驚心動魄的故事，我心中不覺暗暗感慨「真是有什麼樣的老師，就有什麼樣的學生啊！」。這個晚上我很開心，因為我見到了一對勇敢的師生。

我沒有想到的是，後來，譚松教授卻要我為他的一本新作寫序。這本新作的沉重和重要，還有它對我們時代所必將產生的重要影響，使我無法推卻，何況我們本應「相逢相惜」。

二、山河變色民血濺，枉殺地主為哪般？

這本書的名字，叫做《血紅的土地》，是譚松用十多年時間主要在川東地區跋山涉水採訪之後寫作的，更是譚松為搶救歷史，在那片曾被人血所浸透的土地深處發掘出來的一塊又一塊、一堆又一堆的「血化石」。歲月和土地無聲地凝化了它們，為不讓這個無情的世界忘卻千千萬萬被共產黨殺害在這片土地上的無辜地主們，譚松的書，就是這一塊塊一堆堆「血化石」的精靈，並且它就要化身人間，向世人揭示那一段被掩蓋塵封的歷史。

我是在旅途中讀完這部書稿的。在旅途中，我懷著憐惜、痛苦和種種恐怖的心理，在手中、更在心裡，撫摸把看著這一塊塊透涼的「血化石」。淚水曾一次次滲進了我的眼眶。我的家族中也不乏受害的冤魂們。我在昏朦的淚水裡，彷彿又看見了共產黨的刑場：那血紅色的標語、那高舉起的拳頭、那冒著血煙的槍口、那一陣陣的喊殺聲、那轟響著的槍聲、那地主們腦漿四濺的頭顱和他們還在抽搐著的血身……這曾是我少年時曾不止一次親眼見過的可怕景象，未想到，它們竟

因譚松的書稿，一次又一次地重新閃過我的腦海，錐子一般地扎痛在我的心頭。

這是一本鮮血淋漓的真實史書，是一次血的鋪陳、血的祭奠、血的控訴和血的反思。它記錄了「中華民國大陸淪陷區——毛管區」的川東地主們，是怎樣在共產黨的「新中國」剛剛登場時，就被血流成河的土改奪去了生命；它更記錄了「毛管區」的人民又是怎樣在土改和幾乎同時進行的鎮壓「反革命」殺人潮中，被迅速地奪走了魂魄的。作者的採寫是那樣地艱難，不僅有被跟蹤、被追捕、被開除和被判刑的危險，更有採寫的結果被收繳、被毀滅的可能，但是，作者冒著種種風險，堅持多年，挖掘了一段被塵封的流血歷史，記錄了一幅真實的土改畫面，這既是還原歷史真相，也為中共土改的研究提供了極其實貴的第一手史料。

作者不僅採訪了轉眼就會謝世的幾個老地主、採訪了地主後代——「一個龐大受難群體」中的尚存者們，還著重採訪了那些本鄉本土的土改經歷者，去「聽他們講那過去的故事」。此外，還有當年站在土改舞臺上的各色人物——他們中自然不缺土改時期的作惡者。雖然年代久遠，存者稀稀，但這樣的採訪也就在「廣泛性」甚至「全面性」上無可挑剔。同時，如此採訪所呈現出來的真實性，也就難以質疑。因為無論是從主觀面而言，還是從客觀面而論，他都不是「一家之言」，而是「眾口一詞」，作者採寫這段歷史沉冤的嚴肅性也因此可見一斑。譚松在土改問題研究上的建樹，已經成為照耀著他全部採訪記錄的理論之光，當然這也是在他廣泛調查、普遍採寫的感性基礎上昇華凝練而成的。換言之，這本書正是在感性認知和理性認識的高度結合中，還原了土改血史和認識了土改血史，並因感性和理性二者兼備而達到了很高的「審美」境界。雖然，這一由鮮血凝結而成的「美」（指認識的真切深刻而言），卻蘊藏著歷史所絕不該有的那一幕幕曠古悲劇。

由是，譚松明確地指出了，中共的所謂「土地革命」，不僅是中共「奪得天下」的法寶，還是「中共坐穩天下的絕招」，更是中共統治集團在「土地財政」中「享樂天下的盛宴」。他從共產黨「土地革命」、「土地革命目的」和「土地革命方式」之從何而來，為中共殺人土改提供了歷史的動機和源頭。要在中國發動「土地革命」，是史達林早在1926年就欽命予中國共產黨的（註1）；「土地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殺光地主豪紳」，這是同年由蘇共代表羅馬拉茲為中共起草的兩個決議確立的（註2）；「土地革命的先鋒隊和主力軍就是農村的流氓地痞」，則是毛澤東早在1927年初就為中國共產黨公開指明和實踐至今的（註3）。所以，中共篡國建政之後的大規模殺人土改才有了他歷史的來路、現實的目的和慣用的手段。

所謂現實的目的，一是為了穩固政權，二是經濟面臨破產。

就前者而言，作者說得很清楚，篡國建政之後，中共心中明白，只有穩固了農村，才能夠真正穩固到手的權力，才能真正地坐穩大陸江山。怎樣穩固？就是

發動他們早已諳熟的殺人土改。而且也正是中共殺人土改的「圓滿」成功——即「恐怖統治」的形成，才造就了中國農村的長期穩定。20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過：「根據中共中央『將土改中打擊面規定在新解放區農民總戶數的百分之八，農民總人口的百分之十』的指示精神，至少有三千萬農民遭到批判鬥爭和非刑折磨，至少有二百萬以上的地主遭到鎮壓並被剝奪所有財產。特別是當鎮壓反革命運動接踵而至時，中共在農村對地主大開殺戒而建立專制新秩序的願望，遂迅即得以實現。……土改後，許多地方單幹的農民一聽說要重新劃成分，就立即哀求入社，這只能證明農村的極權專制秩序確已建立無疑。」

悲慘的歷史事實是，中共極權統治 69 年，殺得最多的是農民，勞改最多的是農民，討飯最多的是農民，最苦最窮的是農民，做了奴隸的是農民，餓死的幾乎全是農民！同時，被「戶籍」封死了人身自由的是農民、被壓迫在最底層的還是農民、被今日之共產黨視為「盲流、農民工和「低端人口」（即「賤民」）的，更是農民！當代中國農民所遭受的苦難，是他們在數千年中國歷史上所遭遇的苦難加起來都不能相比的。但是，共產黨時代的農民，卻無法像歷史上的中國農民那樣，既出不了陳勝、吳廣，也出現了不了張獻忠和李自成……為什麼？就是從土改起，中國的農民便被共產黨殺怕了！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蔣介石在向「國民會議」遞交的「剿滅赤匪報告」中，曾描述三十年代中共在農村中的暴行：「受赤匪荼毒最烈而最慘者——厥唯江西和湖南……凡是過去在村莊上有體面的乃至地主或是做過保甲長的人，皆連同親屬被殺害，到處可以看見一個坑裡埋著十人，或者百人。在死的恐懼面前，人民除了聽從，還有什麼辦法？」（註 5）

就後者而論，中共在大陸篡國建政伊始，整個社會幣值大跌，物價猛漲，各地商品滯銷，處處廠家倒閉，北京政權的年稅收，居然超過「九一八」事變之前南京政府年稅收的三倍。再加上幾與土改同時發動的所謂「抗美援朝」戰爭，需要戰費一百萬億，這對中共造成的壓力可想而知（註 6）。於是，毛澤東遂在一九五〇年六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發表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的報告，也就是說，中共要「動手」了！而動手的第一個大動作，就是藉口土改而大殺地主，大劫其財。動手的第二個大動作，就是鎮壓反革命。鎮壓反革命運動剛剛發動起來，中共就立即發布了「關於沒收戰犯漢奸官僚資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財產的指示」。因為，面臨經濟就要破產的中共和還要「抗美援朝」的中共，只好沿用他慣使的「匪徒」手法，同樣要藉「鎮壓反革命」這個大好機會來進一步殺人斂財。

在譚松的這部採訪錄中，處處都展現了中共公開屠戮無辜地主，並對之進行

「殘殺」、「姦殺」和「逼財而殺」的種種情景。整個殺人土改，都是由中共流氓領袖們親自指揮各地農村裡的流氓地痞全面發動的。所以，中共土改的「殘暴性」、「創造性」、「對人性及人類良知的滅絕性」，以及對所有地主子孫們造成的可怕命運和痛苦人生，在中國的歷史上堪稱絕唱！在世界歷史上，也只有蘇聯的列寧、史達林和柬埔寨的波爾布特等共產黨殺人政權才能與之相比。在中國的史書上，兩千多年前，就有人說出了「君子不虐幼賤，畏於天地」的話。但是，在這本採訪錄中，那個遠遠超過「垢莫大於宮刑」，卻同樣被「催折了陽根」的老地主李曼的血淚控訴、那些被土改民兵們輪姦致死的地主女兒們的悲苦冤魂、那個「丈夫被槍殺 / 女兒被餓死」的「地主婆」的悲慘人生、那要專門槍擊地主「天靈蓋」的惡毒用心以及對地主們使用「炮烙之刑，開膛挖心，點天燈……」等各種各樣的非人酷刑，無一不讓我們再一次深刻地體會到毛澤東那句「流氓地痞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的「革命真諦」！

必須一問的是，中共當真是想通過土改，將剝奪的地主土地分給農民嗎？當然不是，因為轉眼之間，共產黨就用種種辦法強迫農民交出了土地。從此，中國廣大農民被迫走向了所謂「集體化」，即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現身的「農奴制」。書中所引用的董時進先生在1951年所說的話，實在是妙不可言。簡言之，中共是將他人的土地和財產分配給農民的，但很快中共就用所謂「合作化、集體化和公社化」將農民手中的財產變成了「國產」——實際上的「黨產」，以至今日才有「黨賣國土，民無私田」這樣一個史所未有之離奇景象的出現。

正如作者所說，中共層層統治集團正是因為擁有了「賣不完的國土，鬧不完的血撤」，才有了今日那一桌桌似乎是「享樂不完的天宴」。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就是中共發明的所謂「土地財政」。本書後面作者對於中共「土地財政」的研究所得，委實應該認真一讀。

同時，作者還徹底和深刻地批判和否定了中共的所謂「社會主義公有製」。這使我想起，1986年11月11日，在武漢大學的千人講演會上，當在座的師生有人問我應該怎樣看待中共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時，我未暇思索便一口答道：「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就是中國層層統治集團中人最完美無缺的私有制！」一時掌聲大嘩。

但是，三十多年之後，當我在海外讀到譚松先生對中共「公有制度」的詮釋和譴責時，我則不能不心悅誠服。因為譚先生正是從對土改的研究開始，將共產黨的公有制的建立和發展，解剖得淋漓盡致。而殺人土改，就是中共奪權後實施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開始。因為，只要中共在消滅了農村地主階級的私有制，又迅速地強迫人們走上了集體化和公社化之後，中共就牢牢地將農民的「生

命線」攢在手心裡了！共產黨「革命」時曾說：是農民養活了地主，工人養活了資本家。可是，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共產黨一直在說：「是共產黨養活了全中國的人民。」要知道，中共是在「消滅私有制」的大旗下發動殺人革命的，而社會主義公有制，就是在這杆大旗下用血淋淋的槍彈和刺刀來實現的。

中共從土改發明「土地財政」便已經開始了的「享樂天下的盛宴」，就是這樣地一直擺到了今天。而今，其鋪張之宏麗，饕餮之大觀，實為當今世界之最。然而，在他們那朱華無比的流水宴裡，是不是早已噴射著中國千千萬萬地主們潑地的鮮血，更流淌著當今中國億萬人民的膏血呢？

它們還要「潑流」到哪一天？

三、九州本是堯舜國，何來馬列奪魂魄？

有必要說明的是，就算中共發動土改有其「不得不為之」的政治、經濟和戰爭等原因，中共也不必非要將土改搞成一個可怕的、甚至是瘋狂的殺人運動和酷刑運動。中國歷朝歷代的開國皇帝和新登基的帝王們，其首要之策，都是「大赦天下」而不是「大殺天下」。敗退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幾乎是同時發動了台灣的「和平土改」，非但不曾殺害一人，卻在政治、經濟、特別是民生等各方面，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如果一定要追溯中共非要進行殺人土改不可的思想政治和歷史文化緣由，那麼，譚先生的這本《血紅的土地》倒是為我們提供了極為深刻的認知。

一個嚴峻的世界性的事實是，近代以來，在歐洲民主革命的大浪潮之間，出現了一家新的、被稱作「馬克思主義」的「共產教」。它誕生在十九世紀，卻處處與十九世紀歐洲的民主大潮反向而行。它不僅攻擊由民主革命所創立的各民主國家為「資產階級共和國」，而且還要在「消滅私有制」的旗幟下，發動世界革命，以推翻這些「資產階級共和國」，建立「無產階級的專政國家」。其手段，就是通過發動階級鬥爭，換言之，就是發動大規模的殺人革命，以進行血腥的「階級制裁」。制裁的對象，就是資本家、地主和富農。還有，任何一位被認為是反對他們「革命」的人，即被他們裁定為「反革命」。

半個多世紀後，有著特殊歷史基礎和社會基礎的俄國人，終於根據馬克思的階級革命理論，推翻了本國剛剛因爆發民主革命而建立的「二月民主政府」，剿滅了剛剛拉開民主憲政帷幕的國民大會，消滅了剛剛創立的「俄羅斯共和國」。從此，列寧和史達林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階級鬥爭，施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階級大屠殺。其慘烈和血腥，竟遠遠超過了中世歐洲「為教殺人」的千年宗教統治時期，並終於重新建立了歐洲歷史上最殘酷的「靈肉雙治」的「宗教極權統治」。

本書作者正是因為看透了這個至關重大的歷史、政治和文化癥結，所以，他才在該書中，揭示了中共發動殺人土改的根本緣由，實際上就是中共公開「為教殺人」的一個血腥大開端。當然，這個「教」，就是中共自一九二零年八月起（註 7）就已經正式信仰的「共產教」及其「馬列神」。其殺人方式和手段，也與蘇俄當年一模一樣，乃有一個統一的「宗教殺人模式」。

本書作者是用他的採訪錄和他的土改理論研究，來說明中共殺人土改的外來性質和馬列「惡教」行徑的。共產黨派遣的土改工作隊下鄉後，首先就給那些主要由流氓地痞組成的「土改積極分子」灌輸馬列的階級鬥爭理論，簡言之，就是灌輸馬列教的「殺人教義」，即為什麼要殺地主的政治理由。然後在這個「殺人教義」的指導下，按照中共「階級鬥爭是可以調節的」（毛語）的「靈活」政策，結合當地的情形，開始對本地農民劃分階級。階級成份一經劃定，便立即將該「革命教義」與共產黨及當地流氓地痞的「革命要求」相結合，召開群眾大會，公開批鬥地主，逼迫地主交出土地和錢財，並公開使用各種酷刑折磨他們，最後將他們公開處死，甚至還要他們死得「很難看，很恐怖」——這就是共產黨領導下，大陸各地流氓地痞對地主階級進行殘酷階級鬥爭和實行殘暴專政的「勝利」過程。

所以，殺人土改是由外來的「洋教階級鬥爭和洋教階級專政的教義」所支撐的、是以蘇共如何在俄國農村大殺富農、奪命搶財的野獸行為作為榜樣的。誠如書中所記述的那樣，當有農民同情某個地主時，一位土改民兵隊長竟然會用一句極粗野的話罵出了「共產教」的殺人真理：「狗雞巴你不懂階級鬥爭嗦！」這個殺人的「洋教教義」就是這麼簡單和迅速地通過中共的土改，滲透進了所有中國人的靈魂。此其一。

其二，中共利用殺人土改來實行「為教滅族」。滅誰的族，當然是中華民族。彼時的中共確信自己已經消滅了「資產階級的共和國——中華民國」，接著，就要根據「共產教」的教義和史達林的旨意，來讓中華民族「脫胎換族」了！

譚先生揭露的手段之一，就是中共利用土改大殺中國鄉村地主，以此來摧毀中華傳統社會和現代民國社會在中國廣大農村的社會政治基礎。在傳統中國和民國社會，通常都是縣以下不設政權。中國廣大農村社會，除卻非正常時期以外，都由農村中的地主鄉紳們來從事管理。作者在書中說得好，中國農村中的地主鄉紳主要從事的社會公共事務，就是「興辦教育；興辦公益慈善事業；調解糾紛，主持公道」。

他們在相當程度上不僅頂替了政府的一部分職能，而且比政府更能夠「善解鄉情，普及公義」，甚至更方便和更能夠減少與化解農村社會階層間、團體間和個人間的不應有對抗。在完備的民主法治時代還沒有到來之前，它曾在數千年中，

成為中國 農村社會管理的主要方法；在民國建立以後，它同樣是農村民主法治建立過程中的主要協助力量。民國開元，孫中山和宋教仁等赴農村舉辦選舉，協辦者均為本地的鄉紳地主。中華民國在傳統上與中國的歷史一脈相承，中華民國的農村地主們也都是接受和贊成民國的。

但是，中共奪權篡政之後，其重大的「開台大戲」之一，就是發動土改殺盡地主鄉紳，扶之以流氓地痞所建立的共產黨農村政權，這就不單是將中國的民間社會 徹底毀棄，而且將中華民國農村社會的政治基礎全部地毀滅了。其結果，就是中共的所謂「新中國」，從根本上脫離了中國五千年的社會傳統，脫離了民國的共和國 統和法統，而用前蘇俄的社會體制，明確地取代了我們民族自身的社會政治體制，造成了我們民族之整個社會生存環境的徹底改變。從此之後，大陸的「中國」還是中國嗎？

手段之二，就是中共用大殺中國鄉村地主來「摧毀中華傳統社會和現代民國社會在農村的文化基礎」。因為在「舊」中國的農村，誠如作者所愷切指出的那樣：「地主和鄉紳們大都是農村中的文化人士，是當時鄉村的文化精英，具有較好的道德素養，儒家忠孝仁愛禮義廉恥的薰陶在他們身上體現得最深也最普遍。」同時，「地主大多是農村中最有經濟頭腦而且善於經營的人，其中大多都是省吃儉用不事奢華的人。」他們不僅是傳統中國社會的繼承者，而且是傳統中國文化的傳承者。孔子說「道失，問於野」，就指的是他們。

歷史上，中國的道統即便遭遇劫難，也不會斷絕在中國鄉野文化文明之中。五胡亂華，宋明失國，雖然亂了中國，甚至亡了中國，但是正因為「道失，問於野」，也就是「野之尚存」，所以「道之不失」，進而還能夠用中國的道統文化，最終地同化了外來的侵略者和顛覆者，甚至使他們成了我們民族的一部分。而「地主在農村興辦教育，興辦公益慈善事業，和調解糾紛，主持公道」，恰恰是「道失，問於野」的前提。民國的道統、國統、法統，和兼濟中國傳統文化和外來進步文明的民國文化，又恰恰是通過他們才在「舊中國」農村社會日漸興起和逐漸普及的。當然這就更是中共非鋤之而不甘的了。其結果，自然是中國傳統文化和民國文化之根被中共一刀截斷。從此之後，大陸的「中華民族」還是中華民族嗎？

所以，中共土改一旦殺害了數百萬地主鄉紳，就改變了中國傳統社會和民國進步社會的本相。用作者的話來說，就是：土改破壞了中國鄉村的和諧，使殘暴和血腥在中國鄉村大行其道；土改改變了農村貧富價值觀——以窮為榮，以富為惡；土改把不勞而獲、搶劫瓜分別人財物的土匪行為，當作反剝削反壓迫的革命行動；土改建立了惡質的鄉村政權；土改摧毀了鄉村莊園的文化藝術……。

由此可知，中共的「破四舊」絕不是從「文革」開始的，而是從「殺人土改」

時開始的，是從中國最廣大的農村社會開始的。作者在書中所記述的川東農村幾大地主「莊園」的被徹底毀滅，實際上就是中國文化在廣大鄉村的被消滅，是「道失，問於野」的真正毀棄。

手段之三，就是篡改和摧毀中國的歷史。中共本著馬列教義，以所謂封建社會乃是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個「必然歷史階段」為由，將秦後二千餘年的中國歷史一概指斥為「萬惡的封建社會」，所以，他們才要和整個中國以往的歷史作最徹底的決裂和否定，並把1949年之前稱作「萬惡的舊社會」。

如此汗巖自己民族的歷史，毀棄自己民族的文化，侮辱中國人民「走向共和」的艱難歷程，將一部五千年的中國歷史當作為「馬列教義」作證的一部反面教材，這不僅是對我們整個民族及其歷史的侮辱，也是對我們幾代大陸人長達近七十年的反動「洗腦」。

可貴的是，本書作者在《血紅的土地——從土地革命到土地改革到土地財政》一文中，從感性和理性兩個方面，將中共對中國歷史的公然篡改進行了批判。作者尤其針對中共將殺人越貨的暴力土改，當作是「為了消滅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基礎」予以了徹底的否定。他用自己對中共土改的研究成果，證明瞭中國的地主和農民的關係根本就不是「封建的對立關係」。同時，作者還藉用其他歷史學者的研究，從中國封建社會和歐洲封建社會的對比上，進一步證明中共移植馬克思關於「封建社會」教義的可笑。我對此不僅十分贊成，而且相當讚賞。

我還想稍稍說一說的是：在人類的歷史上，從來就不存在一個「獨立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社會」，更沒有存在過一個「整齊劃一的世界封建社會」。所謂「封建社會」這個不完整的政治歷史概念，在中國不過是「君主制度和君主社會」在其第一大歷史階段（即「大周朝」）因施行「封侯建國」而出現，它完整的名稱應是「君主封建社會」。因為，若無「君封」，何以「建國」？封者為誰？周天子也！建者為誰？諸侯也！在秦以後，也就是在秦始皇「廢封建，置郡縣」，即廢了大周朝君主制度下的封建貴族政治和封建等級政治之後，中國的君主社會就進入了他的第二大歷史階段，即：「君主集權制度和君主集權社會」。所以，馬列子孫們指罵秦以後的二千餘年仍然是「萬惡的封建社會」，實在是背祖忘宗，甘為馬列思想的奴才。

至於中世紀的歐洲社會，則不論稱之為「封建」社會也好，「封領」社會也好，就不能一概而論了。因為整個歐洲中世紀社會狀態的複雜性，不是用「封建或封領」幾個字可以概括得了的。馬克思的錯誤，不僅是「以偏概全」——相信地中海沿

岸的歷史就是整個世界的歷史；而且是「以點帶面」——甚至將他不承認的「德意志祖國」的歷史，也當作了整個世界的歷史。

但是，馬克思的「社會發展階段理論」，卻成了「共產教」的著名教義，不僅被血腥地實踐在俄國，而且被俄人通過中共之手更加血腥地實踐在中國，為此不知枉殺了多少無辜的中華兒女和中國地主，尤不知扭曲了多少中國知識者的人格和靈魂。

2003 至 2005 年間，我在美國和英國的一些名校系列講演「驅除馬列，恢復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時，也講到了上述的內容。至今仍然不能讓我忘懷的，是每當我講到「要做中華兒女，不做馬列子孫」之時，都像是戳通了一層窗戶紙那樣，引發了在座中國留學生們真正的「民族之情和民族之恨」。當年講堂上年輕人眼睛裡 那滿含著激情的清澈之淚，我終生不會忘卻。

今日回顧往事，只能使我迫切地感覺到，是時候了，是到了我們敞開「驅除馬列，恢復中華」之「民族解放情懷」的時候了！我想這也是《血紅的土地》這本書 的另一個重大意義所在。因為，正是這本書告訴我們，今天我們所面臨的「民族危機」，是一場中國歷史上從未遭遇過的危機。因為，中共自「清匪反霸、土改、鎮反」開始的一連串對大陸人民的大屠殺、大迫害和大整肅，無非是「西方共產教」規定的對「革命對象」的屠殺、迫害和整肅；反對或不信仰馬列教者，也要被整肅、迫害和殺害。究其本質，就是對中國人的「宗教屠殺」和對中華民族的「民族鎮壓」！由此所造成的最惡劣後果，就是馬列文化之「奪我魂魄」已經成為極其痛苦的歷史 和現實，並且早已使我們「族已非族」、「國已非國」，使大多數大陸人被「自絕」在中華文化的文明花苑之外，從而成為馬列文化可憐的和驚恐的傳承者及應聲蟲。

四、哭罷血土寫血書，蜀人何以得譚君？

書已讀了，淚亦流了，此刻該說一說譚君了。

譚松教授，是我的新知，也是我神交已久的「舊知」。多年前，我已經知道他主編了《抗戰陪都》專集；參與了廣受歡迎的紀錄片《重慶大轟炸》的採訪工作；他還寫過一本為右派鳴冤的書《長壽湖》，也是血淚史。其他的著作，我雖然讀得很少，卻知道他著述良多。

可是，他的這些採訪和寫作，注定不會為中共當局所容。他不僅一次又一次失去工作，而且還被抄家、抓捕。他不僅在文章裡，更在大學的講堂上說領導中國人抗戰的「中心」在重慶，而不是延安；說反右運動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獨立和思想自由的大屠殺；說土改殺地主鄉紳就是屠殺中國農村的精英，是毀滅我

們傳統的政治和文化；特別是他一再在課堂上展示 29 年前那場天安門大屠殺，讓年輕的大學生們瞭解歷史真相；更有甚者，他竟敢在被關押後的「取保候審」期間，開始調查採寫中共的土改真相……。

譚松何以如此？為什麼當今中國那許多甘心於「民主自困」的知識分子們，竟都不敢如此，甚至「不屑如此」呢？

那是因為譚松心中滿盛著「天下『苦共』久矣」的良知，胸中滿懷著一個「敢於直面人生」者的正義之情。他還天生就是一個有勇氣的人，有著敢於「為民伐罪」的「英雄心性」和「匹夫之責」——這在當代中國的知識人中也是真是「鳳毛麟角」。但他卻是一個「紅二代」，他的父母都是「老革命」，他父親曾是中共重慶市委的宣傳部副部長，做的就是管他兒子這類人腦袋的事情。然而，他的兒子居然成了四川大地屈指可數的著名異議人士，也就是反共人士。

譚松教授的這種真德行，使我聯想到了七十多年前重慶某些國民黨達官貴人的兒女們。當然，那時他們要比今日的譚松年輕許多，但是，除卻他們在當年所表現出來的幼稚、單純和容易受騙——特別是容易受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的騙之外，他們在奔向「錯誤道路」時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正直，勇敢和英雄心性」，同樣是值得嘉許的。因為他們是真地背叛了「家門」，投入到「共產革命」中去了，而這個「革命」還是蓄意要顛覆「屬於他們的天下」的。此後，他們非但不怕坐牢，甚至為共產黨奪權打天下立下了難以磨滅的「歷史功勳」，比如陳布雷和傅作義等人的「逆女」們。

（可他們最終也被共產黨清除了，他們是否悔悟，不得而知。）

我說這些話，不是要拿現在的譚松和過去的他們相比。要知道，他們走的是錯路，譚先生走的是正路；他們是受騙，譚先生則是自覺；他們是因為無知而錯識迷途，譚先生則是在感同身受和苦思苦索之後，才走上正義之途的真正民主戰士。可問題本不在這裡，而在於：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奈何「進步青年」竟有那麼多？而今天，在共產黨的「血腥統治」下，奈何「進步的知識者」居然這樣少？從中共權貴的紅漆大門裡面晃蕩出來的，怎麼盡是些「中共血腥統治的接班人」呢？怎麼數來數去，也就是譚松，羅點點和他的一個哥哥——或許還有幾個我們不知道的。但是，他們和譚松先生還是不一樣的。因為譚松先生是對共產主義，共產黨和共產黨政權的徹底背叛，是對自由和民主的堅定追求，更是與 1949 年後中國千千萬萬受難者心心相連的。換言之，用共產黨的一種說法來講，在「紅二代」譚先生身上，體現了深深的和堅定不移的「人民性」；用我的話來說，就是「民主性」。他是為人民而背叛了共產黨，更為民主而背叛了專制。而在其他也有了些覺醒的「紅二代」、「官二代」身上，那最後一道背叛的門檻，是否能夠跨得過去，恐怕還是一個大大的問號。在這個眼看著「大變

革」就要來臨的「革命時代」，你們是否也能和譚君一樣，勇敢地跨出那道標誌著最後背叛的門檻，走向民間，走向人民，走向真正的民主革命？你們是否也能和譚先生，也和我們一道，去掀翻你們曾「棲身享樂」的專制大廈，去共同迎接我們民族的明天？如此，你們將一樣功不可沒。

其實，在任何時代，像譚君這樣的勇士、鬥士，都是不可多得的。但是，一旦有了一個，幾個，或整整一個隊伍參加了進來，那麼，我們民族和人民離他們真正獲得解放的日子，就不遠了。譚君將自己的心緊貼在川東的土地上，不，是我中華民族的整個大地上，將千千萬萬無辜地主的鮮血凝就的「血化石」緊緊抱在胸前，更用自己的情和淚將他們描畫出來，端到世人的眼前，讓他們看到昨日的「汪汪鮮血」和今日的「應有抱負」，這該是何等難得的「志業」。所以，我才會說：在譚君，雖是「哭罷血土寫血書」；但在蜀人，特別是川東的地主冤魂們，一定已在涕泗橫流地感慨著：「蜀人何以得譚君」了……

譚君難得。

民國 107 年 9 月 27 日於華盛頓鄉下

註釋：

1. 史達林在 1926 年 12 月 26 日曾指示中共說：「中共革命的性質就是農民戰爭。」

2. 1927 年 11 月，由蘇俄派來的第三國際代表羅明拉茲所主持的「中共上海政治擴大會議」上，就已經在「中國現狀和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和「關於土地問題黨綱草案的決議」中，開始命令「對於豪紳／工賊及一切反動派，應當採取毫不顧惜的消滅政策，努力使農民暴動有民眾式的性質，要極端嚴厲地無顧惜地殺盡豪紳反革命派」。（辛灝年：「以血的手段建立極權專制」，《開放》雜誌社 1996 年發表，1999 年《中共五十年》一書收集出版）

3. 1927 年 3 月，毛澤東在他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道：「我這次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所得到的最重要的成果，即流氓地痞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

4. 1948 年「中共中央對新解放區土改的指示」，引自辛灝年「以血的手段建立極權專制」一文。

5. 引自辛灝年「以血的手段建立極權專制」一文。

6. 引自辛灝年「以血的手段建立極權專制」一文。

7. 1920 年 8 月，蘇俄已經派人在上海為各地共產黨小組成員成立了「臨時中共中央」。

前 言

谭 松

在“新中国”，有一个被强大国家机器彻底妖魔化了的形象——地主。长期以来，地主已成了贪婪、残暴、奸诈、懒惰、剥削、压迫、甚至“毒蛇”、“豺狼”的同义词。在中共划定的阶级敌人“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中，地主名列榜首，是为“首犯”。

电影《白毛女》中，地主黄世仁是毒辣、凶残的化身；

小说《高玉宝》中，地主周扒皮是贪婪、奸诈的象征；

泥塑《收租院》中，地主刘文彩是暴虐、淫逸的代表；

歌剧《红色娘子军》中，地主南霸天是恶霸、抢劫的标记；

还有那煽起仇恨的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

还有那数不清的“忆苦思甜”；

还有那数不清的“阶级教育”；

还有那数不清的“血泪控诉”；

还有……

我，和我们这一代生长在“新中国”的人，大口大口吸着“党妈妈”提供的这种狼奶，终于被培养成亿万嗜血而又疯狂的“毛主席的红卫兵、红小兵”。

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用自己的头脑去想过地主究竟是怎么一个群体，更没有想过去了解一下土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任由历史的真相、殷红的鲜血、民族的不幸掩埋在统治者层层叠叠的谎言、标语、口号和文学家、艺术家们编造的各类作品中。

我是怎么想到去做这部采访录的呢？

我的祖辈是当年川东万县农村的贫苦农民，父母是投奔共产党的革命干部，我本人是饱受“妖魔化”狼奶喂养的“红小兵”，推敲起来，仿佛没有要为地富们“鸣冤叫屈”的“阶级根源”。

我只能说，这是上帝的安排。

是上帝，把一种“不分阶级”的同情心和“路见不平想要吼”的男儿血性安放在我心中。

在“文革”期间，大约是1969年，刚复课不久的我们被组织到附近的一个

生产队接受“阶级教育”——参加批斗地主富农大会。

先是唱那煽情的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接着是声情并茂地宣讲地主的罪恶，然后是义愤填膺的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待人们的情绪充分调动起来之后，主持人一声断喝：“把地富分子押上台来！”

六、七个衣着破烂的中老年人被推上台来。他们立足未稳，一群人冲上去就是一阵暴打！

歌曲、口号所煽起的仇恨立马找到了一个宣泄口。

几个地富被打得东倒西歪、血流满面。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暴打地主，我并不清楚那几个人是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虽然共产党的宣传也让我心中充满了仇恨。

但是，坐在前排的我却清清楚楚看到了他们脸上和眼眸中的痛苦——一种极其无助和凄凉的痛苦。

他们头破血流但却不敢叫喊，一个个只是低声呻吟。

那种痛苦的神情和目光深深触动了我，我突然产生深深的同情。年仅13岁的我还不能明辨是非，但是，我总觉得我从那痛苦的神情中看到了一种无辜。

几年后，1974年，我作为“知识青年”下乡到四川省邻水县。我们刚到，生产队长就给我们介绍队里的阶级成分情况，他重点提到了队里的一个廖姓地主，并要我们提高警惕并同他保持距离。我于是注意观察，发现廖地主真是队里最底层的人：卑微、屈辱、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而且，从不敢高声说话，连他的女儿，都畏畏缩缩，像个小老鼠。

看到他们那个样子，不知为什么，我又产生那种同情。

一天，我路过他住的那个破草棚房，站在门口向里望去。一个女人，一个穿得很破烂的瘦弱女人，正在灶台前烧火。半晌，她才发现有人在看她。她抬起头来，看见是我，眼中露出有些惊慌和羞怯的神色。

我冲着她笑了一下。

我永远记得她的反应——她慌慌张张站起来，既手足无措又仿佛受宠若惊！

她的那种卑微让我心里突然觉得很难受——一个生活在最低层的人——廖地主的老婆。

地主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向生产队的老会计问起廖地主的事。老会计说，他完全是冤枉，最初他的成分是贫农，还同大家一块分了“胜利果实”。可是，土改复查时（后来我专门调查过土改的这个阶段），为了分他家的财产，就说他小时曾经抱给一个地主当过干儿子，因此，就把他划成了地主。

廖地主是冤枉的，那么，其他地主呢？

老会计经历了土改的全部过程，在同他建立了良好关系后，他讲给我大量的真实故事和土改血泪，他是第一个给我还原土改历史真相的人，那种血腥、残暴、下流、荒诞……我在农村呆了近三年，在同农民们相处好了之后，他们给我讲了心里话，让我很震惊的是：他们情愿过当年给地主干活的生活而不愿意当人民公社的社员。他们还说，当年地主对他们很不错，吃得也好。这同我受的教育刚好相反，而我感觉到，他们说的是实话。

我觉得，我受骗了，受了中共教育的欺骗。

我由此开始思索，并隐隐产生了要揭示土改和地主真相的念头。

可惜，后来考大学、评职称、谋生计，一直未将此念头付诸实施，错失了调查采访的最佳时机。

第一次产生采写地主的冲动是1997年又一次失业之后。然而，真正付诸实施是2003年3月。

那一天，我在云阳县彭氏庄园偶然听说，土改时，一个地主老婆被四个民兵凌辱后用铁条捅下身，导致她子宫破裂而死。当时我一下子情绪极其波动，感到非常痛苦，而以前埋藏心底的念头徒然变作按捺不住的冲动。

记得当天晚上，云阳突然倾盆大雨！

我曾在《长寿湖》的后记中写道：“遗忘，让被扼杀的生命又遭受一次不幸——一种比肉体生命消亡更深刻的幸。”然而，面对地主的苦难，岂只是生命的虐杀和虐杀之后的遗忘？！地富们在付出了财产和生命之后，还要背负着“罪该万死”的骂名，被贴上“遗臭万年”的标记，这才是更深刻的幸，最大的幸。

人世间的大不公，莫过于此！

于是，我决定不顾一切进行采访。（说“不顾一切”是因为当时我还处在“取保候审”的“服刑期”）

然而，一进入，便发现这是比采写长寿湖右派更为艰难的工作。

首先是缺乏线索。

虽然我知道地富们是一个庞大的受难群体，虽然我清楚就在我所在的重庆地区，一定有不少受难者和亲历者。可是，如何把他们一个个找出来呢？

我不愿此事又被当局扼杀在摇篮中（如两年前调查重庆“红卫兵”墓）。况且，像我这种已有“前科”的人，稍有不慎，便会前功尽弃。这只能是一项偷偷摸摸的地下活动。偷偷摸摸虽然有利于安全，但却不利于寻找线索。因此，采访的进展缓慢而又艰难。

其次是年代久远。

土改是中共当政后的第二年（1950年12月）就开展的运动。几十年后，当

年经历最完整、最丰厚、也最悲惨的当事人——老地主们，眼下已寥若晨星。即便费尽心力找到一个，也不是当年（1949年前）真正出租土地的地主。想来，要指望地主们穿过几十年腥风血雨，仍然生龙活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不现实的奢望。这也说明，这项调查采访工作做得太迟了！对此，我既感到遗憾，更感到内疚。

第三是恐惧。

2002年我因采写长寿湖右派，被中共国家安全局抓捕、关押，深深领受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功力。采访地主，这种“领受”有过之而无不及。找到一个线索原本不容易，但当事人的恐惧常常使采访的“含金量”大减，甚至还无功而返。地主如此，地主子女如此，不少参与者也如此。恐惧，已内化为个体内在的自动控制程序，一提到那段历史，无论是在穷乡僻壤，还是在都市密室，程序自动启用防“泄密”功能，让陌生的访问者无机可乘。（地富和其后代们不仅财富被抢夺了，肉体被摧残了，精神也被打垮和征服了。另一方面，也看出中共党国功力的“伟大”——把财产抢了，人杀了之后还要让对方子子孙孙长期生活在恐惧中！正是由于恐惧的原因，使得本书的不少采访，都只能以摆“龙门阵”（闲聊）、拉家常的方式获取信息。

这种恐惧也发生在采访者身上。

2005年10月，我曾采访了一位家族中有不少是地主的人（也是我的朋友），感觉到他有不少线索，这对正苦于找不到线索的我来说很重要。此外，他不仅有采访和写作的经验，而且对地主的认识同我完全一样。于是，我邀他加入这项调查工作。他同意后我们一块作了20余人的采访，我很怀念我们那两年多共同采访的经历。可是，由于当局的高压，由于土改调查是一个高危的禁区，他一直处于恐惧不安中。近几年来，尤其是在中共19大前后，当局对言论的打压愈加猛烈。如果本书的内容流传出去或出版此书，肯定有很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他表示退出。他带走了他独自采写的文字和一半我们共同采写的内容，不再与本书发生联系。我感到很遗憾，因为那些篇章也饱含着无辜冤魂的悲惨血泪。但是，我也能理解，平安的日子是每个人的基本渴求。

愿他能安全、自由地公布那些篇章的日子早日到来！

2017年7月，我因为作土改调查，被我所任教的学校开除，在担心又一次被抓捕的恐惧中，我被迫决定流亡美国，土改调查采访工作中止。

从2003年3月开始调查，到2017年11月6日我采访最后一名地主后代为止，共采访了100多人，勉强记录了那场惊心动魄运动的一些真相。

为什么说是勉强呢？因为，面对土改这场改变了中国整个“生态”的全国性运动，本书所揭示的只是很小的一个局部，而且，也未能按我设想的模式完成。

一是“量”未达标。

一部以亲历者、受难者的口述来反映中华历史上那场惊天动地运动的文本，应当有相当的面的广度：即应当含有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阶层和较多的人数。可惜，由于种种原因（甚至还有经济上的困难），采访调查只集中在我的家乡川东地区（现重庆地区），采访对象也只有100多人。而这100多人中，尤其缺少“货真价实”的老地主，缺少他们当初如何发家、如何经营、如何一夜间家破人亡、如何渡过数十年漫长黑夜的真实经历和心路历程。我相信，虽然岁月无情迫害残酷，总还会有一些“珍稀动物”没有灭绝。在纪念“七七事变”70周年时，全国还找到了9个当年卢沟桥之战的老兵。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土改后，存活下来的老地主一定不只9个。可是，怎么找到他们呢？难道能像寻找老兵一样通过互联网和报纸、电台？

二是“点”未深入。

1949年之前，在中国乡村，有不少气势不凡、规模庞大的地主庄园。这些庄园往往集建筑艺术、手工雕刻、传统民俗、儒家文化于一身。1949年土改之后，这些庄园不是灰飞烟灭就是被五马分尸。（我所见的最大也是毁得最彻底的是四川隆昌县内占地千多亩的云顶寨地主庄园。）这些庄园的主人们和他们众多的后代，在1949年之后的命运一定是一部乱石穿云惊涛裂岸的“百科全书”！如果能选一家深入下去长期采访，辅之庄园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民俗、历史、艺术等内涵，一层一层写下去，定能以点带面，比较深刻地展示那个年代和那段历史。我所到过的陈万宝庄园、大水井庄园、彭氏庄园、云顶寨庄园等都具有这种可供耕耘的深厚土壤。可惜，又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一个也没能深入下去。

三是“图”的放弃。

这个“图”不是一般照片。

当年的“土地改革”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最野蛮、最残酷、最血腥、甚至最下流的土匪抢劫。在这个抢劫过程中，有大规模的杀人、有暗地的强奸、有公开的轮奸，更有千奇百怪的种种酷刑。我在这些闻所未闻、难以想象的酷刑面前目瞪口呆大汗淋漓！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一头撞上60多年前那些惊心动魄的残酷，将如何面对？如何思考？如何书写？我产生一种冲动，或者说想法，把那些酷刑一一列出，请人作画，展示在此书的后部。《收租院》的泥塑雕像同《白毛女》、《半夜鸡叫》一样，是编造的故事，而“土改酷刑大观”的图画，是无数无辜生命和悲惨血泪凝聚的真实。

但是，我放弃了。

除了冷血的强权和变态的心性，没人愿意观看血腥，咀嚼残忍。书中的不少酷刑，仅仅读文字就让人恶心，再配图画，岂不让人更加难受？更何况，有些酷刑实在下流，如何“图文并茂”？我仅仅在统计本书中提到的被虐杀的人数和姓名（已列在书后）时，心中就感到一阵又一阵的挤压，一次又一次地想扭头而去。

思索再三，我还是决定放弃“图说”（除了个别作说明性的图），虽然我清楚，避免血腥的前提是直面血腥，为了天空不再黑暗的前提是先揭露黑暗。

四是“力”度不足。

在采访期间，我简单地探讨了土改造成的一些恶果。如：一是土改在政治上经济上摧毁了中国农村的精英阶层，而这个阶层的人大多是有经营头脑，勤劳能干而又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乡绅。二是煽起仇恨仇杀，破坏了中国乡村的和谐，人与人的关系。三是把一些地痞、流氓、懒汉等作为“革命的依靠对象”，在土改杀人抢劫之后，让他们进入政权，成为了各级领导干部。四是破坏了农村的经济发展，人们不再（也不敢）辛勤耕耘，发家致富。五是它一方面树立起共产党尤其是毛泽东本人在农民中大救星、大恩人的权威，一方面通过血腥屠杀让人恐惧，为中共后来随意整治农民、折腾农村奠定了基础。六是……

另外，中共搞土改的手段、方法、计谋、程序、目的等等，也颇值探讨。在调查采访及一些书籍（如《革命与乡村——解放区土地改革研究》）中，我了解到，中共的土改是一个精心策划的“佳作”：宣传煽动、挑起仇恨，杀人镇压、划分成分、斗争夺财、征粮参军、建立政权……一环扣一环，一波接一波，完全是高屋建瓴的大手笔！说土改仅仅是土匪抢劫实在是贬低它了。“抢劫”只是“土地改革”精妙过程中的一个“手段现象”，而其以大奸大伪大恶大暴为内核的“大智慧”，内涵深厚得很。

还有，土改中的不少作恶者或帮凶都是同地主同村的村民，他们原本并非心狠手辣之人，但共产党一挑动，或者说一旦他们获得了可以公然作恶而又不受惩处的特权时，道德的约束便荡然无存，人性中的恶便汹涌澎湃，看得见的，是一个个争先恐后扑向同类，比野兽更凶残。中华民族以儒家为主的文化传统为什么对突如其来的恶如此没有抵御力？朴素的老百姓为什么这么容易就转变为凶手和帮凶？（在土改之后共产党发动的每一场政治运动中都是如此。）面对谎言欺骗、暴力镇压和利益诱惑，人性只有扭曲、败退？

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下去研讨，应当有学者来专门研究。

我不是土改研究的专家学者，只是调查土改真相的“民间记者”。虽然后来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查到了一些资料，回来后写了两万多字的“理论探讨”文章（见后面《血红的土地——从土地革命到土地改革到土地财政》），但是，面对土改运动这样厚重的历史和复杂的背景，我感到自己力度不够。本书的主要内容，只

是展示了一些现象、一些场景，一些即将被岁月淹没的个体不幸与历史真相。我希望这部采访录，既为人们展示当年那真实的一幕，也为有关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一部血肉文本和相关资料。现在对土改真相的研究还是禁区中的禁区，但一定要有人来做！否则我们既愧对那场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天翻地覆”，更愧对那无数祭献在土改血腥祭坛上的千万冤魂！

感到欣慰的是，在这些年的采访中，我设法把绝大部分被采访者录了像，虽然工具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数码相机（带录相功能），效果欠佳，但总能看到听到当事人的鲜活形象和生动讲述。更有幸的是，几年前我遇到了一个很有正义感的学生——懂一些视频制作的丁然同学。在她一年多的艰辛劳作下（甚至冒着被抓捕的风险），九集纪录片《血红的土地》在2017年4月制作完成，从而使人们能感受到比文字更真切、更有冲击力的历史画面。

还要说明的是，此书的序言早在10年前我就写好了，当时是为了以防不测，现在重写，保留了部分当时的文字。

此时，本书中的受访者绝大多数都已经不在人世，他们永远无法看到纪录他们苦难的文字和视频了。而且，即便他们还健在，他们又怎么能看到？十多年过去了，天，不仅依然黑暗，而且更加黑暗。因此，在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上，眼下还没有出版此书和传播视频的可能。

面对那无数消殒在土改血腥祭坛上的冤魂，面对那留下了珍贵讲述但却已然作古的受访者，我目前唯一能做的，是点一排红烛，洒一杯老酒，仰望苍天，祭奠哀肠——

——让那些无声的名字，在民族苦难的记忆里燃烧！

2018年4月18日

目录

序：蜀人何以得譚君？	6
前 言	19

第一章 残存的几个老地主

一、一个被摧折了“阳根”的老地主	32
1. 我本人的遭遇	32
2. 我的亲眼目睹	36
3. 我的爷爷李孟洋	41
二、这是人做的事吗	46
三、丈夫，枪杀！女儿，饿死	52

第二章 “听他们讲那过去的故事”

一、一个当年地主放牛娃的讲述	61
二、这几十年的日子	65
三、世上没有这个道理	68
四、好些事，我都不敢给娃儿讲	70
五、天灵盖上一枪及其它	72
1. 魏廉周之死	72
2. 魏律民夫妇之死	73
3. 朱化成之死	75
六、土改和反右我都遇上了	77
七、从小学校长到死缓囚犯	82
1. 1951年6月，走向深渊	82
2. 从死缓到20年劳改	86
3. 悲欢14年，从“反面教员”到代课教师	90
八、比毒蛇还毒的	93
九、家乡勤劳苦干的地主	95

1. 我的家乡	95
2. 我的爸爸和二叔	95
3. 我的创业	97
4. 我去当教师	97
5. 我目睹土改	98
6. 我的一点看法	101
十、我亲眼目睹开膛挖心	104
十一、父亲给我的教诲——一个地主长工儿子的来信	110
十二、不回去了，我就死在泰国	113
十三、枪毙啦枪毙啦！	116
十四、我参加革命，家人被“革命”	118
十五、一对夫妻生离死别的故事	121
1. 她一点点捡起丈夫的头骨	123
2. 我带她去看，早已没有坟了	124

第三章

在土改舞台上的各色人物

一、我没有参与	128
二、贫下中农硬是发明家	132
三、我曾经是个傻子、疯子	135
四、土改时，我曾写过杀人布告	142
五、地主杀了，环境毁了	148
六、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	151
七、那时杀人十分随便	154
档案上记载的重庆市南岸区征粮和土改情况	158
八、从“地主婆娘”到“右派分子”	161
1. 打腰鼓，枪杀人的前奏曲	161
2. 打锣鼓，斗打我的开场白	162
九、太血腥，我想逃脱，结果——	165
十、斗打地主很残暴	168
十一、“先轰开，后深入”	169
十二、让农民过苦日子	171
十三、我看到的土改和经历的大饥荒	173
十四、错办（案）三、五百（件）不追究	176
十五、一个土改民兵队长的述说	180

第四章

地主后代，一个庞大的受难群体

一、那些年遭的孽说不完·····	184
1. 36岁的父亲,12个弹孔·····	184
2. 爷爷之死和二叔之死·····	186
3. 妈妈,遭遇土匪抢劫与“土改”抢劫·····	188
4. 我隐瞒了出身的婚姻·····	189
二、何年昭雪这尘封的奇冤·····	192
1. 我的家园和家人·····	192
2. 我聪慧的母亲·····	193
3. 我一家的噩梦·····	195
4. 我母亲之死·····	196
5. 我美丽的姐姐·····	197
6. 我姐姐之死·····	199
7. 我的《思乡曲》·····	200
8. 我老师的一家·····	201
9. 成守义之死·····	203
10. 恐怖集中营·····	204
三、树,砍光了,人,整死了·····	207
四、一个小心谨慎的翰林后代·····	210
五、显赫施家最后一个守墓人·····	214
1. 共产党来了,拆公馆、挖祖坟·····	214
2. 扶养了三代“地主子孙”的贫农妇女·····	215
六、惨叫声中的自刎·····	218
七、他吞下了他爹的脑水·····	220
八、一个地主孙女的自叙·····	223
九、漂亮的地主女儿——黄二妹·····	231
十、死里逃生的11岁小地主·····	237
十一、土改,我家五死一残·····	243
十二、这是商纣的炮烙之刑·····	248
十三、从没讲过的家史·····	254
1. 那段家史我不愿对任何人讲·····	255
2. 那一天,我的姨妈·····	257
3. 我在钟家隐姓埋名几十年·····	257
十四、父亲还是被杀了·····	261
十五、我觉得最惨的就是·····	264
十六、我们夫妇的母亲都是自杀身亡的·····	267
十七、一张收条救了我爷爷·····	271

十八、“解放”几年后，我就成了孤儿	273
十九、我家是怎么评为地主的	278
二十、一无所有后的万幸	280
二十一、土改复查——从中农到地主	283
二十二、徐氏家族，人亡家破	286
1. 孝悌大家庭	286
2. 血红新社会	287
二十三、爸爸和四爸之死	291
二十四、地主子女，打死就打死	297
二十五、我在几十年的恐怖中成长	299
1. 我一家的命运	299
2. 我的亲眼目睹	303
3. 我对地主的一点看法	305
4. 我的右派生涯	306
二十六、古宅，强夺贱卖；书香，断弦灭音	311
二十七、地主，枪杀；工商业者，绑票	322
二十八、我们徐家的兴衰沧桑	324
1. 我的家族	324
2. 我的父母	325
3. 我的奶奶	327
4. 我的感叹	328
二十九、一个敢怒敢骂地主后代的讲述	331
1. “解放前”我胡家的家史	331
2. 土改来了！人，杀了；财产，分了	333
3. 堂嫂一家“绝门”	335
4. 专门用地痞流氓	343
5. 关押地主家属的“集中营”	338
6. 一个积善之家的“灭门”	343
7. 鲁家大院的故事	346
8. 土改之后的不幸	347
9. 一家贫下中农的“灭门”	349
三十、也把我家关进“集中营”	353
三十一、从儿童团大队长到地主子女	356
三十二、三哥的“狠毒”害了我一生	358
三十三、杀千分之三	360
三十四、我两个父亲，同一天遇难	364
三十五、“打倒封建势力要凭良心！”	366
三十六、土改后，杨家唯一幸存者的遭遇	368
1. 暴风骤雨，家破人亡	368

2. 姐妹分离, 乞讨为生·····	369
3. 满娘下毒, 死里逃生·····	370
4. 美梦破碎, 乞讨回乡·····	371
5. 逃荒贵州, 卖作人妇·····	372
三十七、无题·····	375
三十八、他节俭持家, 死于非命·····	377
三十九、他死于“收买人心罪”·····	379
1. 奶奶李家, 人亡家破·····	379
2. 爷爷王家, 灰飞烟灭·····	380
四十、那种生活, 你一天都过不下来·····	384
四十一、爸爸妈妈牵手投江·····	386
四十二、“我们当年为什么不跑嘛?!”·····	392
1. 先辈艰苦创业·····	392
2. 土改遭遇灭顶·····	394
3. 父亲遗恨终身·····	396
四十三、刘文彩孙子的讲述——祖母之死·····	399
四十四、我为啥终身独身·····	404
四十五、一个被打残的地主孙儿·····	408
四十六、抗日将领刘湘侄孙的悲喜人生·····	411
1. 我的家史和父母们的遭遇·····	411
2. 我被收养和被遗弃的经历·····	413
3. 外出乞讨, 九死一生·····	415
4. 地主子女, 生存这么艰难·····	416
5. 捆绑吊打, 逼我走上绝路·····	419
6. 艰辛的寻亲之路·····	420
7. 山上遇险和大哥之死·····	422
8. 我的婚姻和“翻身”的日子·····	423

第五章

几个残存的地主庄园及其人物命运

一、血红的彭氏古祠·····	427
1. 西风残照 彭氏古祠·····	427
2. 烈日高悬 玉殒香消·····	429
3. “毛主席来了, 好哇, 分东西!”·····	431
4. “黄姑娘”遇难记·····	431
5. “狗鸡巴你不懂阶级斗争嗦!”·····	443

6. “就是这样整死的 ”	434
7. “算了,莫说了 ”	435
二、陈氏庄园, 残照悲烈——重庆市涪陵青羊镇陈氏大庄园的艺术雕刻及人物命运	438
1. 陈氏家族唯一残存的庄园	439
2. 二声枪响, 一道奇冤	444
3. 一张年历, 四条人命	445
4. 共产党, 你看不清楚	450
5. 陈万宝后裔座谈会摘录	452
三、焚火之后的大水井地主庄园	454
1. 伤痕累累的古建筑	454
2. 血泪斑斑的土改史	457
(1) 李亮清后人的命运	458
(2) 李氏家族最后一任族长的命运	460
(3) 共产党区长李金斗的命运	463
3、大水井, 我所知道的故事	466
(1) 我们李家的家史	466
(2) 我父亲的经历	467
(3) 我和妈妈的经历	469
(4) 我大伯、三伯和族长之死	471
四、“世外桃源”鱼木寨	474
1. “世外桃源”内的艺术遗存	474
2. “世外桃源”内的人物命运	478
血红的土地——从土地革命到土地改革到土地财政	482
1. 土地革命, 夺得天下的法宝	482
2. 土地改革, 坐稳天下的绝招	485
3. 土地财政, 享乐天下的盛宴	505
土改运动中的杀人和酷刑特性	513
无声的冤魂——本书记述的土改死难者名单	527



祭奠六十多年前消殒在土改血腥祭坛上的冤魂
2017 年清明

第一章

残存的几个老地主

土改已经过去了 50 多年，当年货真价实的老地主不是被杀了就是被岁月淘汰了。下面这几位年龄在 80 多岁以上的老地主，土改时也只有 20 多岁。还有，他们并没有真正放过租、收过押，没有“剥削过贫下中农”。但是，一项“地主”帽子，让他们一辈子生活在“新中国”人间地狱里。



一个被摧折了 “阳根”的老地主

讲述人：李曼

幸存地主，1929年生



我是横石村洋沱坝的人，以前我们这儿属于川东奉节县，1952年才划归湖北，四川土改搞得比湖北利害。我的经历丰富呀，我先说我自己，再说我看到和听到的。

我13岁就离开家乡到了万县的柏土坝，土改时我21岁多，在柏土坝教书，我当过教导主任，训育主任等等。

我家是地主，土改时不准我留在学校，要回家乡接受清算，我只得回到洋沱坝（当时叫横石村）。

我们李氏家族是一个大家族，但我们家已经破产，原因是父亲抽大烟，败了家，搬到高粱村去了。土改时他被评为破产地主。我同爷爷李孟洋住，家只有12担课（注：一“课”包谷和米是五百斤，谷子是四百斤）。爷爷也被评为破产地主，我被评成地主。

问：你家没什么田地了怎么要评你地主？

李：满了18岁就要评地主，他们说解放前在教书，没有劳动，是剥削。当时有个说法叫“说理斗争划地主，互相评地划农民。”

我回来后自己耕种那点土地，算不上什么地主，问题出在农会追“浮财”。他们说我家藏有3000斤黄金，于是我被抓到村上关起来，天天拷打，追逼金银。

我哪儿交得出来，3000斤？3两我都没有看到！他们说：“金子银子！你是个地主，怎么会没得金银？要拿出来！”交不出来，那就用刑！

一，我本人的遭遇

（一），我土改时所遭受的刑罚

在关押的那两、三个月，我遭受了几十种不同的刑罚，我讲一些给你听。

1, “苏秦背剑”

“苏秦背剑”是土改时经常使用的一种刑罚，一只手这么（从肩上）扭下去，一只手从这儿（腰下）扯上来，还把手扭翻过来，这个手这么扭，这个手这样扭，扭过来后把两个手使一拉，用绳子把几根手指捆在一起。那受得了呀？这种刑罚在我身上用了几十次。一捆就是几个小时，那几个小时硬是受不了。



“苏秦背剑”

2, “飞机下蛋”

“飞机下蛋”就是把人捆在五根板凳中摇晃。手放在下面捆起，脚放在上面捆起，捆好后摇晃板凳，板凳是活动的，把人一摇，扯得人所有骨头要散架。这种刑罚我也受了好多次，它整不死人，只是痛得着火。



“飞机下蛋”

3, “背砖”

先把人面朝下睡在板凳上，手扭到背后把一双大拇指捆在一起，再把两个脚的大拇指用麻绳捆得紧紧的，然后把板凳竖立起来，把捆手和脚的绳子从板凳头上挂下来，捆在板凳脚上。这一挂就受不了，人有那么重呀。这还不说，他还在背心上加砖，一块一块的加。我曾经被加过12块砖！我的妈呀，受不了。这种刑受一次后两三天都吃不下饭。



“背砖”

4, “猴儿扳桩”（有的地方叫“吃哑酒”）

猴儿扳桩就是用麻绳把两个大拇指捆在一根木桩上，木桩上破一条缝，加一个木楔子，再用锤子砸木楔，你受得了？当场把指头整断了的都有。

但是，在所有刑罚中，这个刑罚我没有吃大苦，原因就是那个妇联主任同情我，她把一卷陈腐的麻绳交给行刑的民兵，捆上后，捶了几捶，麻绳就断了，再捆，再捶，又断。他们说我会使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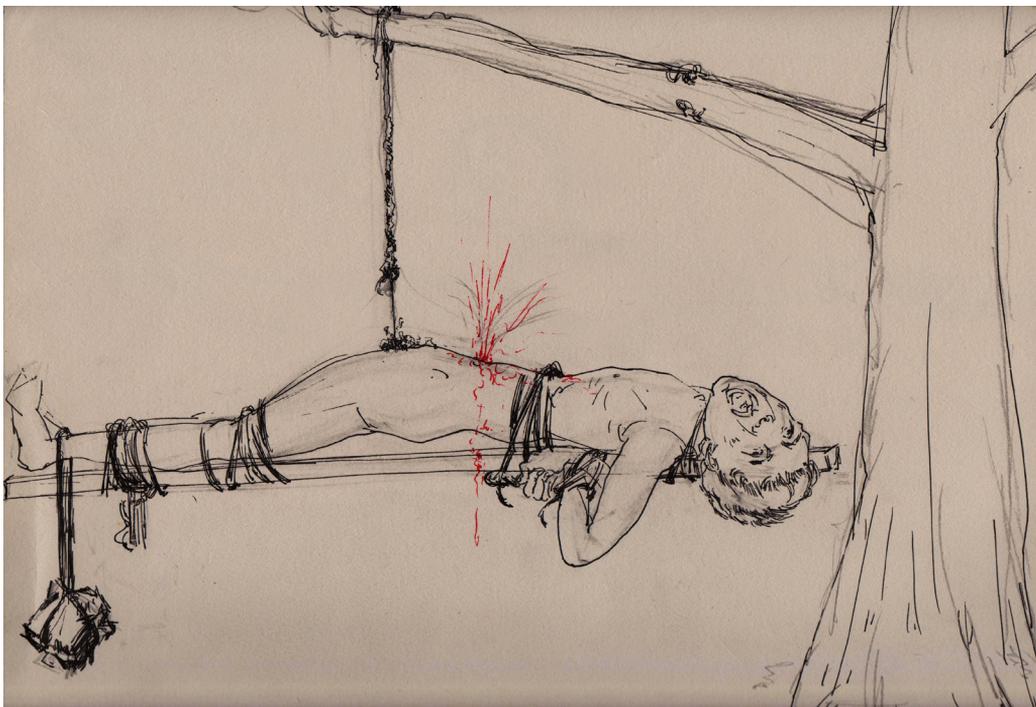
我会使什么法？是那个妇联主任良心。所以这一关我躲过去了。

5, “称秆”

土改时几十种刑罚我都熬过去了，最后有一种差点让我送了命。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我 22 岁的生日。

他们把我脱光，手和脚反捆在一根棒棒上，再用一根麻绳把我生殖器捆起。棒棒就当作一把秆的秆杆，生殖器就作为秆镬（秆杆上提秆的铁环）。另外，在脚那一头还挂一块石头，作为称砣。捆我生殖器的麻绳上再接上棕绳，然后吊在树上。我全身加石头的重量就吊在我的生殖器上，那个吊上去得了呀！我肚脐眼上的血哟，直往上喷。



问：怎么从肚脐眼上出血？

李：我被吊起后，肚子里面的隔膜全部扯破了，肚子里的血就从肚脐眼上喷出来。

（李曼眼看性命不保）

全靠那个农会主任，他说：“这是个才出林的笋子呀（即：一个年轻人呀），不应该把他搞死了。”

他一手托住我的身子，一刀割断了绳子。把我救下来后，这个主任还把我送到一个 80 多岁的老医生那儿。老医生说：“嘿，你们注意哟，他肚脐眼上的血不要回进去了，让它尽量流出来。”他说，我肚子里面的隔膜被扯烂了。我不知道流了多少血，我性命保住了，但是，促使生殖器勃起的附睾被扯烂了，从 22

岁我生日那天起，我就“残废”了，所以现在我是一个“净人”（没有生殖能力的人）。



就这样把我吊在树上



李曼讲完这段经历后精疲力尽，瘫倒在椅子上

注：李曼从此独身，现在，年近九旬的他作为孤寡老人住在利川市社会福利院。

（二），我文革时所遭受的刑罚

抓进村农会的11个人中，只有我一个人活出来，其他人全部整死了。在文革时，又把我抓出来整，他们问我：“你怎么没死呢？”我说：“我当时想的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就这么一句话，差点又让我送了命，他们说：“你留得青山在，你是还想来造反呐？”

一顿暴打！我被打得昏死过去，他们把我丢在地坝，我躺在地上没有知觉了。

这时，他们唆使村里两个傻乎乎的人来整我，他们一个拿一把柏树皮，捆成这么粗的火把，来烧我的眼睛。他们说我土改时没有整死，文革中就要把我打死。我眼睛当时是烧瞎了，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在地坝上躺了一夜，天要亮时才有两个人把我拖回去。

同院子住的一个姓周的人去请青龙口医院的院长罗远明和大水井的一个眼科医生冉玉清来救我，罗院长看到我眼睛烧到那个程度，肿起多大，就说我的眼睛没有救了。冉玉清说，你先把人救活，我来治眼睛。

结果我人被救活，眼睛也保住了。冉玉清说，那个眼睛有个自动保护，火一烧那个眼珠子就扯到后面去了，外面烧伤，里面还有救。她用了药，把我眼睛包扎起。最后那几天，眼睛痒得很，他



李曼讲述时

们把我手捆起，不准我去抓。对了，他们两个都没收钱，我也没钱。原因是冉玉清曾是我的同班同学，罗院长曾是我的学生。我又一次大难不死。

（李曼眼睛虽然救下了，但从此他只有在一、两尺之内才能辩清人和物。）

二，我的亲眼目睹

土改时我耳闻目睹的刑罚和死亡多得很，死的人中大多数都是我们李氏家族的。

（一），李斗寅之死

李斗寅是我祖父一辈的，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曾经担任龙门中心小学校长。他家多少租嘛？五担租，只有五担租子！被抓来斗打是为了逼要金银和花纱布匹。

他们给他定一个数字在他头上，要他按那个数字交纳。他哪里有嘛。他交不出来，就把他抓去整。

我们关押在一起，给他用的刑叫“裁肢”，这是我亲眼见到的！

他们用一种叫做“脚拿子”（音）的钢夹子来夹他手指，“脚拿子”用脚踩，钢夹子就是用来扭铁、扭钢的那个夹子。他们把李斗寅的手指夹在钢夹子里，只有几分钟，手指先夹扁，骨头都夹断了，最后只剩一张皮了。人皮不容易夹断。他们把第一节夹了又夹第二节，手指夹了两节才夹完。把这只手整残了后，再整另一只手。不光是手，把两只手裁断了后再裁两只脚。你想，夹那个肉和骨头，慢慢绞，一直把它绞断，要好久的时间，要痛好久。



李曼讲述时

一节一节地裁，裁断，所以，这种刑罚叫“裁肢”。

李斗寅当时没有死，他的消化器官、呼吸器官还是完好的，不容易一下子死。他们把他丢在一个猪圈里，有些农民看到活活把一个人整死还是不忍心，给他点水喝，有的喂他点稀饭，他又活了几天才死的。他死时 68 岁，比我爷爷大几个月。

（二），李载承之死

李载承是我堂兄，比我大三岁，同我关在一起。那天，土改民兵把他抓出来，脱光他裤子，把他手扭在后面，往上提起，就像刑罚吊“鸭儿鳧水”一样。然后他们抓来地主家的 10 个女人，哪 10 个呢？他的亲姐姐、亲妹妹，嫂嫂、族里的

姑娘、甚至还有族里的奶奶。民兵们在李承载大腿前放一排板凳，把这10个女人抓来趴在板凳上，把裤子脱了，脱个光屁股，头发绑在板凳上。民兵对李承载说，今天这些都是你的人，全是你家里的人，你喜欢不？你看到这一串白屁股你喜欢哪一个？李承载一声不吭，民兵说：“你不说呀？你不说喜欢哪个呀？那不要紧，我们今天来整。”怎么整呢？他们用竹刷子朝他的生殖器抽打。那生殖器怎么经受得起打哟。

问：这是当众进行的吗？

李：是呀！有些怕来看，有良心的人不愿意来看。但是，强迫动员，强迫他们来看。

一阵抽打后，女人们被民兵拖出去各打50板屁股。李承载被打得撒不出来尿了。他父亲李先昭来帮他，用嘴吸，还吸出来了，吸出来的尿中有一半是鲜血。可是，李承载下身损伤了，一直撒不出来尿，他要断气的时候我去喂他几片洋芋（土豆），我喂他嘴里，他已经不吃了。民兵说：“把他拖出去把脚给他砍了！”他被拖出去就在那个火坑石头上，用砸草那个锤子，榔锤，这么大，砰砰几下就把他脚杆砸断了，两只脚都砸断了。

（李承载遇难时25岁，未婚。）

（三），李先昭之死

李先昭是我叔叔，他是怎么被整死的呢？也用了十几种刑罚，我记不到那么多。印象深的一种叫“卵弹琴”另一种叫“灌水葫芦”。

“卵弹琴”就是用麻绳把睾丸捆起，麻绳接在一根棕绳上面，另一头叫人使劲拉直，绷紧之后就拿锤子，像弹匠弹棉花一样，在绳子上一刮，“嘞”的一声，这边拉得紧紧的，那边一弹，受不了，惨叫。人又是捆起的。



“灌水葫芦”就是把他吊在雪地坝上。怎么吊呢？倒吊，一吊就是一晚上。人倒吊起后，鼻孔是朝天的。土改民兵用壶装了80度的开水，灌他的鼻孔。我叔叔先喷出来的是开水，后来喷出来的就是血了。



李曼：开水灌鼻孔

天天整，昼夜不停换班整，我叔叔被折磨了一个多月才死。

在采访时李曼激愤地说：

这些千奇百怪的刑罚在土改时公开地四下交流，干部、民兵们互相学习，交流经验。发明一种整人的办法就给予奖励。是他（毛泽东）下的这个令，毛泽东硬是要把地主全部要消灭干净！



“毛泽东硬是要把地主全部消灭干净！”

（四），李怀清之死

我们家族有一个叫李怀清（音）的人，他一只腿有毛病，走路一拐一拐的，外号叫“三瘸子”。土改民兵把他抓来，用铁丝捆扭在他那只病脚上，倒吊起来后，再捆一砣棉花在脚杆上，先用汽油引燃，然后把煤油桐油淋在上面烧。那脚烧得吱吱吱地响。油往下流，火就从脚一直烧到膝盖。李怀清死时 57 岁。



对了，李怀清的儿子也全部整死完了，其中有一个叫李柏联。他还有个女儿叫李先 X——名字记不全了，只知道她在万县省师范读书，才十六七岁。两天就把她整死了。不仅是轮奸，还用了各种下流残酷的刑罚。

李怀清的哥哥叫李伯清，土改时也整死了，但怎么整死的我没有看到，他死时 62 岁，他就住在我家后面五里路的地方。现在他的房子已经全部毁灭完了。李伯清的儿子叫李先藩，被枪毙了。

问：你还知道其他被枪毙的吗？

李：还有李汶舟、李沛东、李沛承、郑少鼎（音）、李鸿钧。李鸿钧开的染房，又开了药铺。他是我们李家辈数最大的，但他才 30 多岁，那硬是把他的脑袋打得没得了。

（五），李盖五之死

李盖五是我的堂祖父，比我祖父（李孟洋）小九个月。他是我们李氏家族最后一任族长，解放后他还立了功，在奉节县当了统战部长，土改时也把他抓来整，用钳子把铁丝捆在他头上，还捆上一些烂棉花，然后淋上煤油来烧。整了好几天，

他最后是饿死的。

（注：关于李盖五之死详见本书《焚火之后的大水井地主庄园》中“李氏家族最后一任族长的命运”和李宗农的讲述。）

（六），李盛榭妻子之死

李盛榭也是横石村我们李氏家族的人，但他“解放前”（1949年前）已经死了。他的老婆姓刘，是嫁到李家屋的媳妇。土改时她50多岁，把她抓来斗打。民兵问她想睡“软铺”还是睡“硬铺”，她想到自己瘦，就回答说睡软铺。



火马草

农村有一种植物叫“火马草”，这种草一碰到皮肤就火烧火燎地痛。于是，他们去割了几背篋“火马草”来，然后把她脱光，几叉叉子把她叉到“火马草”上去，她痛得在上面打滚，那一滚后全身就胖了，肿起来了。接下来他们把她绑起，手脚都绑起，用火钳夹起“火马草”，一束一束地往她阴道里塞。

当时没整死，但是那个鲜血直流。她有一个过继（抱养）的孙孙，有十七、八岁了，是贫农出身。民兵叫他把她背回去。在背回去的路上，她说“我想喝水哟。”她孙孙用角树叶给她捧了一捧水，她喝了就断气了。

（七），王大湜之死

王大湜是我妈妈王明淑娘家那边的人，在土祥镇梅魁乡。那儿有一个王家大庄（园），那是一个文化集中的大家庭。大庄王家有10弟兄，是两个妈生的。大妈是我们李家的子女，是我们的高祖母，嫁过去的。10弟兄中前五弟兄老大，老二、老三都是举人、老四是拔贡（半个举人），老五是秀才。后面五个，老六、老七、老八、老九我记不到名字了，他们都在土改前去世了。土改时只有老幺还活着，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他叫王大湜，又叫湜老爷、幺老爷。土改时也把他抓来整，那也是用了各种刑罚，一整几个月呀。他要死之前是这样折磨的。



李曼讲述时

先把他家里的女人捆好，睡在地上，然后把他捆起，嘴就放在女人的生殖器上。女人撒尿时就要他喝，喝尿。最后把他翻过来，他躺在地上，把他的曾孙媳妇绑起放在他面上。他曾孙媳妇正好来了月经，一股一股的，他们强迫他喝。他喝女人的尿和月经，还多活了几天。

滢老爷的后人，不知道有几个，全部整死完了，只剩下一个，跑到黑龙江去了。

对了，就在那个王家大院里，前后整死了几百人，好像是 389 人，我写的书上记得有。书记录的是我们李家如何发家，土改如何败下去，有 20 万字。书被我兄弟拿去了，你现在看不到。

（关于大庄王家，参见本书“他死于‘收买人心罪’”一文。）

（八），母子俩之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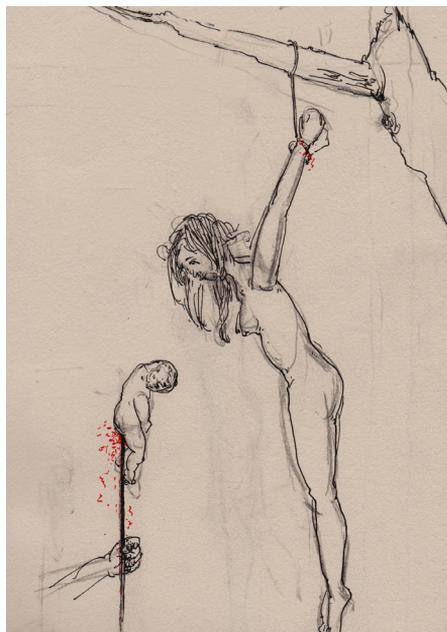
我们这儿，整死的人多，有的一家一家的整死完。就我们洋沱坝，就有一对母子被整死。

有个小娃娃，把他妈抓来吊起，吊起后，他们把她才满月的小娃娃抱来，用矛杆子从他肛门戳进去，那矛杆子有这么长，戳进肚子里面！这么小的娃儿，他有什么过错？他们把戳在矛杆子上的奶娃举到他妈胸前，说：“你看哟，你儿子来亲热你了，他想喝口奶。”

他妈也死了，两个都死了。

问：妈叫什么名字？

李：妈姓彭，我一下想不起了。



“他想喝口奶”

（九），李先昭全家的遭遇

我叔叔李先昭住在离洋沱坝约 30 里的梅子园，当时与我们洋沱坝同属一个村——横石村（现在不是了）。土改时他家收多少担租？嘿，收 8 担租！他家还是有好大一坝田，为什么只收 8 担呢？因为李先昭也是工商业者，他开得有酒厂，收入不靠田地，所以，农民种他的田最划算，农民交一担租，自己要得十担甚至十几担。土改时主要是逼他家的金银。他全家有九口人，除了刚才讲的李先昭和他大儿子李载承，还有 6 口人死于土改，他的二儿李宗列也是整死的，但我想不起他的死因了。特别是他的三个女儿，被整得最惨。

（当问到那几个女儿，也是李曼的表姐妹是被怎样折磨的，老人不愿意谈。最后，李曼老人终于开口说了一点。）

那些民兵实际上都是些流氓！共产党就用这种人，土改时让他们当了民兵，当了干部。

他们把他女儿面朝下绑在板凳上，说金子就藏在她阴道里，他们用手去挖她阴道里面的金子。干部也去，民兵也去，一个个跑去轮奸。奸了之后，他们说，

这一下正好来打她的屁股嘛，就派两个民兵站在两边抡起板子打她两个大腿，把两个大腿打得稀烂鲜血长流。打了后一看，地上有好大一滩从她阴道里流出来的精液。

李先昭的三个女儿中有两个（李载承的妹妹，李曼记不起名字了）在土改中被折磨死了，那些折磨的手法我就没有看到了，是在屋里整的。有一个才16岁，是个中学生。李载承的姐姐整残了，神经失常了，她那年26岁。她也没活多久，一年多后就死了。

他家九口人只剩下一个，就是李先昭最小的儿子，叫李宗沛，当时只有3岁。是同情他的人给他一口饭吃这样他才活下来。李宗沛现在还在，而且还有后代。当年地主子女找不到老婆，他又想传香火（传宗接代），后来他找了一个瞎子女人，那个女人给他生了两女一儿，靠他一个远房表姐的帮助，他们都上了大学，有两个还留学国外，有一个还是个博士。



李曼讲述时

三，我的爷爷李孟洋

我曾祖父发家是靠开铁厂和煤厂，挖煤，此外还搞盐运，云阳县产盐，他把云阳的盐运到下江去。他有四个儿子，我爷爷李孟洋是老大，他分了九十多担谷。

爷爷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同秋瑾等人在一起。他毕业以后回来，到成都熊克武手下做事，当时熊克武是四川省的都督。他干了一段时间，觉得不适应官场，就告病还乡回到洋沱坝。

我爷爷酷爱书画，一辈子收藏书画。他回乡后修了一幢房子，农民叫花屋，有三层共九间，其中四大间全部用来藏书。他的藏书有七个方面的来源，我一时讲不了。我们李家祖传的书籍主要也在他这儿。他离开成都时，熊克武送他五千银元，他的同事（也是熊克武的幕僚）又凑钱送了他五千多，军政府又发给他一万。他回来后，仅在奉节把他的上万幅字画拿去裱，就花了整整一万银元。



李孟洋花屋遗存

我曾经给那些书籍编目录，仅目录就编了四大本，每本有两指厚。他的藏书中很有些大部头，记得仅

《佩文韵府》就有 1800 本。《佩文韵府》是讲词性的，那一个“月”字就占了三本，收集了古人用这个“月”字的情况。《佩文韵府》的序是乾隆皇帝亲笔写的。

字画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条七、八丈长的白绘绫。白绘绫是日本产的丝织品，完全是真丝。那是我祖父留学日本的一个纪念品，上面有几百人的题字，最前面的一首就是秋瑾写的。她的字比其他人的字大。我很喜欢她那个的字，所以背下来了，现在我还背得到一部分：

地球面积为舞台，五色民族各一派，
太素元素作帷幕，精神脑力为器械，
斗智斗慧斗新奇，刁钻狡狴众称快，
或和或战或悲欢，意态分明演百般，
但知日日登场好，那晓天公冷眼看。

.....

问：其他题字的是哪些人你晓得吗？

李：晓得，以前我全部背得，现在一下背不到了。

土改的时候，工作组的人，里面只有一个人识字，说这些书画是封建毒素，要彻底粉碎封建毒素，因此，天天派人来背书去烧。

我很心痛，想阻止，结果被抓去斗打，他们冲我吼：

“这些旧意识的东西，这些反动的东西你为什么要珍藏起来？！”

所有的书画都烧干净了，前后烧了五、六个月，光纸灰都挑了几百挑，挑去肥田了。

白绘绫没有烧，农民没见过，以为是布。他们把它撕来分了，拿回去缝成裤子，女的穿起来开会我还看到的。

我爷爷死在烧书之后。土改时我家里已经没有什么财产了，爷爷是个读书人，不善经管，修房子又花了些钱。我爸爸李仲达抽大烟，败了家，分家到另一个村去了。当时家里还有一担包谷，几担黄豆，那一年的黄豆好得很。结果把我祖母抓出去吊，他们就把黄豆挑走了，黄豆我一粒都没吃成。包谷也被拿走了。

他们把我们抓去整主要是追逼金银。所有的地主都是逼金银、花纱布匹——棉花和棉花纺成的纱线。



当年烧书的地方（洋沱坝），现利川柏杨镇水井村

问：追出些金银了吗？

李：哪里有哟？没得呀，只是从挖坟里挖到一小点。但是玉多，都是从坟里挖出来的。我们家族被挖了几百座坟，全部挖完。他们挖苦说，李家坟埋得好哟，请风水先生看哟，结果挖得一个不剩。



李家残存的院子

土改那年（1951年）雨多，雪也大。我爷爷被关在一个石房子里，又冻又饿，饿了两三天，最后把他丢在一个石头垒的巷子里，他就死在那儿了。那是1951年的冬天，他68岁。

当时我已经被关押在村上的农会里，爷爷在屋里躺了几天后，他们把我放回来埋他。

埋的地方就在我身后那个垮垮里，叫强盗垮——因为那个垮垮里的包谷年年都被偷，所以说叫强盗垮。

你想去看？看不到了。他的坟被人挖了。我们这儿认为，母猪病了，要用人骨头烧成灰来喂，小猪要喂得肥，也要人骨头去喂。于是有一个人（他的后人现在还在）就把我爷爷的骨头挖出来去卖钱，治母猪的病。

补记：

田赤、方国剑、孙孺写了一本书《大水井古建筑群》，其中有关于李孟洋的部分——



洋沱坝地主庄园遗迹

大水井著名学士李孟洋的命运

李孟洋1884年生于李氏八大庄园之一的洋沱坝庄园。1904年，他自费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医学，并一度参加了同盟会，结识了秋瑾、熊克武等著名人士。

李孟洋回国后，曾在好友熊克武（曾任四川督军）的力邀下出任四川省第一届议员，但他很快厌倦了官场，弃官归隐。李孟洋回乡后，诗书自娱，著有《扶桑求学记》、《婴育学》、《廉溪诗钞》、《廉溪杂议》等。

李孟洋极富同情心，为当地人办了不少好

事。据说，有一年春节，大雪纷飞，李孟洋发现屋前有一个女乞丐躺在树下，即将临盆。他急忙吩咐家人打扫房间，生起火炉，然后亲自把乞丐请入屋内，为其接生。这一下在族内引起风波，因为当地风俗，不能让别人在屋里生小孩，否则会带走主人的财运，何况那人还是一个脏兮兮的乞丐。族中很多人都来劝阻。李孟洋大为生气，对他们说：要败家就败我这一家，要死人就死我一个人！决不牵连你们。

在李孟洋的精心护理下，女乞丐顺利产下一子，满月后，乞丐执意要走，李孟洋又送了她许多衣物、食品。

九·一八事件后，李孟洋对日本极其痛恨，儿孙辈有想从他学日语的，他即大声呵斥。

李孟洋曾四处收集珍本善本，收藏大量的各种书画，每年夏天，他都要请 20 多个人帮他晒书。他结交的夔州府中学堂洋教习丰田少太郎（日本人，曾在中国生活 30 多年）曾为李孟洋书斋题写：“橱有中西百万卷奇书”。

1951 年土改时，这些书被收缴起来，找来 10 个人专门焚烧，每天烧几个小时，烧了半年才烧完。焚烧后的书灰，堆满了一块田，农民都说书灰是肥田的上等肥料。

据李孟洋后人介绍，李孟洋留学归来时，篋中有一幅 20 多丈长的白绘绫书画长卷，上面全是当时留学日本的近百名友好的诗文，第一首诗就是秋瑾亲笔书写的古风作品。这幅珍贵的书画长卷也在土改时被毁了。

土改时，李孟洋的家业已败，但有人说李孟洋从日本回来时带有 70 箱金子，于是逼他交出来，天天组织斗争，李孟洋不久就在斗争中去世。李孟洋死于 1951 年，享年 66 岁。



洋沱坝地主庄园遗迹

采访时间：2016 年 8 月 11 日、8 月 13 日

地 点：湖北省利川市柏杨坝镇水井乡水井村
(原奉节县横石村洋沱坝)

采访后记

2006 年 8 月，我到湖北利川采访当年李氏庄园的土改干事向贤早先生时，就听他说，在李氏八大庄园建筑中，洋沱坝的雕饰最为丰富。他还告诉我，李氏

家族有个著名学士叫李孟洋，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医学博士，他有很多书，土改时全部被农民烧了。当时，由于向老先生马上要动手术，只得匆匆结束了采访，对李孟洋未能详尽了解。

十年后，2016年8月，我在制作土改纪录片《血红的土地》时，专程到洋沱坝去拍摄外景。

洋沱坝在著名的大水井李氏宗祠下面10多里的地方，比较偏僻，路也很烂。到达一条小河边时，我向桥边一个小屋里的老人问路。没想到，这位88岁多的老人就是李孟洋的长孙李曼！

老人一直住在利川社会福利院，当天刚好被家乡的一位朋友接回老家小住。他只比我先到达两个小时。

我一直觉得，冥冥中一定有神灵的安排。他仿佛是专程回来等我的到来。他等了65年！

于是，在我早已完成了土改一书的编排，并已经“金盆洗手”之后，我遇到了本书中唯一的一个受尽酷刑而活下来的老地主。



他等了65年

他在他孤寡人生的迟暮之日，用清晰的语言，讲述了六十多年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注一：李曼老人在我采访他之后9个月（2017年5月）去世；

注二：李曼的讲述录像已经编入谭松、丁然制作的九集纪录片《血红的土地》。



李曼的老家洋沱坝，也是烧书和上述一些悲剧发生的地方

这是人做的事吗?!

讲述人：颜恩统

忠县花桥镇鱼箭7社农民，80岁



我今年80岁，是忠县县立中学四班的学生，毕业于1942年。县立中学就是现在的忠州中学。中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那时叫显周乡，当时在乡里我算是文化比较高的，所以，老乡们就推选我当了保长，那年我才16岁。要是知道后来会发生那么多可怕的事情，我是绝不会去当这个保长的，其实我当保长的时间很短，没多久我就去乡中心校当老师了。

我家有四口人，父亲颜洪星，母亲王氏，没有名字，我有一个哥哥，抗战时上战场打日本人，去了就没有回来，死在前线了，这样我就成了独子。

我们家田产不多，只有300丈，折合不到3石粮，其中自耕一半多，出租不到一半。为什么出租？哥哥死在前线，我又在教书，家里缺少劳动力，就出租了一部分给人家种。土改时评成分硬是把我们评成地主，活天冤枉啊！按照当时共产党的政策，要25石租才可以评地主，我家就算全部出租也不到3石，怎么是地主呢？但是哪个让你申辩？他们想怎样整就怎样整，说什么就是什么。只要有一个人说你是，没有另外的人反对就行了。我就是这样成了地主。当时工作队是西南工作团——从部队转业的，对政策搞不清楚，反正听群众的。想申辩？你敢！我常常在想，如果真正照共产党的政策办事，我们乡只有韩茂生一个人够地主资格，其余一个也不够，但是我们乡被评为地主的太多了，枪毙的枪毙，判刑的判刑，管制的管制，连子孙都受尽了迫害，迫害了就迫害了，几十年过去了，还不是算了。



颜恩统的土屋

我除了被评为地主外，由于16

岁时当过保长，又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于1951年2月被逮捕，判刑5年，押送阿坝藏族自治州劳改，刑满后我留场劳动到1962年才回乡。

土改时的那些恐怖场面不堪回首，提起就难过。

老龙三队王石泉和王万木父子二人同时在鱼箭滩河边被枪毙，我被押去“受教育”，其实就是陪杀场。王石泉的罪名是“干恶霸”，什么“干恶霸”，乱栽的。王万木最冤枉，被枪毙时只有19岁，好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哟，他的罪名是反革命，说来太荒唐，他连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都搞不清楚，一个山区的娃娃，哪里都没去过，知道什么革命反革命？乡里的工作组把他关起来，问他是不是反革命，他以为“反革命”是个很光荣的名字，就满口答应是反革命，哪晓得这就要了他的命。等到他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时已经没办法了。拔山区的领导对他是不是反革命有些怀疑，派人送信到显周来，叫暂时不要枪毙他。送信的人走了20里山路赶到显周场，有些累了，就在场上歇了一会，抽一杆烟再赶去鱼箭滩刑场，就在慢慢抽完烟走出场口时，听到鱼箭滩上的枪响了，显周到鱼箭滩很近，如果不是抽那一杆烟，王万木就不会死。

土改、镇反时杀人宣判



那一次杀了七个人，是何世新主持的，除了王石泉和王万木父子二人还有王在新（乡长）；陈俊峰（音）在县府当过几天兵，给他安个兵痞的罪名杀了；周定芬是解放前乡公所煮饭的炊事员，吴家场人，也杀了。当时枪毙人没有标准，你要喊冤，一句话就把你打回去：“群众还会把你冤枉了。”“群众”太可怕了！你要再不服，吊起就打。不犟（不喊冤），还少受点皮肉之苦。

仁和村的颜桂轩在土改时已经80高龄了。颜桂轩民国时在县政府当了30多年的科员，一生清正廉洁，没有买过田地，只有祖上传下的几石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劣迹。他写得一手好书法，经常在县城狮子坝一家裱褙铺帮人写字，人缘很好，人们见到他都友好地给他一支烟。他在城里谋职，家里无人种田，就租给别人种，就这样，土改时也被评为地主。由于他30多年都在城里，家乡实在

找不到他什么“罪证”，就说他在城里每天吃人家的烟是严重的贪污，30年算下来就贪污了不少。80岁的老人，身体已经很衰弱了，还是要弄来反复斗。落雪的寒冷天气，把他拉来“坐水盆”——就是脱掉裤子按进冰冷的水盆里受冻受辱。每天没完没了的斗争，他那么大一把年纪的人，好痛苦哦。他妻子比他年龄小一些，还勉强能撑住，看见他每天那么受苦，妻子实在于心不忍，就在一天晚上和他大哭一场后，狠着心把他卡死在床上，好让他得到解脱，不再受活罪。放哨的民兵发现后赶紧堵住他的屁眼（农民认为人死时气往下落，堵住肛门就可以不落气），不要他落气，还想再斗他，但是他已经死了。死了好些，少受活罪，当时真是生不如死。



土改酷刑之一：“吊木脑

韩茂生是被枪毙的，他妻子何代群被民兵们在光天化日下脱光衣裤按在地上分开两腿，把一个“包谷球球”（脱粒后粗糙不堪的玉米棒）插进她的下身去反复捅反复转动，何代群当场昏死过去。这是人做的事吗？不忍听闻！把人家男人枪毙了，家产没收了，还要做啥子嘛？她没有死，手被吊打整爪（残废）了。周武灿的手也是被整爪的，捆的时间长了血脉不通，手怎么不爪呢。

拔山乡五星村是冉泽民主持斗争大会，他把地主十多岁的女儿裤子扎紧再把黄鳝放进下身去乱钻，哪个不怕？他还扒光她裤子双腿分开站在两个马凳（木工用具）上用火烧下身，还美其名曰“烧飞机洞”。简直惨无人道！地主的女儿还没成年，有什么罪？这是人做的事吗！就是那个冉泽民搞的，他是八德乡人，当时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

我被捕后关在拔山区监狱，和我同一个牢房的有一个叫李光荣的人，他是县中三班学生，比我高一班，任八德乡小学校长。我看见他腋下有一个很大的伤口，已经溃烂化脓，脓血发出的恶臭我都能闻到。他每天疼痛难忍，当脓血流出时，他就拿碗去接，吓人啦，脓血多得用碗接。从来没有人给他哪怕一点点药，他只有听任伤口溃烂。他的罪名也是反革命，这事也非常荒唐。土改高潮时，一个积极分子在他家墙外听见他和妻子商量：“是绑起来杀？还是不绑就杀？”积极分子据此认定他要杀民兵，就把他划定为反革命关了起来。而事实的真相是，他和妻子是在商量杀鸡，他是个知识分子，不会杀鸡，想绑起来再杀可能容易些。事后李光荣百般申辩都毫无用处，那些人对他进行了残酷斗争，李光荣腋下的伤口就是在批斗会上被他们打的。李光荣居然活了下来，现在还健在。

（关于李光荣的遭遇详见本书“从小学校长到死缓囚犯”）

那时给地主喂狗屎喂尿是常事。张仁强（显周医院退休医生）给我讲过，他的一个亲戚，是黄埔军校毕业的，给他喂狗屎他规规矩矩地吃了，做什么都忍受了，最后还是把他枪毙了。

我去劳改后，父母没了儿子妻子没了丈夫，他们在家受尽了折磨！

莫提我父亲，不能提，提起我就痛心……父亲一辈子什么坏事都没做过，也没当过保长甲长之类，他一辈子就是种田。因为我的关系，1957年反右运动时，他被活活毒打致死。反右运动是在城市里针对知识分子展开的，我父亲是一个偏僻山区的农民，按理说无论如何也不是斗争的对象。但是，自从解放以来，我家乡历次政治运动都有一个规矩，就是不论怎样总要找几个人来斗争才算有成绩。找什么人呢，当然是地主啰，所以我父亲每次运动都难逃劫难，反正说他不老实，“老实”已经没有界限了。反右那年的八月初三，是令我伤心一辈子的日子，那天我父亲和妻子同时被拉到大河坝去斗争，就在鱼箭滩上面的一个竹林旁。所谓斗争只不过是一个政治术语，其真正的内容就是毒打，每次如此。你问是哪个动手打死的？群众啊！是的，“群众”两个字太可怕了。负责主持斗争大会的是村党支部副书记颜光普，我本来是他的恩人，他被拉壮丁，跑到我家来躲，我当时是保长，他们家的人给他送饭，我说：“送啥子饭嘛，和我们一起吃就是。”就这样他才逃脱了拉壮丁。我怎么不是他的恩人呢，要知道，我亲哥哥都是拉壮丁出去死在抗日前线的呀。谁知道“解放”后颜光普翻脸不认人，讲起阶级对立关系来，把我家往死里整。他对打手们说：“年轻的还要干活，颜洪星那个老家伙留着也没什么用了。”意思就是要打死我父亲。打手们得到了书记的指示，打起来就毫无顾忌了，木棒柴块一起乱打，我父亲被打得满地滚，后来连滚都滚不动了。颜光普看见我父亲已经差不多了，才叫我妻子去挽起来。我妻子挽着父亲往回走，才走出十几步，父亲说要喝水，水还没喝完就一头栽下去，再也没起来。父亲的尸体草草地埋在鱼箭滩河边，没多久就被山水冲得不见踪影。



土改酷刑之一：“烧八筒花”——用点燃的香烧地主赤裸的后背

母亲和我妻子一起艰难度日，苦不堪言。他们白天劳累，晚上民兵随时都可以来查哨，让你无法睡觉。到了秋收好不容易有了点救命的粮食，贫下中农们可以随时闯到我们家来把粮食抢走，就因为我们是地主，真不知那是什么世道。三年大饥荒时，母亲和妻子什么野菜都吃，连稻草都磨烂了吃，母亲还是没熬过来，饿

死了。

我是1962年从劳改队回来才知道父亲和母亲惨死的经过，我去找父亲的墓地，已经白茫茫一片什么也没有了。我放声痛哭，我对不起父亲，身为独子，连他的尸骨都找不到了。可是，除了痛哭，我还能做什么？我仍然是一个被管制的地主加历史反革命，人们依然可以随时斗争我。

听到妻子说起我去劳改后家里十多年来的苦难，我真的庆幸我去劳改了，如果我没去劳改，在家不被打死也要被饿死，总之绝对活不出来，我真的万分感谢劳改队，是劳改队救了我。

同家中那些地狱般的日子相比，劳改队算得上天堂，我摸着心窝子说句大实话，在劳改队的10多年，是我“解放”（1949年）后最幸福的日子。

附带讲讲劳改队的故事吧。

我们先是在重庆北碚劳动，后来远走阿坝州去修成阿公路，我们修的路段在著名的鹧鸪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飞雪，自然条件非常恶劣。那条公路可能是五十年代我国修筑的最艰难的公路，其艰苦程度难以形容。但是，我却很高兴，第一是吃得饱，还有牦牛肉吃；第二是每年都要发冬夏衣服，冬天的棉衣很暖和。就这两点，在家里是绝对没有的。更重要的是，只要好好劳动遵规守纪，就没有人来斗争你，这就少了许多恐怖。劳改队的指导员是四川达县人（今达州市），叫张文强（音），那真是个好心人，他平常对我们很和气，从来不对我们耍威风，时间长了彼此熟悉了，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有时还大胆说些真心话。他总是很善良地提醒我们：“这些话跟我说没关系，千万不要去对另外的干部说，说了要惹麻烦哟！”他工资不算低，但是却不给家里寄钱，说家里钱多了不好，要穷才光荣。我们缺钱时，他总是主动借钱给我们，我现在都记得，他把手摊开，叫我们自己拿钱，一元两元随便，等有了钱再还他。那时一元钱是很值钱的哟。犯人家寄钱来都要先由他审查，他从来不趁审查的时候先扣回所借的钱，而是把钱如数交给犯人。犯人去给他还钱时，他却从来不收，一律免了，说：“我不缺钱，你们的钱来得不容易，自己用就是。”这种人要不是我亲眼见了，还真不相信。通过他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不论在多么残暴的年代，人性中最美好的东



老人在破败阴暗的土房里，守候着生命的最后残光。

西依然会在一些人身上表现出来。后来，张文强调走了，他离开时，我们所有的劳改犯都流了泪。劳改犯都是些经历过大悲大痛心如死灰绝不轻易流泪的特殊人群，为什么会一起流泪呢？就是他太令我们感动了，直到现在，我还记着他的恩情。

我老了，身体又不好，我已经预先写好了自己的悼词。我讨厌现在的风气，不论生前做了多少坏事的人，悼词都把他说得很好，从来不说坏。我的悼词把自己的罪过也写了进去，我是有罪的人，我的罪不是别的，就是对不起我的父亲，他生前我没有尽到孝道，他死后我没有保护好他的尸骨。我有罪呀。

采访时间：2006年5月4日

地点：忠县花桥镇鱼箭7社

采访后记

80岁的颜恩统老人住在一间破败阴暗的土墙房子里，同妻子默默无语地“守候”着生命的最后残光。老人受过良好教育，容颜虽苍老，但眉宇间不乏儒雅之气。

老人在讲述往事时，他妻子一直默默不语地坐在旁边。从外表上可看出，那是一个受尽了侮辱与艰辛的女人。由于多年的折磨，她双手已经曲扭，每天穿脱衣服都要丈夫代劳。颜恩统老人说，妻子都是为他才受了这么多苦，所以，他一定要好好照顾妻子，直到生命的终结。

补记：颜恩统老人于2013年去世；
朋友陈先生为本篇采访出力不少。



颜恩统夫妇

丈夫，枪杀！女儿，饿死……

讲述人：冉德瑜

土改时在四川涪陵清溪场被划为地主
1922年生



听说你在采访，我外孙女叫我千万不要说，这辈子整苦了，受了几十年的罪，还连累了她，不要又惹祸。我练法轮功，他们坚决不准我练，要惹祸，我没练了。五十年代的事，我亲身经历不是编造，说几句又哪个嘛，又把我弄成个啥子派？又把那两个帽子（地主分子、右派分子）还给我？

我是涪陵礁岩乡人，出生才4个月爸爸就去世了。我读书读到初中毕业，在涪陵女中。毕业后我结了婚，父母从小给我们订的婚，丈夫叫杨泽勋，比我小1岁，在涪陵省立中学读书。

结婚后10天，我离开家，到了丈夫家——涪陵清溪场。我在清溪场的南沱中心小学教书。

到1951年土改时，我有了四个娃儿，老大7岁，最小的半岁，正在吃奶。那个暑假，农会的人要我和丈夫集中学习，丈夫当时也在教书。他们把他弄到区上去，没要我去，因为我拖4个娃儿。丈夫走的时候对我说，我没得啥子问题，我没田没地，肯定不会评成地主。

农会组织开会，先把我评成自由人，第二天叫我站到中农那一堆，第三天又说，你站到那边去。“那边”就是地主成份和地主出身的人。我说，我又升级了，三天升三级。我说这话的时候还没意识到当地主的可怕。我想，我一无田、二无地，娘屋虽然有几亩地，但我早就离家了，妈妈在我结婚后几个月也死了，我一个干人，算那门子地主？！



农民协会划阶级成分
选自“中南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
中南人民艺术出版社 1953年12月

农会说：“你教书就是不劳动，是剥削阶级。”

他们来抄家，半夜突然来的，先把我们母子五个从床上赶起来，赶到外面站起，他们在里面翻箱倒柜，稍微好一点的东西都要。有一床被盖，棉絮不好，面子还可以，他们就把面子拆下来拿走。我几个娃儿衣服都没穿，冷得哭。我不要命地冲进去，把娃儿穿的那身衣服抢出来。农会那些人挑了满满几担东西走了。最缺德的是他们还把屋锁了不准我们进，我们母子几个只好钻到灶房旁边搭的一个偏棚里。

（毛泽东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盛赞了农会的这种“痞子精神”。）

那床农会没看上眼的破棉絮，是我们那个冬天惟一的被盖，我给四个娃儿盖，我晚上不脱衣服，蜷在谷草堆上。棉絮很快就更破了，到处是洞，我连绳线都没有，用谷草把洞扯拢来。

其实，冷还可以挺过去，肚皮饿才叫恼火。丈夫弄走没得消息，不准我教书，也不准我外出——农会的武装人员说，为了防止敌人破坏土改，进出都要通行证。我是地主，不准我出去，一家人没得经济来源，我的三女儿就是这个时候饿死的。

那天晚上，她“妈呀妈的”哭叫了一夜。“妈呀，我要吃饭哟，我要吃饭哟。你去煮饭给我吃嘛。”我说，哪点来米嘛，灶也封了的。她的哥哥姐姐饿了，红苕藤、糠粑粑都吃，最小的一个还有奶吊倒（即一点人奶吃），只有这个老三，倒大不小，非要吃饭。一晚上都在哭叫，最后她说：“妈，你到奶奶那里去给我舀瓢水喝嘛。”我说，“恁个晚了，别人门都闭了。”女儿没有再叫了。天亮前，她死在那个偏棚里，死时还不到3岁。

（这是我第二次听冉德瑜谈到她三女儿的死。第一次是2001年11月25日在长寿湖狮子滩一家饭店里。那次，当着许多人冉德瑜声泪俱下，泣不成声。这一次，她只是默默地抹了抹眼泪。）

我去给人干活，找的丈夫家一个亲戚，我喊她五妈，她家评的是中农。我在她家推磨，天天推到深夜12点。她给我半升包谷，我要米，她不给，每天都是包谷。

农会分给我一块地，叫我种，我不要，我腰无分文，买种子的钱都没得。农会说，嘿，你这个人怪，别人翻身，分田分土高兴得很，你还不要。所以我说我是个“翻身地主”。（“翻身”指获得解放，当了主人的意思。）

我们母子几个身上只有那天夜里从农会手头抢出来的这身衣服，没换的，穿了半年，又脏又烂又臭。说起来不怕你笑，我们全家一身都是虱子，密密麻麻。咬得没办法，我烧一锅水，关起门，脱光，把衣服放到锅里煮，水面浮起一层虱子，我大儿子抓了满满一把。我不是乱说，不是加盐加醋，我只有说漏了的。

有个人看我艰难，悄悄说：“你出去借点钱来把地种了嘛。”我说：“不给

我办通行证，我不敢走。”他说：“你不走大路，晚上走小路。”我照他话做，悄悄跑到清溪场找我三姑。她给了我两升米，3块钱。我拿这3块钱买了莽子，胡乱种在土里，咦，长得好得很。我收回来，娃儿不吃，说黑糊糊的是猫屎。我吃给他们看，他们才勉强跟着吃了。

我每天出去帮工，让儿子照看小的。儿子要出去打柴，妹妹弟弟没人管。有一天我回来，发现二女儿不见了——被人偷了！我又气又急又哭，农会不开通行证，我走不出去，到哪点去找嘛？！你问娃儿爸爸？他已经不在了！（19）50年那个暑假他被弄到区上去，我就再也没见到他。后来我听我那个妹说，她亲眼看见了的——农会把他抓来斗，说他是反革命。叫一个人上去斗他，那个人说，杨泽勋嘛，乡坝头看到长大的娃儿，从小读书，平时对人又好，斯斯文文，客客气气的。农会不要那个人说了，换一个人上来，新来的人还是这样说，一连三个人都说杨泽勋是个好人。农会只好不斗了，干脆判他死刑。那天杀了好些人。杨泽勋跪在地上，五花大绑，武装(人员)对着他后脑扣扳机，连扣三枪都不响。杨泽勋扭回头来看，他们说，他还以为自己只是陪杀场。那个武装慌了，连连说：“杨泽勋，不是我要你的命哟，不是我要你的命哟。”

农会换了个人上来，还是把他打死了。

（说到这儿，冉德瑜老人突然提高声音，异常激愤。）



冉德瑜异常激愤

他死时才28岁，没有做过一丁点坏事哟！

他从小读书，后来当个小学教师，说他是反革命就是因为他中学毕业后在涪陵地镇科当了几个月小科员，抄抄写写，学校出来的一个学生娃儿，找点事干就把人当反革命杀了？！

我最艰难的日子是那一年春节。哪一年？记不清了。是二女被偷走后的那个春节，大概是1952年，大年三十那天，他们派人来通知我，春节10天不准出去干活。我立马慌了神，家里一贫如洗，啥子吃的都没得。晚上我抱了一抱柴、砍成条，大儿子帮我捡，我对他说，明天早上你起来去给别个送柴（即送财的意思），别人肯定会给你点吃的。儿子答应了。

第二天儿子背起柴，脚刚要跨出门，不干了。他说：“妈，我不去，别个会说我是叫花子（要饭的）。”我说：“不是去要饭，你去找五妈、三姑他们，他们是亲戚。”儿子又往门口走，一到门坎，他脚就抬不起，硬是迈不出去。扯了四、五次，他哭起来，要我去。我说，你娃儿去要好些，我是个大成人。他还是不去，我气不过，一把抱过柴来说：“好，好，我去！我去！我出去就不回来

了。”儿子一听，吓得大哭，他扑过来把我吊倒，“妈！妈！你一定要回来！”

（冉德瑜老泪纵横，边哭边说。）

我对儿子说：“你看到家里没吃的，要想饿死呀？那个老头子叫我嫁给他，有饭吃，你要不要妈嫁？”儿子说不要，但他还是迈不出去，最后还是我去的。五妈他们给了糖、汤元和糍粑，把柴也还给我了。

那10天是我一生中最恐慌的日子，我一辈子的苦难加起来都不抵那10天，两个女儿已经没了，剩下两个儿子不能再饿死。快点过呀，快点过呀，过了年好出去做活。到第10天的晚上，我扯起喉咙对着外面喊：“你们想把我们母子饿死，不得行！我们活过来了，没有死！”

孙女叫我不要说，我给你说了，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我没说一句冤枉话，没有冤枉共产党，我只有少说了的，说漏了的。

打死我丈夫的那帮农会的武装（人员）中，有一个叫彭癞子的人，这个人以前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干聊子（穷光蛋）一个，讨不到媳妇。进了农会后，他神气了，背杆枪到处走。他看上了我，托人来说。我气得发昏，吼起来：“把我男人整死了还想来要我？！”有一次开会，别人又说这事。彭癞子嘻皮笑脸地说：“咦，我有这个福气呀！”我霍地一下站起来，当场冲着他说：“你看好了，你是贫下中农，我是地主，你站在啥子立场？！”

他后来把田分来靠到我的田，背杆枪走来走去想欺负我。人到这份上心也横了，我不怕他，跳起来和他斗，我说你敢一枪把我崩了？！他没有占到便宜。

我种不出来粮食，交不了公粮，上面来的工作组找我问原因，我把情况原原本本给他们说了。我要求出去找工作，求他们帮忙开通行证。工作组的人同意了。彭癞子还想卡我，想强迫我嫁给他，但工作组的人点了头的，他拦不住我了。

我打算到重庆一中去找冉淑芳，她是我姑姑，又是我女中的同学，她读了大学，在一中教体育。我没得钱，一个亲戚给我买了张船票。我把小儿子托付给我表嫂，她也是个地主，大儿子交给祖外婆。大儿子非要跟我走，他说他去帮人带娃儿。我说，多一个人要路费，妈的路费都是别个给的。我硬把他留下来，他哭得伤心得很。

我坐船到了重庆，不晓得沙坪坝在哪点，有好远，边问路边往沙坪坝走，走到化龙桥的时候天黑了。我觉得前面迷迷糊糊，走一段，看到前面是山，没人，我又折回来。走投无路的感觉啊。后来我写了一首词，读给你听：“涪山青，渝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乡情。娘泪盈，儿泪盈，骨肉分离娘断魂，泪海心难平。”

我身无分文，在化龙桥找了一家理发店，问他们要不要打工的。那个老板打量了我一阵，把我收下了。我在那家理发店干了半个月，老板看上我了，他死了

老婆，想娶我。我不愿意，想到在乡下的娃儿。离开的时候，老板给了我一个月的工钱，还说，要是没办法，可以再回去。

我在一中找到姑姑冉淑芳，我住在她那点，去报考了速成师范学校。等通知的时候，我想娃儿想得要命，忍不住要回去看。姑姑说，你走了，通知来了哪个办？先把娃儿放一下。我说，不得行，放不下。

再说说我大儿子。我走后他失魂落魄，经常跑出去漫无目的地找我。有一次他走了很远，到了一个亲戚家，要他们帮着找妈妈。那家亲戚没有理他，只给了他两个烧红苕就叫他走，他那里还走得回去？他一个人在外面一个草堆堆里过了一夜，他一个娃儿，不怕？他肯定要哭嘛。

大儿子开始发昏病，路也走不动了，一个多月时间，身子垮下来。

我回到乡下，大儿子一看见我，高兴得不得了！他说：“妈，你回来了？”我说：“我来接你，带你出去。”他立马活起来，病也好了。我本来找了个人背他，讲好背到河边两块工钱，结果路上他不要人背，活蹦乱跳走得上好。早晓得我不花那两块钱，但别人跟倒走了一趟。

在船上我给儿子买了一碗饭，儿子说：“妈，你呢？你也买一碗。”我说我心头不好，不想吃。我哪里是不想吃嘛，我饿得发慌，没得钱哪！5块钱还是女中的同学杨昌仁（音）给的，已经用了两块了。

（冉德瑜泪水又滴下来）

我带儿子到了一中，儿子破破烂烂，长一头癞子。姑姑说，这是学校，别人看得你这个癞子儿哪？她拿6块钱，叫他到外面去住。

儿子到段上去锤石子，每月5块钱，段上补助一块，总算有了口饭吃。

这个时候，我听人带信来说，我寄放在表嫂家的小儿子滚到茅厕（厕所）里去了，幸亏茅厕是新修的，粪不多，他在里面叫，才把他捞上来。

我一听，又往涪陵赶，我已经丢了两个女儿，儿子不能再出差错。我回到乡下，把小儿子背到重庆。姑姑吵我：“你工作都没得，慌慌张张把娃儿一个个弄上来，找些包袱。”我说：“你那些娃儿生下来又是亲爹妈，又是请奶妈，我们都是当妈的。”

这个时候，速成师范的通知来了。姑姑说：“你看嘛，你哪个办？”

我没得办法，只好又把小儿子送回去。在涪陵的时候，遇到一个亲戚，她说，你不要回去，送回去娃儿可怜，河边有个船工没得娃儿，一直想收养一个，把儿子给他算了。

我犹豫了半天，同意了。那个船工姓张，两口子很喜欢娃儿，立马给娃儿做了两套新衣服，还亲亲热热地抱他。他们要我写个手续，还要我去把儿子的户口办来。

同儿子分手时候，他哭着对我说：“妈妈，你要来接我哟。”

送了小儿子，我回到重庆，进速成师范读书，师范是供给制，吃饭不要钱，还发点生活用品。原先说读一年就工作，后来说太快了，再读一年。我找校长要求工作，我说我有娃儿，经济困难。校长不同意，我只好又读，这一读，就读到（19）57年鸣放。

鸣放我一句话都没说，到尾声了，积极分子非要我发言，他们说：“你不帮助党整风呀？你不发言，政治上想得2分？”我说我没得啥子说的，他们引导我：“你从农村来，经历过土改，你是哪个出来的，你看到的听到的都可以说。”

我于是说了我土改时听说的一件事：有个富农后来评成地主，他害怕，上吊自杀了。有人去找他开会，推开门，看到死人，骇惨了。他们还要我说，我就说到我三女儿，一提到她我就哭了，我边哭边说，她土改期间饿死了。

他们批斗我，说解放后新社会哪有饿死人的？你污蔑造谣！我哭着说：“是真的嘛，我的亲生女儿，不信你们去了解嘛，又不远。”

给我定了个罪——“攻击党的土改运动”，又给我戴了一顶帽子——“右派分子”。

在去南桐农村劳动改造的路上，我边走边哭，身上一分钱都没得，别个还可以买些生活用品，我走这么远，又担心娃儿。带队的人问我为啥子这么伤心，我说没得经济，生活哪个办，还有娃儿。他说，没得关系，有组织，要我依靠组织。

我在南桐农村，老老实实在地劳动。一中有个姓高的老师也来了，他说我大儿子在他家里带娃儿，现在不需要了，是不是把儿子送到南桐来。我赶忙求他：“高老师，你帮人帮到底。你看我这种情况，这个大山坡坡，娃儿来做啥？”

高老师找人把我大儿子介绍到8中校办厂去做活。后来他一直在那点干，直到前几年退休。

1961年我们全体转到长寿湖，在长寿湖遇到李长文，我们结了婚，这些你都晓得。

我说说找我二女儿的事，就是被偷走的那个，她被偷时才4岁多，我去找时已经过了快20年。长寿湖渔场给我打了个证明，我出去没走多远证明和钱都被小偷摸了。第二次又去。我女儿就是我们那一带的人偷的，这我晓得，有人给我说，那家人姓夏，他们偷了后还在清溪场住了一个星期，看我找不找。

我从那个沟沟问进去，挨家挨户的问起走，我只晓得那家人姓夏，住哪点不晓得。最后有个人说，夏家当年是弄了个小女娃回来，现在那女娃都结婚了，就在对门斜坡坡对面。呃，那不是，田头干活那个就是你女婿！

我赶忙走上去，对他说，我是他女人的亲妈。女婿听了，叫人去喊我女儿。

不一会，来了一群女人。有人喊：“夏渝碧，你亲妈来了。”我认不出她，她也认不出我，我二女叫杨云霞。我喊“云霞，云霞。”

女人堆有一个大肚子孕妇走上來，我看她长得象我大儿子。她叫我一声“妈”。我们两个抱头痛哭。

隔壁一个女的跟着哭，她也是被偷来的，她边哭边说：“我还不晓得我亲妈姓啥子。”

有的人说：“你找到女儿就把她弄走嘛。”我当然想，我要弄走有理由，是他们硬给我偷走的。但是她已经不是一个人，正怀二胎，当月就要生。她几兄妹东一个西一个，死的死，送的送，苦得很。她再苦嘛丈夫娃儿在一堆，何必再把她家扯散。农民就农民，干活吃饭平平安安就好，何必非弄个城市户口。别人说我开通，我说我尝够了分离的苦，再说她没读过书，出去怎么办？

其实，我二女小时候特别聪明，两岁多就能认300多个字。她被偷到夏家后，那个男人另外娶了老婆。她跟夏家的奶奶生活，从小就干活，去给别个带娃儿，挨了好多打，她命苦得很。不过，后来她的两个娃儿都从农村弄出来了。

（叫冉德瑜不要接受我采访的就是其中一个女儿。）

二女儿送我到长江边，我们在船上又抱头痛哭一场。

对了，还有我小儿子，七十年代他带着女朋友来长寿湖找我。别人给他讲长寿湖是个劳改农场，他以为有铁丝网，有哨兵。我见到他，一眼就认出来——他同他死去的爸爸长得一模一样。

在长寿湖，我也差点被整死。卢蕴伯就死在我眼前，我只差一点就步她的后尘。回想这一辈子，我不晓得哪个活到今天的。几十年都在骂自己“我是地主、我是右派，我要好好改造”、“我有罪”、“我有罪”。

我说给你听的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没乱编一句，你看，我的罪在哪点？

回想这一辈子，我写了首打油诗，算是总结：

两口小教无寸土，错划成份成地主。

夫含冤死子女散，我落荒村思骨肉。

地雨右风廿七年，廿七于我一家苦。

忍认他乡作故乡，青丝红颜老江湖。

注：①“两口小教”指冉、杨两个小学教师

②“地雨右风”指地主、右派

采访时间：2002年6月13日

地点：长寿湖农场子弟中学

采访后记

冉德瑜老人是我在采访重庆长寿湖右派时采访的一个“双料分子”——即地主分子和右派分子。

作为前者，她被整得家破人亡；作为后者，她被发配劳改 20 年。

作为地主，她是一个没有一寸土地的“剥削阶级”；作为右派，她的罪状是说了：“女儿在土改时饿死。”

她的经历，我已经收在了长寿湖右派采访录中，此书本不应再次收入。但老人的苦难集中在土改，她和她一家的全部不幸主要是因为土改。

想来也是，再加上眼下实在是难以找到还活着的老地主，于是，只得冒重复之嫌，将她收录在此。

与冉德瑜有间接关系的几名土改受难者：

一，熊异能——重庆北碚区回龙坝人，地主，1949 年前拥有一座雕龙砌凤的大庄园。1950 年减租退押时，农会要他交出“金烟杆”（黄金做的烟杆）等黄金制品。熊异能交不出来，农会将一个铁皮炉子里面装上烧红的炭火，捆在熊异能的背上，名曰“背火背兜”。待熊的背烤烂后，又用楠竹抽打，熊异能被打死。

二，熊异能的母亲（姓名不详）遭受同样刑罚，与儿子同时遇难。

三，李德珍——熊异能的妻子，她也遭受“背火背兜”刑罚，但未遭楠竹抽打，因此得以死里逃生。



土改酷刑之一：“背火背兜”

注：“背火背兜”的刑罚在川东土改中大量使用。

补记一：冉德瑜的讲述录音被重庆市国家安全局抄家时搜缴（2002 年 7 月 2 日）。

补记二：冉德瑜老人于 2013 年去世。

第二章 “听他们讲那过去的故事”

他们不是共产党豢养的作家、艺术家，他们不会创作，更不会编造。
他们是平均年龄在 80 岁以上的老人。他们在生命残留的最后时光里，
讲述了各自所亲身经历的一段往事。



一个当年地主放牛娃的讲述

讲述人：古昭永

奉节县吐祥镇农民，1936年生



我父母都死得很早，父亲死时我才7岁，母亲死时我才12岁。我成了孤儿，于是到一个地主家去放牛。土改时划成分，地主家的长工划为雇农，我本来也应当划为雇农，因为我也在地主家干长工，但我年龄小，于是给我划的成分是孤儿，也给我分了土地。

我分的是地主王当福（音）的土地，王当福是我们吐祥镇的一个大地主，有800多担（谷子），而且他还有很多金银。土改时没枪毙他，原因是他早早地就把所有财产全部交出来了。我记得当时专门找人抬起他的金银、金砖、金马儿，在吐祥镇游街展示。他因此被评为开明地主。

土改时工作组来动员，就说：“他这么大的地主，没有挖苦（剥削）你呀？你种了粮往他屋里挑，他吃你的血汗，你还没得仇恨呀？”假如你没去斗争，就来一些人强迫你去揭发，否则你就走不脱。那个时候又不讲什么实事求是。

问：你给地主当长工，恨不恨他？

古：我一个孤儿，他收留了我，让我肚子吃饱了，我还恨他？我恨他干什么？根本就不恨。

还有，我在地主家干过几年活，亲眼看到他们的生活。那时地主生活没有现在一般人生活好，很难找到吃白米饭的地主。比如，我们对面山梁子上有一个姓谢的地主，我们去挑他卖的包谷，在他家吃饭，要把红苕吃完了才能吃面面饭（碎米饭）。我在他家看到，吃红苕他家不削皮、不削苕蒂，如果你把皮子和苕蒂放在桌子上，他来看到了，一把抓起就吃了。很多地主都省吃俭用，要存钱买田。

斗地主我也看到的，那个时候把地主、富农整得很惨，比如跪在碎瓷渣上，膝盖鲜血长流，如果地主想轻松一点把屁股坐在腿上，那些“二杆子”就上来到他们屁股后面塞皂角刺，刺得他屁股血直流。

问：什么是“二杆子”？

古：“二杆子”就是当时农村那种“烂人”，这种人大多是地痞流氓，他们

下得了手。土改主要就用这种人，叫作“积极分子”，工作组就发动这些“积极分子”斗地主。

当时我们这儿有个叫王必辉的人，40多岁，给他划的成分是破落地主，我很清楚他的情况，家里实际上很穷。土改时就在现在我们旁边那个大屋里斗他。怎么斗呢，受刑，“猴儿搬桩”。在地上立一个桩，木桩上面破开，把他抓来跪起，两个大拇指紧紧捆在木桩上，捆紧后就在破开的木桩上加楔子，然后用锤子砸楔子，你拇指受得了？这就叫“猴儿搬桩”。

王必辉是个很善良的人，我不忍心，跑去问：为什么要这么整他，他是个“天良”人（大好人）。整他的人说，听说他有两条枪。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枪，被冤枉整。王必辉后来又被抓去劳改，劳改回来后就死了。

当然，地主中也有仗势欺人的人，举个例子，官家湾（音）有家地主，他家的马到坡上吃你的包谷、麦子，你不敢赶，赶了你就要挨打，这种地主就恶劣。土改时他家三弟兄都被枪毙了。

也有好地主，比如，我们这儿有个地主，看到他附近的农民家里困难，叫大师傅把饭煮起叫他们来吃。

问：枪毙人你看到过没有？

古：看到过的，多的是！

朝阳乡的陈可全（音），他娃儿叫陈光武（音），在县里读高中，土改把他抓回来在朝阳斗争，群众呼口号：打倒恶霸地主陈某某。陈光武说，他只是一个学生，不是恶霸地主。他还说了句：“农协会才是恶霸地主。”硬是把他枪毙了哟！枪毙时他才18岁。

刚解放时，错枪毙了好多人，把名望大一点的基本上都杀了。那时有个口号是这样提的：“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漏掉一个”

那时整得过火，我没文化，不晓得这是毛主席的政策还是下面乱整。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觉得，很多事都不讲实事求是。

就说划成分吧。

地主有大地主，恶霸地主，破落地主。大地主就是你的田地多，但人有天良（善良），恶霸地主主要是为人恶劣，不在于田地多少。我们这儿上了四、五十担谷的、或者出租25担的就划为地主。当时十斗一担，谷子一担是350斤，包谷一担是500斤。



“猴儿搬桩”，又叫“吃啞酒”

富农有自耕富农和佃富农，自耕富农就是自己有田地，自己耕种，划成地主又差一点；佃富农是自己没得田土，佃（租）种别人的田地。我们这儿像姚文昌（音）他们，就是佃（租）别人的土地，也划成富农。

如果田土不多，佃（租）给人家耕种，就叫小土地出租。

租了人家地，租得不多的，划为贫农，贫农还分自耕贫农，成分比租种人家地的贫农高（“高”，就是成分是没有后者好）。

租种了二、三十担的，划为下中农，如果租种了四、五十担谷的，生活比较好的，就叫上中农。上中农后来又划成富裕中农，富裕中农后来又都划成了富农，叫漏划富农。漏划富农就是说，当年划成分的时候，没划成富农，划成了富裕中农，后来给他补划成富农。

为这事还逼死好些人，我们这儿好几个都是这样。富农遭罪呀。土改后，人们都看到划成地主富农后的可怕，政治上，每个运动都逃不掉。我们这个大队（杨柳大队）的段世明（音），土改时给他划的是富裕中农，后来要划他为富农，他吓得自杀了。白兰园的刘庆辉（音），就是刘志和的父亲，要把他打成富裕中农，他一刀割了脖子很大一个口子，但没割到气管，他没死，变痴呆了。

毛泽东的政策哪有你漏掉的，没得一个逃得掉。一个地主富农都逃不掉。

我马上到80岁了，体会最深的就是那些年不能说实话，你要实事求是，就要搞你的右倾。比如，有个人把牛的舌头割了一截煮来吃了。这还得了！“新桥大队杀活牛吃！”吴芝国副支书去调查后说，不是活牛，他割的是死牛。他说的是实话，结果区委书记下令差点把他打死。

办公社食堂那年我是生产队长，“反右倾、鼓干劲”在我们大队开会，一共开了七天，我六天没有说一句话，后来工作组、大队的干部问我为什么不发表意见，不发表意见就脱不了身，要向我头上开刀。最后我只得对搞大伙食团还是搞小伙食团发表了一点看法。

毛主席大搞人民公社伙食团时饿死的人很多，我们这儿的留兰大队有个石儿坑，只是那个坑就埋了四十多个人，饿死了的人埋都没人去埋，因为活着的人都没得力气，自己都性命不保了。当时用条绳子栓住脖子，拖到那儿推在坑里就完了。我们那边龙泉坝子就饿死了三、四百人，我哪个晓得？我那个时候就在这儿当生产队长。我们家就饿死两个，我奶奶和我二伯伯。我前面讲的那个把所有财产都交出来的开明地主王当福也没活出来，他在公社伙食团时饿死了。

当时搞人民公社集体食堂，不准任何人自己煮饭。家里锅灶都毁了。我大舅母饿得不行，扯点野葱，捡了几个小洋芋，捡一个坛子，用几块砖和石头架起煮。烟子冒起来，被人看到了，大队书记王物生跑来，两脚就把坛子踢翻了。

那个年代，提心吊胆，就是贫下中农说话不小心也危险。我举个例，我们吐

祥镇的冉须龙（音）是个老长工，在吐祥军委会当代表，他同我一样，也是一字不识。大鸣大放开会，发表意见，冉须龙说：“我们这个吐祥坝不叫吐祥坝，应当叫猪屎坝。往年（解放前）区政府、乡政府还管一下卫生，解放了街上到处都是猪屎。现在的政府只是坐着拿钱，不管事。现在看来，这个管理上，还不及国民党。”

他说了实在话，街上确实到处都是猪屎。结果把他判了五年徒刑。这就是说，在毛主席手上，实在话不能说，只能说他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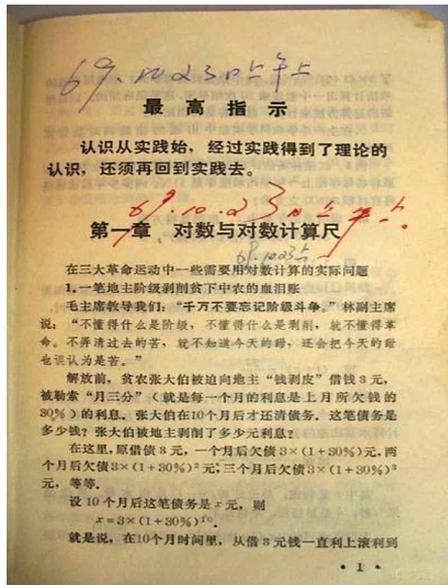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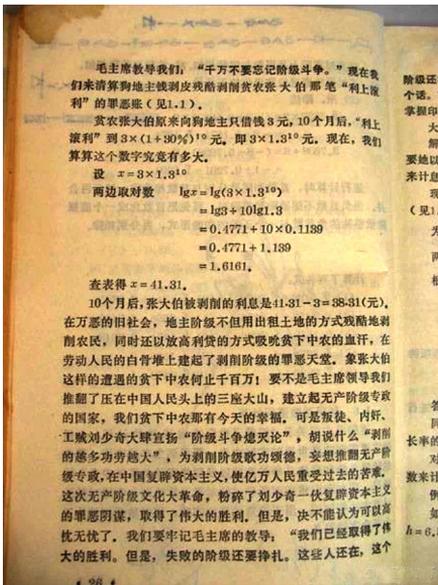
采访时间：2016年8月12日
地点：奉节县吐祥镇

采访后记

在制作土改纪录片《血红的土地》时，到三峡库区拍摄外景，行到奉节吐祥镇时，经一位朋友介绍，见到了古昭永老人。

老人曾经在“旧社会”给地主放过牛，又在“新社会”当过人民公社的生产队长。这一辈子，他体会最深的不是“地主剥削压迫”（他至今根本没这个意识），而是在“毛泽东时代”不敢说一丁点实话（否则就将大祸临头）。他说，那些年他看得多，也听得多，他自己也因为说了一句实话被撤消了队长的职务。

“幸亏我出身好，没被抓去劳改。”他说。



当年我们的数学课本

这几十年的日子

讲述人：黎民书

1932年生



在我老家的那个乡，仅我知道的就有近10个地主、乡长、保长被杀了，其中包括我哥哥黎定镐。

我是重庆巫山县大昌镇白果乡人。解放前家里总共有十来亩田土，一年下来，除了吃饭，只有一点点剩余。记得那时不能顿顿吃米，还得吃很多杂粮。

我父亲黎华章是个非常重视教育的人，对儿女管教很严，我5岁时他就勒令我鸡一叫就起床读书。我哥哥和我都先后外出读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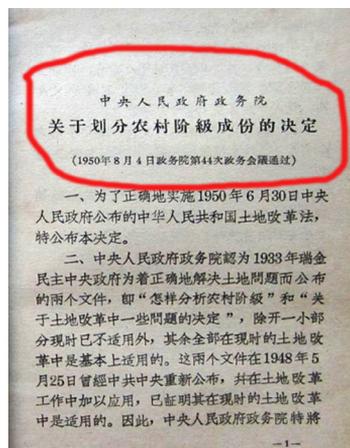
家里缺劳力，父亲请了两个帮工，其中一个是我们的亲戚。由于我家田土不多，日子也过得清贫，因此土改时最初给我们评的“阶级成份”是中农。没过多久，给我们评为富农，紧接着又评成地主，待那个帮工揭发说我父亲脾气不好时，又把我家评为恶霸地主。

庆幸的是，我爸在1949年10月去世了（妈去世得更早），否则，他肯定要被共产党枪毙。

但是，我哥哥没有逃脱。

我哥哥是我们乡里有名的“秀才”，奉节县中学当时是属于省管的四川省第四中学，他在那儿读完了初中。我家乡位于小三峡深处，十分偏僻落后，出一个读过省府学堂的初中生就是乡里的大知识分子了。哥哥毕业后先当小学教师，后当小学校长。由于乡里缺文化，乡政府里的人常常读不通上面来的公文，于是把哥哥找去当了乡长。

当时的乡政府机构很小，一个乡长，一个副乡长，两个干事，两个乡丁，一个炊事员，总共七个人。还有，那时没有多少人想当乡长，不象现在，人们也不把乡长当成一个什么官员，任期也比较随意，干几天，不愿干走人就是。我哥哥



没干多久就离开了。几年之内，先后有何瓚、郑度之、卢增辉、陈子明等人当过白果乡的乡长。

共产党来了，不分青红皂白，凡是当过乡长的，杀！我哥哥、连同前面提到的那几位，全部被杀了。那个乡政府的炊事员黎定武，后来当了白果乡第八保保长，也抓来杀了。他们那一批五个人，押到白果乡那个大树林下枪杀。最冤的可能是陈子明，他是巫山县中学的学生，毕业回乡教书，1949年快“解放”了才当几天乡长，他被抓到大昌镇杀害。

白果乡唯一幸存的是副乡长马少元，他没有什么文化，平时又不爱说话，这使他得以幸免于难。

其实，当时的乡长权力并不大，不象现在的乡长，飞扬跋扈，威霸一方。还有，当时当乡长的都有些文化，是当地的文化人。我比较两个社会，两个政府，那时的乡长不象现在的乡长，吃喝嫖赌，草菅人命。我哥哥没干过任何坏事，更没有杀人放火，杀他只有一个理由：当过国民党的乡长。所以，哥哥死前很不服气，说：如果共产党早一点来，如果也需要找个文化人来当乡长，那我就会是共产党的乡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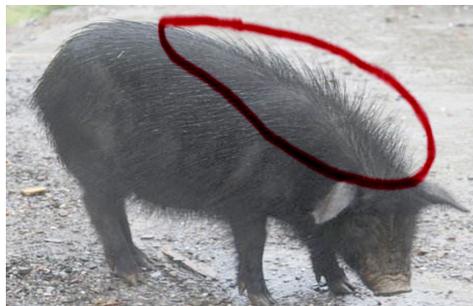
我没有目睹哥哥遇难，当时我在重庆读书。几年后我回乡，哥哥的女儿黎淑林告诉我说，哥哥死得很豪气。关押期间，何瓚他们几个已经吓得吃不下饭，只有哥哥照吃照睡，还叫女儿送点肉来吃。行刑那天，那几个人浑身打抖，卢增辉吓得瘫在地上，哥哥面不改色，坚决不跪，只盘腿坐在地上，还扭头对杀他的人说：“伙计，照顾点，今后我们还要见面。”

我是因为在外边读书逃过一难，否则，作为恶霸地主的儿子，又有文化，我肯定要遭杀头。那时，杀个人简单得很，共产党的乡政府就可以随便定一个人的生死。

我逃脱了，但留在家里的姐姐黎琼瑶就遭罪了。土改队的人强迫她交出“洋钱”——大洋。姐姐交不出，一次一次的暴打。姐姐忍受了一切，包括吊起来灌辣椒水。但是，最后她终于忍受不住了。怎么忍不住？我姐姐才20出头，还没结婚，他们把她衣服扒光，用猪鬃从她乳头的细孔里扎进去……姐姐当天就跳了堰塘。

（注：我后来在一篇谈酷刑的文章中读到关于用猪鬃戳乳头的情况：

“猪鬃戳乳头这种中国特有的酷刑则不同，猪鬃刺入受难女性的乳头后，因特殊的弹性使其能够顺着乳管弯曲，并不真正刺伤神经丛，而是靠拨动神经来给受难女性造成剧痛和难耐的神经刺激（与钢丝刷刷脚心类似），这样乳房内的神经丛在



产生剧痛时却未没有永久性损伤，受难女性的乳房不会因多次受刑而降低其敏感度，她在这种酷刑下要忍受复合性的痛苦而难以昏迷。”——《酷刑综述》作者：李寻)

但她没死，被人发现救了起来。1956年她结了婚，丈夫姓吴。没几年，大饥荒来了，姐夫饿死，姐姐活不下去，背着幼子逃往神龙架的大山，住在岩洞里。她后来饿死在那儿。

再谈谈其他人的情况。

黎华举是我们乡里的一个私塾先生，也是我的一个远房叔叔，靠教书为生。我从小受他影响，最喜欢听他讲《三国演义》和《封神榜》。他只有很少一点土地，自己耕种。我们那地方穷，黎华举也穷，根本请不起帮工。就因为那一点土地，就把他划为地主。他50多岁的人了，眼见那个杀地主的恐怖，吓破了胆，自己上吊死了。

另外被杀的两个所谓地主叫黎心安和黎华敬，他们是两兄弟。两人被抓到大昌镇枪毙。1981年我右派平反后，专程回乡，见到了这两兄弟的遗孀，60多岁的老太婆了。我叫她们陪我出去走走，她们不敢，心惊胆颤，说自己是地主家属。我看她们那个样子，心中很感叹，土改都过去几十年了……

还有一个叫黎华之的人，他是我的一个亲戚。此人讲义气，豪爽、心肠也好，爱打抱不平，人们有纠纷都找他调解。解放后本准备把他当恶霸杀了，不料他曾救助过一个穷愁潦倒的人，这个人是个地下党，解放后当了共产党巫山县的官员，他报黎华之的救命之恩，叫他躲在家里绝不要出门，更不要多说话。

黎华之于是几十年不出门！

1981年我去看他时他已80多岁了，他看见陌生人上门叫他名字，惊得说不出话，那付恐惧的面孔给我很深的印象。后来，听到我用家乡话报出我的小名，他扑通一声跪倒在我面前，涕泪滂沱地说：“我这几十年的日子呀……”

采访时间：2005年5月26日

地 点：重庆大坪九坑子

采访后记

黎民书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重庆长寿湖劳动改造近20年。笔者在采访长寿湖右派时，第一个就采访了他。后来，听他说起他家在土改时家破人亡，于是，又一次去采访了他，便有了上述这篇采访录。

世上没有这个道理

讲述人：刘志雄

原邻水县丰禾区长滩公社中学教师

1930年生



土改杀人、整人，没得道理呀！土地要收就收吧，如果地主不干，要反抗，你再镇压、再杀人。不！不仅把土地、财产全部收缴，还要杀人！不仅杀地主，还要整他们的子孙后代，一整几十年。世上没得这个道理。

——刘志雄

我是四川邻水县丰禾乡人。我们家是从我爷爷刘大宝开始发起来的。爷爷是个非常勤劳朴实的农民，他勤俭持家，日夜操劳，慢慢积累了钱财，购置了田土。小时候，我最喜欢爷爷，他对人非常和善、宽厚。我记得木匠到我家干活，他怕木匠劳累，把他们的推板、锯子藏起来，要他们休息。遇到天旱缺水，爷爷出钱出力为村民打井、引水。我还亲眼见到爷爷不时蒸几大蒸笼米饭抬出去免费供那些饥寒的人食用。至于修桥补路之类的善事，爷爷就做得更多了。那时地主同农民的关系，并不是你死我活，象共产党说的那样有不共戴天的阶级仇恨。《白毛女》中的恶霸地主黄世仁是共产党编造的。

我爷爷虽然发家当了地主，但一辈子都保持农民的本色，仍然天天下地劳动。举个例子，爷爷富起来之后，引得土匪“慕名”前来打劫。他们在村外遇到一个正在放牛的老农，问他：“刘大宝住在哪儿？”他们做梦都没想到，眼前这个衣着破旧的老农正是我爷爷。

我爸爸刘玉章没有继承我爷爷的勤劳俭朴，他抽上了大烟，成天不理事。好在家景殷实，到解放时，家还没败在他手里。土改的时候，爷爷已经去世，他们把我爸爸抓来斗，我爸没见过这种场面，吓得屁滚尿流，在一次斗争大会后，回家的路上，他一头栽下去，吓死了。

土改时我正在邻水县读高中，我听了一些共产党的宣传，思想还很“进步”。家里的田地、财产、房屋全部被收缴了，我还安慰爸爸，告诉他，共产党说要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老人要进敬老院，过幸福生活……根本没想到紧跟着就是打

人、杀人！

最初，斗争会还比较文明，地主只是站在台上交待哪些事做得不对，农民也没有过激的行为。工作组（即共产党的土改工作组）觉得太温和，他们发动群众，给他们讲：你们为什么穷？是因为你们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地主都是坏人……农民没有文化，很快就被“发动”起来，头脑开始发热。复盛（即邻水县复盛乡）有一个贫协主任，受共产党的煽动，走火入魔，脑子里灌满了“受压迫”、“阶级仇”等东西，在土改运动中神经失常了。

那时杀人很随便，农会说要杀谁就杀谁。丰禾乡杀得多，有地主，也有前国民党政权的人。我知道的有这些人：

刘玉双，地主，丰禾乡大屋嘴人，他是我的叔伯哥哥，与妻子（姓甘，大石乡人）先后被枪毙；

甘世伯，地主，丰禾乡河坝湾人，枪毙。

刘仁山，地主，丰禾乡复利人，枪毙。

王润民，地主，丰禾乡场上人，在惊恐中上吊自杀。

刘丹贵，丰禾乡乡长，枪毙。

刘丹阳，国民党空军退职人员，丰禾乡古房子人，枪毙。

刘丹阳并不是地主，只是在国民党空军干过，已回乡务农好几年，我经常见到他，对人很不错，也被杀了。

土改杀人，没得道理呀！土地要收就收吧，如果地主不干，要反抗，你再镇压、再杀人。不！不仅把土地、财产全部收缴，还要杀人！不仅杀地主，还要整他们的子孙后代，一整几十年。世上没得这个道理。

周淑珍（刘志雄之妻）：这不是黑社会的行为，这是政府行为！就是黑社会劫财，也往往得财后放人。

刘志雄：不过我相信善有善报，我们那些年虽然受了不少苦，但我的子女一个个都很有出息。我想这是我爷爷当年一辈子做善事积了德的回报。

注：刘志雄的四个子女全部考上了大学，其中老大刘锦超、老二刘旗超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现分别是四川大学教授和美国科研人员。

采访时间：2006年1月14日

地点：四川大学教师宿舍

好些事，我都不敢给娃儿讲

讲述人：周淑珍

原邻水县丰禾区长滩公社中学教师
1933年生



我是邻水县袁市区双河乡的人，父亲叫周相乡，是乡里的地主。土改时我17岁，那一年，农会的人把父亲抓走，捆绑起来关在谷仓里。这一捆就捆了大约10来天，不给他松绑……手肿了，接着手腕开始烂，一直烂到骨头。我去送饭，一口一口喂他……捆绑的双手都长蛆了……

（周淑珍泣不成声）

但他们没杀我爸（“据说是当时杀人太多，上面来了政策，因此放松了一下。”——刘志雄插话），而是把他抓进监牢，关在邻水县北门。1959年，父亲饿死在监牢里。他在监牢时，我们都不敢去看他，他死后我妹妹去收回了几根骨头……

那些年的日子……我们全家被撵出来，住在一个破庙里，没有饭吃，4岁和10岁的妹妹出去讨饭。妈妈叫她们找当初的佃户讨，我们家曾经多次接济过那些佃户，彼此关系融洽。妹妹去讨饭，他们都给，我们没饿死，全靠那些佃户。其实，彼此哪有什么深仇大恨嘛，农民租种我们的土地，按三、七或四、六分成，比现在出去打工都强……

那个破庙子，住了好多年……好些事，我都不敢给娃儿讲……

采访时间：2006年1月14日

地点：四川大学教师宿舍

采访后记

提到50多年前的往事，周淑珍老人很悲伤，一开始就哽哽咽咽，断断续续说不下去。老人现在身体很不好，我不忍心在她伤口上挖掘，因此，采访刚刚开始就匆匆结束。

另外，老人仍然心怀恐惧。作为地主子女，几十年残酷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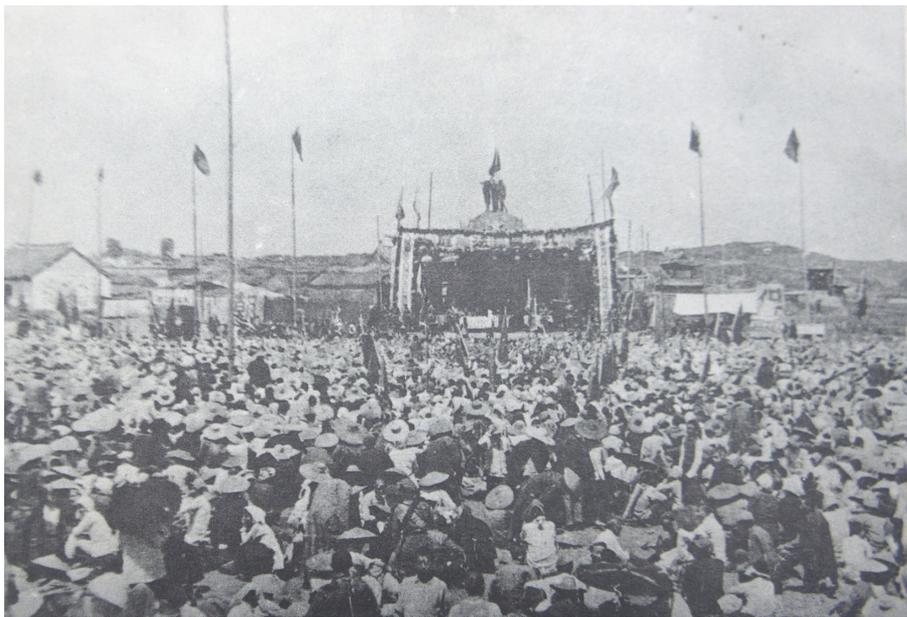
害已让她患上了惊恐症。中午我们在厨房提起土改，她丈夫刘志雄声音大了一点，她慌忙阻止——厨房临近隔壁邻居的窗户。

然而，悲伤和恐惧并不能驱除她心中埋藏几十年的愤怒。在关得严实的客厅里，她不由自主地说：“毛泽东，坏得很。”

只是，那声音小得我几乎听不清。

“共产风”不是从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才刮起来的。土改就是共产风，是充满血腥的一场共产风。共产党的土改是暴力土改，不但夺走了地主富农的土地，而且还要对被剥夺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其唯一的罪名就是他们曾经拥有过较多的土地。

——胡平



湖北省钟祥县三万人参加公审大会
选自“中南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中南人民艺术出版社 1953 年

天灵盖上一枪及其它

讲述人：魏苏民

1934年生



魏廉周之死

我是云阳县南溪镇青山乡人（1949年前叫二台乡）。我父亲魏廉周在当地是个有影响的人物。家里有几十亩田土，是父亲从我爷爷那里继承下来的。爷爷我没印象了，只知道人们叫他魏三爷，我见过他一张照片，穿着清朝的官服，我想他在清朝当过官。在我爸爸几兄弟中，我爸爸最能干，又有文化，到解放时（指1949年共产党夺得政权），家里除了田地，还开得酒厂、盐厂（熬盐）和做面的作坊。爸爸有个侄子，叫魏炳全（音），他早年加入了共产党，快解放时，他劝我爸爸要认清形势，不要死守那份财产等等。其实我爸爸很看得开，钱财身外之物，要拿去就拿去。所以共产党一来，爸爸主动把所有田土家产统统上缴。上缴时怕路上不安全，还把金银财宝捆在我的身上，走几十里路送到云安镇去。爸爸缴得彻底呀，连他嫁出去的女儿陪嫁的金首饰都追回来缴给了政府，同时还积极为新政权征粮。另外，他还动员他的大哥（也是一个地主）把所有的财产交出来。由于爸爸缴得主动、积极、彻底，共产党把他评为开明地主，还让他到县城开“先进”会，我就亲自陪他去过两次。所以，从1949年10月云阳解放到1950年秋，爸爸人还算平安。

1950年秋后，上面派了一个工作组来到南溪，我记得带队的姓冯。他们突然把爸爸抓来关起，关了一个多月，给他安了三条罪名：一、砍伐树林；二、转移财产；三、欠一条人命。这三条罪名都是不实之辞。首先，家里的田土、山林都作为果实分给了农民，农民去砍树与我家无关；第二，我们把家里做面的机器搬到云安镇做面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搬的，当时共产党主要搞土改，对工商业还是保护，并没有说要收缴机器，如果当时要，拿去就是了，不存在转移。最后一条最可笑！在批斗会上，他们动员了一个农民上来控诉我爸爸逼死他老婆。为什么可笑？因为乡里大家都清楚，那个女人是因为家里吵架闹矛盾，一时想不开，寻了

短。农民还是朴实，逼他当众说谎相当困难。当着我爸爸的面，他在批斗会上很狼狈，结结巴巴话都说不清楚。

但是，他们还是把我爸爸杀了，用枪打的头。

我当时很想不通，财产全部缴了，总该免灾吧，但还是要杀！不过后来我想通了：如果他们想通过杀人来镇住其他人，不杀我爸爸杀谁？我爸爸在当地是最有影响的地主兼工商业主呀。

收我爸爸尸的是一家姓彭的农民，收得很仔细，把打出来的脑浆都捧起来入了棺。



魏苏民的母亲，她在1949年前去世免遭了她丈夫的命运。

（陈沅森在《谈谈“土改”“杀地主”》一文中写道：“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户户（地主家）冒烟，村村见红”。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假设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个，杀一儆百嘛！当年杀地主是用枪顶着后脑勺，从背后斜着向上开枪。一声枪响，天灵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髓，撒满一地……血腥、残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栗，甚至吓得好几个夜晚从恶梦里尖叫着醒来，掩面而泣……杀多了，吓怕了，反抗者都缩头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便巩固了。《大参考》2005.03.17）

其实当时农民和地主并没有深仇大恨，并不是像所宣传的那样。比如我大伯，他对佃户非常好，哪一家夫妻吵架，他都请到家来，招待吃一顿饭，好言好语相劝。所以后来工作组发动农民斗他，总斗不起来。最后他们找些不懂事的年轻人把他压倒，跪在地上，但是年纪大一点的主动跑上去把他从地上拉起来，如此反复好几次。在斗完回家路上，我大伯自嘲地说，我都六十多岁的人了，今天还拜了堂（注：旧时结婚时要跪拜三次）。

我爸的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因修学校搬迁过一次，后来修公路被压在了公路下，再也看不见了。

魏律民夫妇之死

爸爸死后，农协会和工作组的人把我们全家赶到我家大院后面的旧房子里，农协的人则占据了大院的新房。这本无所谓，要命的是他们把我们所有的被盖都收缴了。紧接着就是冬天，我们一家十几个人怎么过？救我们命的是一个叫袁培

君的农协会会员，他看上我的一个妹妹，晚上悄悄从唯一的窗口塞了几床棉絮。如果不是这般“爱情”，我们活不过那个冬天。

后来他们认为旧屋也要收缴，又把我们赶出来，驱到山上，我们无家可归，在山上住岩洞。

实在活不下去了！我年轻，无家无室，于是独自离家出走到奉节县当了个小学教师，后来又调到一个剧团。

我说说留在乡下的我的大哥魏律民夫妇的事。

我共有兄弟姐妹11人，其中兄弟5人，除我以外，4个哥哥全部读了大学。大哥毕业于上海黄埔军校，因为婚姻回到乡下。新婚期间，蚊帐上的铁丝刺伤了他的眼睛，他因此留在乡下照看田产，没有再外出。解放时，我把他的中山剑等黄埔军校的东西统统沉到河里，怕惹祸。

解放后，他在乡下的日子很难过，实在过不去时，就走路到奉节来找我要点钱。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56年，他又来奉节，我给他30元钱，我当时月工资28元，还借了2元。我对他说，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你把大儿（魏京宇）送出来，在奉节找个事做，减轻一点家里的压力。于是，魏京宇来到了奉节。

（注：魏京宇后来成了三峡地区有名的文物专家，2003年笔者为出版三峡专刊曾在奉节采访过他。）

1958年到1959年，大哥被叫到山上去砍树炼铁，劳动强度很大，他是地主子女，更得拼命干，又吃不饱。1959年，他实在活不下去了，外逃到云安镇。逃走前，他偷了一件雨衣。在云安镇时，他去卖雨衣讨个饭吃，人家看他戴个眼镜，举止斯文不该像个落难的。追问他，大哥毕竟是个读书人，人家一追问，自个儿就慌了神。人们把他扭到派出所。在派出所，大哥一一招认了。你想，地主出身，又偷了雨衣，就这样，他被送进监牢，不久就死在里面。

再说我大嫂。1960年，她在乡下活不下去，走到奉节来找儿子魏京宇。当时我已调到了剧团，外出演出去了，没见到她。大嫂在奉节，把亲戚给她的几件衣服和一点钱全部留给了儿子，然后独自沿着梅溪河往上走。在这个时候她已经万念俱灰了。

她跳进了梅溪河……



魏苏民五十年后重返当年的老宅，在那个塞进了几床棉絮的、救了他们全家命的窗口前留了一张影。现老宅已被拆毁。

朱化成之死

朱化成是我姐夫，是一个很有文化、很有修养的人。他解放前担任了云阳县江口乡（现江口镇）的乡长。虽然是个小小的乡长，但是他竭力造福百姓，在当地口碑很好。解放后，凡当过旧政权乡长的都要杀。我姐夫也被抓起来，前后陪了两次杀场。那时一杀就是十多个，二十多个。比如，杀县长张之甫（音）那次就杀了21个人。为什么没杀他？说来你不信，当地几百农民，包括镇街上的人，都联名上书保他，为他求情。在这种情况下，姐夫逃过一劫。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姐夫被抓进了劳改队。



朱化成遗像

我姐夫练过武功，身体很好，在劳改队他拼命劳动，多次被评为积极分子。但是，他的身体因此拖垮了。大约在（19）70年，姐夫死在劳改队。

采访时间：2005年元月30日

地 点：重庆万州南通宾馆

采访后记

偶然听一个朋友说，她一个好友的祖辈，在土改时被枪杀了，我便请她帮我联系，说我想去找她聊聊。她的好友很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我从重庆赶到万州，在宾馆里先同她沟通之后再请出了她父亲魏苏民。

我们在饭馆里边吃边聊，老先生盯着我直截了当地问，为什么要来了解土改和地主的事。我支支吾吾地说，我打算写一部关于三峡地区的小说，想收集一些素材。

土改是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我知道魏先生心有顾忌，我既不便笔录，更不敢录音，只得以摆“龙门阵”（聊天）



魏家老宅

的方式了解那一段往事。遇到关键的人名地名时，便借上卫生间匆匆记在小本子上。

外面，因修建三峡大坝，江水正一步步逼来，把一段段历史永沉水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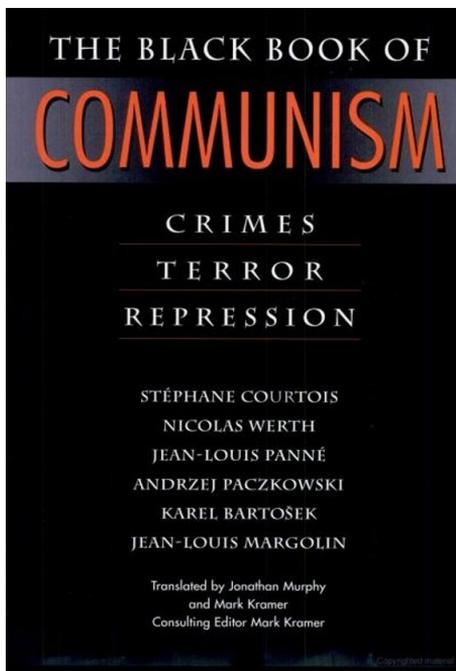


土改时，魏苏民一家人死的死，逃的逃，离开了家乡，从此数十年不敢回乡。二十一世纪初，魏苏民（右二）等人才返回家乡，他们在当年栖身的山上留影。背后山下是他们当年的旧居和田土。

十一位法国知名历史学家，历经三年的调查，在1997年11月出版了一本专著，叫做《共产主义黑皮书：罪行、恐怖、镇压》（Black Book of Communism）。著作长达846页，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登上法国畅销书榜首。

该书讲述了共产主义政权实施政治迫害的历史，为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被迫害至死的受难者总人数算了一笔帐。

书中关于中国大陆1949年以来的受难者死亡人数，其统计结果是四千五百万至七千两百万。这个数字居世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受难者死亡人数之首。



土改和反右我都遇上了

讲述人：刘雨涛

1923年生



我出身在四川省崇庆县（今崇州）一个耕读传家的知识分子家庭。

明末清初，我的祖辈从湖北麻城县孝感乡迁来四川（注：古麻城的孝感乡在如今湖北省麻城市的邻县红安县城关镇一带）。我的高祖父——爷爷的爷爷——年轻时是打长年（长工）出身。他在一个姓高的地主家干活，地主看上了他，把女儿嫁给他。我高祖这个人很勤奋，也很老实。

我们沾高家的光，就这样起家，以前家里瓷碗上面还有“高”字。到我曾祖父和祖父时，家里就有点钱了，但是，祖辈们一直都保持勤劳的本色，我爷爷就打长年，到80岁了还在操田——放水灌田。

解放前我没有呆在家里，在外面读书。1940年春，我考上了四川省成都中学高中部。那时，课外我很喜欢读文史哲方面的书籍。我认为，现代中国，很需要具有哲学思想和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我以北宋理学大师张横渠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自己的座右铭。1943年秋，我考上了国立中央大学哲学系，指导我的教授是赫赫有名的方东美先生、宗白华先生、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还有著名的国学大师蒙文通先生。蒙先生后来很不幸，文革时他是四川大学的教授，红卫兵把他胡子剪了，斗打他，我见他脸上被打得青一块红一块，身上有没有伤就不知道了，他很快就被折磨死了。

土改时我在崇庆县中学教书。我父母被抓起来关到大队部，说我们家做了很多违背农民利益的事，要赔偿——赔20担米。当时一担米是320斤，值200元，20担米就是6400斤，4000元钱，父母赔不起。我被从学校叫去，我刚说一句“农民弟兄们”，他们马上就打断我：“不准喊‘农民弟兄’！要喊‘农民老辈子’。过去你喝农民的血汗，农民供养你上了大学，农民是你的老辈子！”

我只得喊“老辈子”并答应赔钱。当时教师工资是200斤米一个月，我根本赔不起。我妻子很好呀，她把她的100多个银元，还有金戒指、金项链等等全拿



国学大师蒙文通

出来折成价，再加上亲友们寄来的钱，才把这4000元钱交清。

但是，他们还不满足，还要压榨钱。他们把父亲吊起来打，双手吊爪了（即扭曲变残）。母亲也被吊打，她的右手膀遭吊脱臼了。土改工作队挑动农民斗地主，鼓励农民动手打，工作队的那些人，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农民就是他们的帮凶。

我有个妹妹高中毕业后在崇庆县料场（音）小学教书。那天，农民武装队背着步枪，押着我母亲到料场小学找我妹妹拿钱。她的手是被吊断了的，一路走一路呻唤（呻吟）。刚到那儿，农民就喊：“打地主！打地主！”母亲怕得不得了，受了很大的刺激。妹妹没得钱给她，母亲又被押回来。回来后，她越想越害怕，越想越绝望，已经没得钱了，交不出还要吊，还要打，怎么办？

我父亲关在大队部，每天是我妻子提个篋篋（篮子）去给他送饭。解放前我们家乡老人婆喊媳妇是喊“女”。那天母亲说：“二女，今天你不要给爸爸送饭，我去送。”

天快黑的时候，母亲提着篋篋出去了。

她穿过几块胡豆田，到了小河边放牛吃水的地方，用事先准备好的一根绳子把自己的手腕绑住，另一头系在树枝上，然后身子翻过来，将头埋在水里，强迫自己呛水而死。

她用绳绑住手腕，是怕水把尸体冲走。

后来他们放了父亲，我们全家被赶出来，迁到河边上一个曾经当过长年的农民家里。

再说个事，是我亲眼目睹的。

曾国藩当年有一个弟子叫黎庶昌，曾有四大弟子，黎庶昌是其中之一。黎庶昌曾在多个国家担任公使和参赞，比如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黎这个人特别喜欢书，也特别喜欢买书。他在海外十分注意搜集已在中国绝版或失传的中国古代典籍。他一生搜集了善本书共6000多册。

黎庶昌后来曾任重庆道台，相当于今天的重庆市市委书记兼市长，最后他终老于成都。

黎庶昌去世后，他的子孙打算将他的藏书出售。他们找到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彭举（云生），历史系教授蒙文通和叶秉诚等人商谈。蒙文通他们到黎庶昌的寓所参观了全部藏书，认为很有学术价值，书又很完整，但是，以他们的财力，最多只能购买十多二十部。这样就会使这套书残缺不全，丧失了它完整的学术价

值。蒙文通提议，物色一位家庭富有的藏书家，将这套书全部买下来。

不久，崇庆县一位大绅龚泽浦到成都旅游。龚既是崇庆县拥有一千多亩田的大地主，也是酷爱藏书的文化人，他与彭举和蒙文通教授都有交往。经彭、蒙、叶三人的说合，龚泽浦以3000个大洋买下了这套书籍，并搬运到崇庆县中南街他的家里。

这套书我见到过一次，那是1947年7月。当时彭云生、蒙文通等著名学者到崇庆县讲学，他们就住在龚泽浦家里。我在聆听了蒙先生对经学的讲解之后，又到龚泽浦家向蒙先生进一步请教。在那儿，有客来拜访蒙先生，说到某一部书，龚泽浦就从书库中取来一个长方形木匣，其中藏有十多册书。这正是黎庶昌从日本带回来的一部善本书，每册书上都有明清两代名人鉴定的印记，十分珍贵。

解放后搞土改，龚泽浦被抓起来，要他交钱退押，龚泽浦交不起，说钱都花销了。交不起就打，打了后他回家用药酒擦身，第二天又打，又用药酒擦。龚没办法，只得卖书。华西大学故意卡他，只出150担米的钱。太便宜了，正常情况至少要值500担。龚泽浦舍不得，不愿意卖。这下好了，土改工作队的人干脆给他定个罪名——“恶霸地主”，并以这个罪名一枪把他打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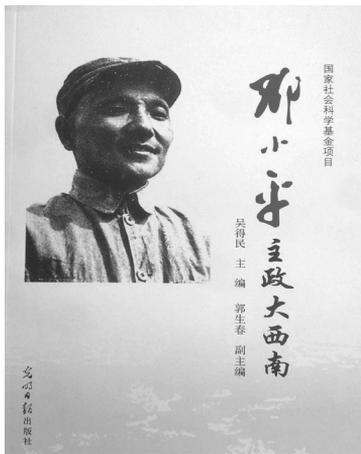
龚泽浦死时50多岁。我记得清楚，那是1951年冬天。

他死后，他的全部财产被没收，其中，那批十分珍贵的藏书被四川省图书馆用几辆大卡车拉走了。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丈夫无罪，怀璧有罪”。这句话说，你本来没罪，但如果你身上揣了一块璧玉（璧是玉中最好的），你就有罪了。

龚泽浦之死，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呀！

还有没有哪个受害？有呀，我的伯父被枪杀了，他也是地主，同我们住一个院子。啥名字？刘祖宣。唉呀，这些事你不要管算了，往事不堪回首，我都不想给家人讲这些事。共产党掌权，冤枉死了好多人。



四川省土改中冤死了几十万人，这个帐严格说来应当算在邓小平门下，因为1949年12月至1952年7月正是在整个土改时期，邓小平主政西南，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在他的过左政策下，四川土改搞得很血腥，那几十万冤魂，债主就是邓小平。1997年他去世后，美国之音说邓小平一生有八大罪恶。早年（1949年前）的四个我记不清了，1949年后的四个中第一就是土改。第二是积极搞反右斗争，当然，毛泽东是第一罪魁。第三是提出四

项基本原则，镇压要求民主自由的人，如关押魏京生。第四是1989年他以军委主席的身份下令用坦克机枪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总之，他继承了毛泽东的专制独裁。

1957年反右运动，在会上叫我们帮助共产党整风，给共产党提意见。我根本没敢提母亲自杀、伯父被枪毙的事，半点都没提，我只对党要反的“宗派主义”表示了赞同。

我1950年到1952年10月在崇庆县中学教书时，学校对教师在政治上分好几个等级，等级低的，不管他们业务水平如何，都受排挤。学校有民主同盟的教师，这些人都非常有能力，但只因为他们是民盟成员，就把他们统统调走了。1957年我提出，当年不该这样做，把这些有本领的人挤走是教育的损失，也是崇庆县的损失。

我因此被划为右派，说我要分裂共产党。我说，我一个书生，关心教育，我咋个分裂得了共产党？幸好我没提土改的事，如果提了，我就会被划成极右，以后那几十年的日子，就会更悲惨了。



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在批阅文件（网络图片）

采访时间：2007年12月

地点：四川省广汉县

采访后记

半年前，从刘雨涛先生的儿子刘绍坤那儿读到《刘雨涛文存》和他的专著《山海经与三星堆文化研究》，同时也听说了他家在土改时的不幸。

半年后到广汉，去拜望刘先生，见他比书上的像片苍老了许多，也虚弱了许多。不过，老人思绪仍然很清晰，记忆力也好，尤其是摆谈中流露出很深厚的史学功底。

他谈起自己这一生，情绪很低沉。1957年当右派后，刘雨涛先生被从讲台上赶下来，不是到食堂劳动，就是下放劳改，当年的寒窗苦读，数十年的宝贵光阴，统统都被“改造”完了。他在《刘雨涛文存》的前言中很酸楚地写道：“我是一位没有出息的人，没有多大成就，辜负了唐君毅先生、蒙文通先生、彭云生先生等老师和前辈对我的殷切期望。五、六十年来，我《刘雨涛文存》书中的刘雨涛



仅仅存留几十篇诗文和一部专著而已，实在是愧对师友了！”

其实，也许正是因为学哲史的刘先生那些年少写了很多文章，他才活了下来。

晚上，同刘绍坤一块吃饭，他提起他一家几代人的不幸，愤愤不平：“我十来岁就被赶出学校，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

一家三代，土改奶奶被逼死，反右父亲被劳改，文革本人被逐出校园，与“共和国”几乎同龄的刘绍坤，想起这几十年，情绪激动，很自然。

我在采访时，传来他儿子刘栋获得硕士学位，并赴美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看来，刘家被强行打断了的“书香”，又有希望续下去了。

补记：刘雨涛先生于2012年1月13日去世，终年89岁。



武昌中华大学师生下乡搞土改前宣誓。
“中南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中南人民艺术出版社1953年

从小学校长到死缓囚犯

讲述人：李光荣

82岁



我这一生，与“教员”结下不解之缘。解放前，我走上讲台，当了一名教员，解放后，我被诬为“反革命”，入狱、劳改，当了几十年毛泽东命名的“反面教员”。

1951年6月，走向深渊

1946年我高中毕业，本准备参加高考进入大学，但由于种种原因我没能如愿，而当了一名小学教员。

1949年11月拔山解放时，我在拔山小学教书，并担任教导主任。1950年暑假，全县教师集中在忠县精忠中学培训，培训结束后，忠县人民政府任命我为八德乡中心小学校长。我既不是中共党员，也不是团员，在政府里也没有任何关系，任命我当校长是他们看我工作比较出色。另外，我还有个头衔——“第五区文教界代表”，在八德乡开公审大会时，我还因这个头衔被请上主席台就坐。这个头衔如何而来我也不清楚，现在记得清楚是当时教员每月大米最多的是180斤，我当校长的每月210斤。那时我认为，这个人民政府是任人唯贤的，厚待教师的，我要拼命地工作，报答人民政府的知遇之恩。

但是，很快，我就大难临头！

我祖父是一个贫苦农民， he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中我父亲最聪明，小学毕业时全县会考，他名列第三。当时倡导实业救国，忠县在发展蚕桑业，父亲于是辍学去学习有关技术，学成后他便从事养蚕植桑，此外，还兼营酿酒。父亲很勤劳，一点一点地挣了一些钱，家景开始好起来。但是父亲认为，要长久脱贫，应当置田产，于是他就把养蚕酿酒挣的钱拿来买了一些田地。这就为我们全家种下了祸患。

由于有这点田土，我父亲被评为地主，土地没有了，还成了被专政的“坏人”。土改的前奏是“减租退押运动”，我为了表示“开明”，主动把我带到学校的蚊帐、床单、被盖带回家交给农会，算是“退押”。

可是，我没有逃脱劫难。一个搞土改的革命干部由于对我私人的恨怨，借土改运动将我置于了死地。

他叫冉泽民，解放前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新青社，解放后担任拔山区政府文书。冉这个人个人品质很差，还是个色鬼，我原本同他没有往来，他恨我是因为我处分了他的一个亲戚陶倩丽（音）。

陶倩丽在学校领工资，但长期不上课。刚解放时有两大中心任务，一是剿匪，二是征粮。征粮抽调了不少老师，学校开课困难。我于是去找陶倩丽，叫她出来上课。她说她上不来课。我说，拿了工资就该上课。她要横，说看我拿她怎么办。我那时年轻，才24岁多，既不懂什么是“阶级斗争”，也不懂社会关系复杂和人心险恶，没有考虑她身后的背景。我把她的情况写了一个报告交到县文教科。文教科也很干脆，出了个条子就把她辞退了。冉泽民认为这是我装怪，同他过不去。

他先是出一个条子，叫我去征粮，我是校长，走了学校怎么办。但我不敢违抗，只得动身去区上。不料走到半路，遇上区里另一个文书叶世宣（音），他说，“你去征粮的事我怎么不知道？”我这才明白这是冉个人的主意，他想先把我从学校调出来再下手整我。叶文书叫我回去继续管理学校，因为这不是区上的决定。

不久，区上传来决定，叫我以学校工作为主，协助征粮工作。这次，冉没能得手。

在减租退押运动时，冉犯了错误：贪污、腐化、通奸。县里原本要抓他，但当时的拔山区区长王善博同他关系很好，他们在经济上也扯不清。他说，他还年轻，要允许犯错误，也要允许改正错误。他把冉保了下来，只撤销文书职务，下放到农村当驻村干部搞土改。

他恰好就下放到我老家——杨柳村！

我在劫难逃了！

1951年6月X日上午九点，我村里两个民兵突然来到学校，拿出冉写的条子，上面写着：“你必须回村，协助减租退押。”我一看条子就明白了，冉又要找我的麻烦。我先安排两个民兵吃饭，然后去找八德乡公所的的干事黎万古，我同他关系很好。我对他说，我要回乡几天，你抽时间帮我看管一下学校，几天后我就回来。那时我好天真，以为还能回来。当然，后来还是又回到学校，但那是30多年之后。

我同两个民兵走到杨柳村萧家大院时，正好遇到王区长和他的警卫员出来。我说：“王区长，你要我回来？”他说：“是呀，你家里有多少封建财物？你回来动员你父母把隐藏的封建财物交出来。”

我很了解家里的情况，有多少财产我心里清楚。父亲挣那点钱，我读书和几个姐妹婚嫁已经用得差不多了。我想到王区长原本对我印象不错，对我工作也很满意，于是我大胆地对他说：“王区长，我可不可可以说几句？”他同意后我说，拔山是1949年旧历10月中旬解放的，我家在10月初三被土匪抢劫，这事众所周知……我话没说完，王区长马上厉声说：“你是不是说这次退押比土匪抢得更凶？”我赶紧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被土匪抢了财物只会减少不会增加。王区长说：“你没这个意思就好。回去动员你父母。”说完他就走了，也叫那两民兵各自回去。

当晚我回到家，向家人说起交金银财宝的事，家里根本交不出来，家里人哭了一夜。第二天我去村干部处。哪知那位干部正是冉泽民。冉看到我，不由分说，把桌子一拍：“你坚持反动立场，先给我捆起来！”那个时候，土改工作队的人说一句话比圣旨还有威力。我立马被捆起来押往我家。到我家后，冉大叫：“你们交不交金银财宝？！”我父母苦苦哀告：“的确没有呀，村里人都清楚呀。”冉泽民于是指挥民兵把我吊在我家堂屋的穿枋上。我痛得直叫，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父母在一旁看着，心里更痛，但是，确实没有金银财宝。不久我就痛昏过去了。后来，村里的另一位干部——他了解我家的情况——把冉叫到一边耳语了一番，冉才把我放下来。但是他把我和我父亲抓到萧家仓里关起来。

那一天正遇到八德乡赶场，他们去赶场时遇到八德小学的一个叫黎道暉的教师，他说我磨过刀，准备要杀民兵，磨的什么刀呢？说来好笑，裁纸刀。再得知这个说法，非常高兴，当天下午就组织开批斗大会。我被押到萧家大院的坝子里。我在途中暗想，你们又能给我加个什么罪名呢？我看你们怎么斗我？总得有个说法呀。我那时还那么天真，以为自己无我便心安理得。太天真了，欲加之罪，何患无罪！

一进大坝，就听到有人大喊：“打倒大特务李光荣！”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开批斗会事先要培养一群积极分子，在会上喊口号、揭发、批斗、打人。

一个民兵上来指着我说：“好哇，你还想杀我们！”我当即回答，没那个事！这是冉泽民、冉同志要报复我！那个民兵听了这话，联想起头一天押我回来的过程，也觉得不象那回事，于是他便问：“他为什么要报复你？”我准备把辞退他亲戚的事说出来。刚开口，冉泽民一下子从那间大屋里冲出来——最初他没露面——一声大吼：“不准他乱说乱动！给我打！”

这顿打是我一生中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那些土改积极分子们涌上来，劈头盖脸，脚尖拳头，有一个叫盛家然的人，竟然拿舂米的木碓下死劲打，根本没把人当人。我转眼就遍体鳞伤，昏了过去。

村里打我那些人，我都认识，他们对我根本没得仇恨。他们只是一群没得脑子的傻瓜，一切听上面的，折磨起人来甚至变本加厉，工作组喊声骂，他们就打，工作组喊打，他们就杀。这是当时的普遍现象。

不知过了多久，恍惚间有人拖着我去按指印。后来我就被关进了拔山区监狱（即原禹王宫，现拔山小学干部宿舍）。

我在拔山区监狱关了半年。这儿倒没象村里那么乱打，我想“宁可官刑，不可私刑”。牢房很小，关了30多个人，只能侧着身子睡，夏天奇热，冬天又冷得惨。

（李光荣妻子插话：他直接睡在石地板上，谷草都没有，所以他留下了后遗症——气管炎。）

当时差点把我折磨死的是身上的伤口。批斗会上我右胸侧被打了一个洞，在监狱里感染了，流脓不止（参见本书《这是人做的事吗？！》），我发高烧，吃不下饭了。家里人送饭来，见我几天都不吃，就去哀求看管人员，求他们同意送药给我敷治。看管员同意了，家人便找了草药送进来，也算我命贱或者说命大，我竟然活了下来。

在区监狱关押的半年时间里，从未提审，也没有叫我写过任何“杀民兵”的交待材料，只是有时被武装民兵押到区政府服劳役——给区政府伙房挑水。有一天中午，我正在伙房门后休息时，一个约10来岁的卖糍粑块的孩子，见四下无人，突然快步走到我面前，把一块糍粑塞给我，说：“您快吃吧，李老师，我们都知道您是被冤枉的。”

孩子那朴实纯真的模样让我非常感动，我眼泪当场就流出来了。孩子的举动给我精神上极大的安慰和鼓舞，我坚信终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可惜，如今我已获得平反20多年了，我四下打听，一直没能找到当年给我糍粑的那个孩子，更内疚的是，连他的名字也没记住。

1951年12月29日，又是一个拔山赶场的日子。拔山区人民政府在大操场召开公审大会。会上枪毙了莫明道，同时宣判我和唐明安等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强迫劳动改造，以观后效。

我真的是到了鬼门关前！

我的罪名是“企图持刀砍杀民兵”。

到这时我终于清醒：冉泽民从叫我回家“协助减租退押”起，一步步早就为我安排好了一切！

唐明安的罪名是“投毒”。揭发他的人又是那个揭发我“磨刀杀人”的黎道晖。黎道晖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乡长，被共产党杀了。他为了保住他在学校的工作，便积极地参加“镇反”运动，要立功。他先是说学校外的水井里有人投毒，后又说学校内的水缸里的鱼也被毒死了。他是教三年级的，于是就在三年级的学生中逐一搜身检查，果然在一个姓潘的学生身上搜出了一包白色粉末。这当然是毒药了！他马上跑到区上去作“立功”汇报，并亲自对该学生审问。那小孩似乎早知如此，招供说是他表哥叫他投毒，先投水井后投鱼缸。

他的表哥就是唐明安——凌云乡小学教师。

唐明安马上被捆绑到八德乡政府。他莫明其妙，大呼冤枉。结果，他因“抗拒交待”被一阵暴打，关进区监狱，作为“反革命分子”与我同判死缓。

那些年，毛泽东和那些积极分子们整人有一个“三子法宝”——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凡是他们想整的人，先“抓辫子”——给你找个罪名，押到会上批斗，然后给你戴个“帽子”，地、富、反、坏、右、叛徒、等等。“帽子”一戴上，你就成了罪人，紧接着就是“棍子”伺候。“棍子”有两种，一是刑杖，二是法杖。刑杖是捆绑吊打，施以刑罚，法杖是打完后由施暴者决定是否再送入监狱判处徒刑。我的冤案过程完全是“三子法宝”的演练。这种手法他们用了几十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共产党才在报上正式说，今后“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了。

从死缓到 20 年劳改

公审会后的第二天，我和唐明安等便被押到忠县看守所关押。在那儿，我大开眼界——里面关押着忠县各行各业的各种人物，有政界的，也有商界的，有不少还是忠县的头面人物。一进看守所，组长（官方指定的犯人）就给我们讲监规：不准谈案情、不准串仓（监舍）、不准……总之，不准乱说乱动。管理干部则给我们讲：“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他还说：“判死缓的，改造得好，可以改判无期或有期徒刑。”等等。

我心里明白自己是受人迫害，但是，这个冤屈不是看守所造成的，我必须服从看守所的监规，否则就只有死路一条。我当时想，我们判了死缓的犯人，就象已经选定了的肥猪，随时可以拖出去杀。

据说，是劳动使猿变成了人，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创造了文明，人没有劳动的观念，就会走上犯罪。犯了罪的人就要通过劳动来赎罪，共产党叫做“劳动改造”，简称为“劳改”。

我进看守所一周后，就开始劳改。我先是到草鞋组编草鞋，后来到机房组织

布。我学得很快，没多久就织得又快又好。另外，我在报上看到有把单布机改为双布机的报道，我也想作这样的改进。我把这事报告给周所长，他很高兴地批准了。我自己设计方案和图纸，经过多次试验，终于成功了，双织布机比单织布机提高了50%的效率。

在看守所，我因表现突出，多次受到表扬，我后来的改判，就是我的这种“劳动改造”换来的。

1954年元月的一天，改判下来了。当时看守所有60个死缓犯人，其中55个改为无期徒刑，押到位于南充的四川省第二监狱服刑，5个改为有期徒刑20年。我是5个中之一。改判的人中没有唐明安，他已经在1953年12月被释放了。看守所里人人都在猜测他为什么会被释放。公安局一位姓秦的干事对我们说，唐明安是因为表现好被政府宽大了。看守所里没人相信他是因为表现好被“宽大处理”的。多年后我才得知，他有一个堂兄叫唐明邦，是重庆某报的记者，唐明邦回家探亲时得知了他堂弟的事，他对整个事件作了一番调查，回去后直接向西南军政委员会作了反映。他的反映引起了重视，上面责成万县地区专署组成专案调查组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唐明安无故受冤，于是人民政府把他“宽大释放”了。

那次调查奇怪的是，对于平白无故诬陷唐明安的黎道晖等人，没追究任何责任。黎道晖是在1951年那场由党中央领导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揭发唐明安和我的。当时风声鹤唳，似乎到处都有杀人放火的特务和要推翻新生政权的反革命。黎道晖想立功，同冉泽民一起制造了我的“杀人”冤案后又制造了唐明安的“投毒”冤案。可是，我就没有唐明安那种福气了，我要等到30年后才被证明也是无故受冤。

本来，判20年的人要押到新疆的偏远地区去劳改，不料正好周所长来到看守所，当时他已经调到奉节县一个劳改单位——奉节青龙硫磺矿厂。他看到我，就把我要到了硫磺矿厂。

去硫磺矿厂的路非常烂，我当时身体很差，周所长叫其他犯人扶着我，一步步走到了我要劳改20年的地方。是20年，因为20年徒刑从改判之日算起，以前在忠县看守所关押的两年和在区上关押的半年不算刑期。

到青龙硫磺厂后我被安排下洞拖硫磺矿，那个劳动强度很大，条件又恶劣，我身体不好，干了一年，实在受不了了。我写了个报告，说，按政府的政策，旧社会是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是把鬼改造成人。你们要改造的是我的思想，而不是改造我的肉体。我说我实在不行了，请你们考虑给我换个工作。

也算我运气好，当时劳改大队正要改为车间，需要一个有文化的人搞宣传，那个年代运动多，经常要讨论，要发言，要记录，要办墙报，因此，我被选出搞宣传工作。我还是在看守所的那个态度，我的冤案不是监狱造成的，我要服从劳

改地的法规。但是我知道自己没有罪，因此，我是“伏法，但不认罪。”

搞宣传工作，虽然比下井轻松，但必须万分小心，稍不注意就要惹祸。

我们劳改队里有一位原万县地区医院的王医生，他在劳改队仍分配搞医护工作。一天晚上值班时，也许是由于无聊，他用笔在纸上涂涂写写。第二天早餐后，有人发现，他把“毛主席万岁”几个字写在《病犯入院登记花名册》的封底上。这还了得，毛主席成了“病犯”。他立马被押到厂部关押，后来被加刑两年。

硫磺厂一车间春节期间出墙报，刊头画背景是天安门，因没有彩色颜料，作画的犯人就用了淡墨水烘托天空云彩。墙报贴出，一管教干部认为这是借题发挥，蓄意在“天安门”上布满乌云，他马上追查思想根源和立场问题，作画的犯人因此被加刑一年。

二车间有一个劳改犯叫罗模楷，他原来是国民党青年远征军的指导员，很有文化。有一次，他写了一首诗《万花筒》：“万花筒里看不完，绿柳红桃碧牡丹。分明只有两寸远，眼界不阔看不宽。”这首诗被人举报，开会追查思想根源，“分明只有两寸远”一句被认为有问题，是影射文化大革命。罗模楷因此被加刑两年。

劳改矿里我亲眼目睹了大量的死人。

1959年，我在二车间当广播员，那一年“病人”大量涌现，接着就是大量死人。我常常奉命送“病人”到厂医院去，所以经常看到医院掩埋死人。最初，死人还有四块板棺，由几个人抬到山边挖坑掩埋，然后再在坑前插一块木板，上写XXX之墓。后来死人越来越多，只得用竹席裹尸。再后来，死的人太多，竹席都没有了，于是用绳子栓在尸体身上，由两、三个“病犯”拖到山边坟地，埋与不埋，根本没人管了。这些惨像，当时无人外传，后来也无人得知。但我是亲眼目睹，过了几十年，我每一想起青龙硫磺厂里的那种惨状，仍然觉得心惊肉跳。

（注：青龙硫磺厂位于奉节县城到那后来发现的著名天坑的路上，1998年，我路过该矿区，那被硫磺腐蚀得寸草不生的山崖看上去十分恐怖，有一种地狱的景象——谭松注）

那些年，偷吃的人也多，有一天晚上，我们二车间的炊事员在厨房先后抓到了七个偷饭的人。按当时队部的规定，白天抓的人马上押送队部，晚上抓的先由我看管，天明后再送队部。我是车间广播员，在大饭堂兼会堂后面有一个单间，所以那一晚七个人都捆在我的房间里。

由于饥饿难忍，一些犯人干脆就寻死解脱，他们通常都选择上吊。每当有人上吊，管教干部就命令我去放吊和安埋。最初我胆小怕鬼，那些吊死的人一个个都脖子歪扭，双眼外凸，舌头伸出，模样十分可怕。但干部的命令又不敢违抗，

只得硬着头皮去干。记得1960年冬天，我就亲手埋了七个上吊的人，其中一个是我的同乡谢宝璋。1970年我刑满出狱后，谢的儿子专程到我家来了解他父亲的情况，我如实告诉了他。

1961年春，管教叶干事递给我一封信，说：“看后不要背思想包袱。”我猜想一定是家里出了事。果然，信中说，我父亲和我岳父在一个月内先后饿死了。岳父是在回家途中，走到一个叫石猪槽的坡上时倒下去的。他死后，衣服被人扒掉，他赤裸裸地横尸在路边……我看了这封信，眼中没有一滴泪水，只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多年后，即父亲饿死48周年时我写了一篇《祭父文》，我在文中说，父亲没饿死于万恶的旧社会，而饿死于伟大天才、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泽东主席亲政了十一年的“大好形势”下！

不过，当时我家所在的拔山五星村饿死了一半的人，所以我又说，有众多的饿殍陪伴，父亲不是孤魂野鬼。

认真想来，那些年我如果不是在劳改队，反而活不出来，劳改队里的干部，还比较讲道理，你只要老老实实在地劳动，就相安无事，不像农村那些人，随便找个借口乱整乱打。

我在硫磺厂劳改时，一般都老老实实，绝不“乱说乱动”。

不过，我也喊过一次冤。

在旧社会，蒙冤的草民可以到衙门“击鼓鸣冤”，还可以在大街上拦轿喊冤。可是，1949年“解放”后，象我们这样的“分子”及其家属是无处鸣冤和不准喊冤的。不过，那一年毛泽东为了帮助党整风，搞了一场“大鸣大放”。监狱里和劳改队也设立了“申诉信箱”，让犯人申诉自己的冤情。

我望着那个“申诉信箱”，内心翻腾！我一连几个夜晚睡不着觉，想申诉，又怕被扣上“不认罪伏法”的罪名，反而罪加一等。最后，我想了个办法。我先找到那个比较正直的管教干部齐干事，向他谈了我的冤屈，并请教他，我能否申诉。他回答说：“这事你自己决定，我既不阻拦，也不鼓励。”

又经过几天的犹豫，我横了心，要申诉！大不了又把“死缓”给我加上来。

我向忠县法院寄了申诉信。

几个月都没有回音。

这时，社会上开始“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了。原来，毛泽东的“鸣放”并不是要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而是他要整人。监狱和劳改队里“反翻案”运动也开始了。那些申诉过的人一个个都有了回应，我记得那些天接二连三的宣布是：“查XXX原系重罪轻判，仍不认罪伏法接受改造，现予加刑X年。”

我心里七上八下，不知法院会怎样处置我。不过我心想，难道死缓也是“轻

判”吗？

一天，王干事把我叫去，一脸严肃地把一份文件交给我，说：“这是忠县法院给你的回答，你自己看。”

忠县法院的答复是：“李光荣，你来信收悉。一，据群众检举，你分散封建财物到学校。二，对你隐藏枪枝问题，你必须彻底交待清楚，你要安心接受改造，把自己改造成社会主义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我看了这个答复，真是哭笑不得。我申诉的是要求复查“企图持刀砍杀民兵”一事，法院答非所问。不过，总算没因此给我加刑，劳改队里的管教干部也没有因此抓我的“辫子”，我算是幸运的了。

悲欢 14 年，从“反面教员”到代课教师

1970年，我在关押、劳改了19年之后获得释放。家里人准备到忠县码头来接我，妻子叫我女儿来。我女儿说，我不认识爸爸，怎么接他。我被抓时，女儿才两岁，“爸爸”在她的概念中，只是给她带来无穷苦难的人。

（李光荣讲到此处，热泪盈眶）

只好我妻子来接。我同她21岁时结婚，24岁多时分离，再见时我们俩都已经44岁了。

回到农村后我开始学习干一切农活，劳累辛苦都没什么，痛苦的是一搞运动就把我们“分子”抓去整一通。那时运动多，大运动套小运动，每次运动都是先拿我们这种“分子”们开刀。还有就是干没有任何报酬的“义务劳动”。农民们都是靠工分吃饭，10个工分是一个“劳动日”，值二、三角钱。地富分子和其家属们，活干得不少，但不是被出“义务工”盘剥，就是被种种借口克扣。回到农村那些年的艰辛，也是一言难尽。

值得高兴的是1972年我和我妻子在46岁时生了个儿子。给他取名费了些心思。那时还是文革时期，我们当然不敢给他取名为“卫东”、“向红”、“卫彪”之类的革命名字，也不敢取名为“荣华富贵”之类——怕那些积极分子们又来“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最后我们给他取名叫李余——把我和我妻子（余朝英）的姓组合起来。



李光荣夫妇

1979年是我人生中的转折点。这一年我摘掉了“分子”的帽子，结束了当了近30年的“反面教员”——这是毛泽东整阶级敌人的语言。

由于国家开始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教育又受到重视，各地急需教师。9月2号那天，我正在捩谷子，突然被公社分管文教的黄主任喊上田坎。他说，经公社研究决定，由我和张官胜在五星村小学开办一个“初中毕业生补习班”，当时的名字叫“回收班”，意思是“废品回收加工”。。

我又惊又喜又忧！惊喜的是，刚摘了“帽子”，又回到讲台；忧的是，从1951年入狱，已经28年，自己是否还能胜任教师工作？

但是，机不可失，我立马答应下来，当了一名不入正规编制的“野教员”——头衔是“民办代课教师”。

从1980年起，小儿李余到五星小学读书，每天我们都一同往返。那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在一首《放学归途》中写道：“学罢寻归径，小阳春意融。游鱼乐水暖，落日恋山红……”

1984年，是我人生中的又一个喜庆年。这一年，我教的班上有两名学生考上了重点中学——拔山中学，其中一名是我儿子。

更大的喜事是，在我蒙冤33年之后，忠县法院正式宣判我无罪！

判决书全文如下：

忠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4）法刑字第 306 号

李光荣，男，57岁，汉族，高中文化，忠县拔山乡杨柳村人，判前系忠县八德乡中心小学校长。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李光荣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十年，一九五五年减刑两年，后刑满回家。本人对原判不服，提出申诉。

现经本院复审查明：原判认定李光荣反革命罪不能成立。判处不当。据此，本院决定，依法撤销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对李光荣的刑事判决，宣告无罪。

（公章）一九八四年十月八日

最后要说的就是那位冉泽民。1953年，这位革命干部也进了忠县看守所，我在看守所里与他窄路相逢。我说：“你也来了？！”他点点头，“嗯嗯”哼了两句。他为什么被抓进来？因为奸污女民兵的事东窗事发，加上其它一些罪行，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后来他的老上级王善博当了忠县公安局长，给他搞了一个保外就医放回了八德家中。他便在拔山街上三角铺摆摊卖草药。

他的活动能力很强，后来他通过种种关系，也“落实了政策”，现在享受“离休待遇”。

采访时间：2008年8月6日

地点：忠县拔山镇五星村

采访后记

李光荣老人住在乡下一幢很破旧的土房里，从外面看，它同四周的农舍没有两样，室内也显得十分贫寒。可李光荣和他妻子都是文化人，李光荣还是重庆市诗词学会的会员，因此，与四周农舍不一样的是，室内有诗词字画的儒雅气氛。

老人对当年的遭遇，记忆十分清晰，时间，地点，人名，毫不含糊。他逐一道来，象是打开一本历史书。除了讲到21岁的女儿还不认识父亲时掉下眼泪外，整个讲述他都比较平静。

可是，感觉得到，他对陷害他、造成他和他一家灾难的人仍难以释怀，对这种故意作恶而不受到任何追究的现象更是有些不平。

他只有在诗词的写作中找到晚年的慰藉和平静。

采访快结束时老人的女儿从田里劳动回来了。已60岁的她身材苗条，步履轻盈，不象劳动了一辈子的农家妇女。她告诉我们，由于父亲的问题，她这辈子吃了太多太多的苦，读书、婚姻……她边说边声声叹气。我们感觉到，她和她那满面沧桑的母亲一定也有令人回肠荡气的故事，可惜，天色已晚，我们匆匆合了影就告辞了。



李光荣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在家门前（2008年8月）

补记：李光荣老人大约于2014年去世

“比毒蛇还毒的……”

讲述人：秦思平
忠县城关镇人
1944年生



我是川东忠县城里的人，1953年时，我在忠县城一小读书，我父亲秦朝伟是该校的校长。一天，一位约20岁的年轻姑娘带了一个7岁的男孩来找我爸爸，说这个男孩是她的弟弟，叫徐学成，老家在忠县显周乡，父母都死了，希望我父亲收他入学。

他父母怎么死的呢？就是死于一年多前的土改运动，也就说是地主了。收一个农村的地主子女入学有一定困难，但我父亲收留了他，记得他说：“他还是个小孩子，让他进学校来接受共产党的教育对他有好处呀。”

就这样，徐学成进了学校，与我成了同学，而且，我们还住在一个寝室。

我们在一起朝夕相处，聊天时，他对我讲起了他父母之死，尤其是他母亲的死，他是站在一旁目睹了母亲的惨死，当时他才五岁。

他说，农会在斗争他妈妈时，把他妈的衣服裤子全部扒光，按倒在地，然后用手分开她的阴道，抓来一条乡下最毒的毒蛇，叫“烂草蛇”。他们捏住毒蛇的七寸，把蛇头对准阴道口强行入了进去。蛇为了逃命拼命往里钻。钻入阴道进入腹内的蛇由于缺氧，在他妈的肚子里乱钻乱咬。徐学成听见妈妈一声声地惨叫。徐学成扑上去，他妈妈一把紧紧抓住他的手……（秦思平讲述到此时声音哽咽）

徐学成目睹了妈妈的惨死，他说，他妈妈死后手都一直紧紧抓住他。

他还说，妈妈死了，那条还没完全钻入体内的蛇尾巴（有一寸多长）还在他妈的阴道口左右摆动……

我与徐学成一直相处到1958年我小学毕业。他前后三次对我说：“我亲眼目睹了我妈妈的惨死！那时我才五岁。”

土改斗打地主，竟然让五岁的小孩在一旁观看！让他亲眼观看妈妈的惨死！

徐学成还对我说：“我妈虽然是被烂草蛇咬死的，但毒蛇再毒，比不上共产

党毒、比不上土改工作组毒、比不上农会的地痞流氓毒！”

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印象当然非常深刻。后来，我也多次把这事讲给其他人听，可是，听的人要嘛无动于衷，要嘛说：“没啥，整的是地主嘛。”这么多年来，你是听到后第一个这么关注的人。

采访时间：2020年8月18日

地点：越洋电话采访

采访后记

六天前，2020年8月13日早上，我接到一位朋友传来的文字，说有一位叫秦思平的退休教师，讲到他小学同学徐学成的经历：土改时目睹他母亲被毒蛇塞入阴道而死。

我当时正在吃早饭，读到这个消息，我推开碗筷，再也吃不下任何东西。

这些年我已经饱尝了各种血腥，心灵本应“百炼成钢”，但是，朋友传来的这段文字仍然像烙铁猛然烙在身上！

2003年3月14日，我在云阳县彭氏庄园听到土改民兵把一根铁鏊从黄姑娘的阴道插进去，导致她大出血而死，当时我浑身一震，血涌大脑，悲愤难抑！

如今17年过去了，我身心的反应与当年一模一样！

我要找到这位徐学成，要录下他的亲眼目睹！

我先找他的同学秦思平。

经过一番努力，我终于同秦思平联系上了。可惜，他已经不知道徐学成现在哪儿了，当然也不知他是否还健在。他说，徐学成1960年小学毕业，由于是地主出身，民办中学都不准他读。他离开学校后就不知下落了。他最后一次见到徐学成是1960年。后来他也离开了忠县，到攀枝花市当了一名中学教师。

他说，这些年来，我是第一个听说此事后反应这么大的人，他为我的“关注”所感动，表示明年回老家时去寻找。他记得徐学成的姐姐曾在忠县煤建公司上班，她如果不在了，她还有后人。另外，他也可以到显周乡去寻找。他说，当年那一幕是在广庭大众中公开进行的，只要村子里有老人，就一定能了解到。

显周乡，是我土改调查时去过两次的地方，我觉得等不到明年，恨不得马上亲自就去！第三次前往！

可是，眼下我远在万里之外，踏不上回归的路，此时，只能记下秦思平老先生的讲述。

家乡勤劳苦干的地主

讲述人：胡开云
土改时云南巧家县小学教师
1929年生



一，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原名叫云南省巧家县中五甲渭洁沟。当年渭洁沟有两个家族，即胡氏家族和岳氏家族。据传，这两个家族的先人都是从湖广迁来的。湖广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古时对两湖两广的合称？两个家族的《家谱》都毁于火灾无法考查。这两个家族称自己的父亲叫“呀”，称父亲的哥哥叫“大爹”，称父亲的弟弟叫“满”。两个家族互通婚姻、互相帮助、和睦相处，民风极为纯朴。

那时巧家县还有土司制，这家彝族土司姓禄，土司老爷的名号叫禄群英，老百姓称他“禄统带”。五甲的老百姓只知道禄家土司，不知道另有国家政府。整个上、中、下五甲约有三千来户人家，都只向土司交纳租税。那时租税较轻，一个五口之家自耕三、五亩地可收二、三石粮食，交土司官租一、二斗就可以了。一石是十斗，一斗为十升，一升重量为现在的七斤。那时的土地可以买卖，买了土地的人按原来官租多少接着交就行了。

土司制度的历史起源何时，这禄姓土司从何时开始，到禄统带传了几代，老五甲人都说不清，只知道它的衔名是“拖车阿朵户候司禄”。拖车是地名，“阿朵”是什么不知道，“户候”应是皇帝封给的一种爵位。早年的五甲人有土司这把保护伞支撑着，外面的风浪一般卷不进来，如满清到民国发生的战争都未波及到此。那时的五甲人每年交纳官租后还可以培植一些经济林木，饲养一些家禽家畜，这些全归自己所有，生活还是很充裕的。可惜后来龙云的儿子龙三这个黑煞星闯进土司庄园后，这种世外桃源的祥和就被打破了。

二，我的爸爸和二叔

我出生在四世同堂的胡家，三房人在一起共有近四十人。家族的生活来源以

农耕为主，林牧为辅，兼收一部份地租，我们自耕地大约三十亩左右。地租（出租土地收的租）分两种、一种是河谷区的水稻，另一种是高山的燕麦荞子。林业主要以核桃、油桐为主，放牧主要以羊群为主。

我父亲胡喜贤生于1898年，他文化不高，只能阅读一般信函，不能提笔写字。父亲对于理财兴家付出了大量心血。他早年做腊虫生意，赶过马帮，运山货土产到昆明出售，赚钱之后就买田地。他在六家村买了一块水田，这块水田每年可收稻谷租七石。他认为田地是农家的根本，有了田地就有衣食保障，子孙后代都不会受穷。他还买了山地，有经济林木，主要以核桃、油桐树为主。

大约在我五岁时，县政府在老五甲建立区乡政权，把老五甲署名为“巧家县第七区”，我的故乡叫“仁伦乡”，父亲被选拔到县城培训了几个月，被任命为仁伦乡的乡长。乡以下辖四个保，即渭洁沟、大青山、撕栗坪、三道坪。保以下又辖甲，每甲有十几户或二十几户不等。保里有什么民事纠纷，保长都有权调解。那时的乡政权没有办公地点，谁当乡长谁的家就是乡公所。从那以后我们家鸡犬不宁，从早到晚人来人往。那个时候邮递没有普及到农村，凡是上级的公文都是派人送达，这些人一来，不仅要吃饭，还要索取小钱（又叫草鞋钱）。我母亲非常反对我爸当这个乡长。乡保长有多少薪水我不清楚。当时使用镍币，最多月薪几十元镍币，还不够那点小菜钱。



镍币

抗战暴发以后，征兵派款的事繁多。老百姓都不愿当兵，每当公文下达征兵名额，乡保长都很头疼。虽然抓兵是区团局派人持枪协助，但提名抓谁是由乡保两级决定，因此这是结怨于民的事。我母亲多次劝父亲辞职，但没人愿意接替，都不愿干这又赔钱又招怨的事，直到后来父亲遇到几场横祸他才摆脱这个差事。

我二叔胡喜忠生于1903年，他略有文化，能书写一般应用文。二叔对农业很内行，也很能吃苦，下雨天都要外出干活。他的玉米地是坡地，他全部改造成梯地。二叔雇了两个长工，这两个长工对家务农活非常主动，从来不用主人安排。一个姓刘的长工订的合同是十年，二叔为他娶了亲，到合同满时，又为他准备了生产和生活资料让他去过独立生活。但这长工不愿离去，又多呆了几年直到1949年“解放”。刘长工“翻了身”，分了地，可是，不到两年，搞合作化他又失去了土地，三年大饥荒时他没能活出来。

二叔早年跟父亲一样，把辛苦积攒下来的钱买了好几处田地，在家乡他是很多人羡慕的。但这为他后来当地主受苦受难埋下了伏笔。土改时，二叔背上剥削农民压迫农民的罪名，挨斗挨打，差一点把命都丢掉。他的家产被收缴，全家被赶出，在一个岩洞里住了好几年。他的子女成了贱民，处处受歧视，不能读书、

参军、当工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摘了地主分子的帽子，但他已风烛残年，还没来得及过点正常人的生活就去世了。二叔就是上个世纪中国农村千千万万个中小地主的缩影。

三，我的创业

1947年我结了婚，要做点男人的样子给老婆看。那时吃饭不成问题，缺的是钱。父亲掌管家产大权。开支都要经他同意。我决定自己创业，先编竹扇到城里去卖。编竹器是我的专长，我重在美观和精致，如在扇子上编汉字、在簸箕上编诗句等。那次我编了一百多把扇子到昭通去卖，可惜没挣到钱。后来，我又沿着牛栏江岸直上，因牛栏江岸盛产花椒、吴芋、木瓜子等山货和药材。我钱少只买了一些吴芋（一种中药）背到昭通去卖，结果赚了将近一倍。从此我不固定在一种产品上，见哪种行情好我就做哪种。我做过桐油生意，买桐油到昭通去卖。那时的昭通交道不便，都是崎岖的羊肠小道，往来很艰辛。昭通和我家乡有牛栏江相阻隔，牛栏江滩多水急，全靠溜索相通。

溜索是用竹篾编成茶杯粗的长绳，选择江岸较窄又有岩石的地方，将篾绳绷紧在两岸的崖石上。溜壳是把碗粗的木头剖成两半，将中间挖空，像一筒竹子剖成两半一样。人要过江时，用溜壳夹住篾绳，再以粗绳捆紧，下面系一根横木供人乘坐，人坐在横木上，左臂紧抱溜壳，右手一把一把地拉住篾绳向对岸移动。这种溜渡每次只能渡一个人，相当费时费力。若是笨重的货物就把它捆在溜壳上，溜壳上系有长绳，由对岸的人牵挽长绳，使溜壳滑动。若是对岸无人那就休想过江了。过江后20多里的路程全在江岸的陡壁上，最宽的地方不到50公分，有的甚至只有30公分，一不小心就会滑到翻腾的江里。这一段路不能肩挑、只能背负，而且没有歇脚的地方。背运桐油更费力，因为桐油是液体，要把口封严后才能背运。做这种生意特别辛苦。

我干了近两年时间，挣的钱并不多，深深体会到谚语说的“找钱如同针挑土”。那个时代的山里人要想不受饥寒的困扰，谁家不是这样的苦拼苦磨才致富的呢？

我们家乡根本找不到哪一家是靠天落馅饼而成为地主富农的。我想，若是迟“解放”五到十年，我这样打拼下去也会像父亲和二叔一样，挣钱买地，成为一个地主或者富农。

四，我去当教师

1948年秋，一天我去陡滩口赶集，看到一张招生广告：在拖车勐民小学另

设了一个乡村师范班，上面还有报名时间和考试的科目。我只读过私塾，没学过新学，很感兴趣，于是我去报名参加了考试，交卷后我被录取。师范班的学员没有一个初中生，大多数是小学生，像我这样只读过私塾的不少。年纪最大的有三十出头。后来我得知，这个乡村师范班，是巧家县中共地下党办的，目的是为了培植一批革命知识青年，以便在五甲地区开展革命工作。我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完全不清楚，我的家乡恰如死水一潭。在师范班就大不一样了。比如语文课有一篇教材叫《中秋杂感》，它的主题思想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追求的是安居乐业、合家团圆共享天伦，抗战胜利后人们都认为这个愿望可以实现了。谁知有人挑起内战。是谁？是蒋介石。这篇课文当然是挑起民众对蒋介石的怨恨。还有一支歌曲叫《朱警察查户口》，歌词反映老百姓对蒋政权钳制人民自由的反感。还有一支歌曲《农家苦》，揭示了下层人民的现实生活。我在那儿读了半个学年就又回到家。

1950年秋，巧家县被共产党接管，新政权除了召开了一次全县各界代表会外，其他政策均未出台，政治气氛显得很沉寂，就像暴风雨前的那种沉寂。人们依旧像往常那样忙着过年。正月初三，二叔的大女婿阳家谱来拜年，他长我两岁，是昭通一中的初中毕业生。一天我和他谈到今后的政治形势时他说，我们两家的家境都一样，今后必然会划为地主。与我们同龄的好多青年都奔赴了革命，只恨我们行动慢了未跟上，若不出去找点事做，呆在地主家庭里是不安全的。这个观点我们一拍即合。他又说，他的三叔阳传仁是新政权第五区的区长，他曾对他说：“巧家要大办教育，要把原来的旧老师召集起来训练，还要充实壮大教师队伍。他说，我们两个都可以选择当教师。

母亲非常赞成我跳出去。于是，元宵节后，我动身去了县城，找到新成立的文教局，交了一份《自传》。两个小时后，一位同志就领我到了教师训练班，让我参加训练。这时训练班已经快结束了。两天后，训练结束，晚上开联欢晚会，训练班里的人上台表演。我第一次听到演唱《东方红》，听了后精神十分振奋，认为毛泽东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大救星。演唱者都是年轻的男女教师，我和他们相比土头土脑，很是自卑。

第三天上午分配工作，我的心像打鼓一样跳个不停，如果不要我怎么办？念到五十多名后才念到我的名字。我被分配到巧家县第五区固红山小学。

五，我目睹土改

到了固红山后，发现那里已经有教师了。这时，五区的文教助理顾若霖，还有农民干部蒲志高等组成了一个工作组，要去黑铁乡搞土改，我便与他们一块去了黑铁乡。

在黑铁乡，我们住在“恶霸地主”罗银洲的家。一年前罗银洲和他的两个儿子加入了龙三的残部，被解放军歼灭。罗家只剩下罗银洲八十多岁的母亲、他五十多岁的妻子、两个儿媳、一个女儿，一家全是寡妇。我们把办公和住地设在罗家，把她们迁在耳厢里去住。

第二天就召开群众大会，顾若霖在大会上讲了关于创办学校的问题，然后就开始报名上课。开学后陆续来了二十多个学生，大的十五六岁，小的七八岁。学校是一个破旧的走廊，里面只有几条长凳、条桌。没有教材怎么办？训练班根本没有讲到这些，顾认为主要以识字为主，可以自编一些以新生活为主的教材。就这样我糊糊涂涂地混了一个学期。

第一个月，吃饭和工作组在一起。有几天工作组不在乡上。罗大妈一见我，黄豆大的泪珠就滚出来。她说：“胡老师，我一看见你，就想起我儿子罗杨里，他和你一样，才出山的太阳啊，他死得好惨啊！”我强装正经说：“人已死了，哭有何用。”其实我家也和她一样，我的眼泪也在肚里流。她又说：“胡老师，你多推点豆花吃，把豆子拿给我儿媳推，让我们找点野菜和着豆渣煮了吊吊命。”这话又让我一阵心痛。我知道，罗家的粮食都被农会搬走了。我说：“我一个人的豆渣有多少呢？这不单是你一家的灾难，慢慢熬罢。”

黑铁乡距区上约五、六十里，距我的家有一百多里，一天突然传来消息，距区上不远的小河街一下子杀了43人！

杀人像十级台风席卷大地，每一个乡村都在杀，几十人、成百人地杀。我看到心里震动很大。

一些未被杀的地主就像赶猪羊一样，一串串的绑着送到县城关起来，称为“入食”。（我后来才知道我父亲就是在此时被抓进县城监狱的。）这次杀人狂潮不仅让地主们心惊胆颤，就是普通农民也吓坏了。黑铁乡也大开杀戒。杀人，对某些人来说如尝新桃一样，他们都想抢先试一试。

有一个姓唐的被抓来关在罗银洲家的一间土屋里。他抓来之前被打得遍体鳞伤，和另外两个据说是土匪的关在一起。在一个深夜，那两人刨墙逃走，姓唐的动弹不得，在土屋里哀声惨叫。蒲志高开门见唐还躺在土屋里，就和顾若霖耳语一阵，然后把唐拉出土屋一百步远的地方一枪打死。杀人后他们向区上写报告，说姓唐的也要逃跑，因跑得慢被他们开枪击毙了。

那些日子里，我像落了魂一样，心惊胆颤梦寝不安。每天放学回来，看到的都是捆人审人，听到的都是惨叫呻吟。一天放学回来，见罗家满院都是人，遍地



胡开云

摆满乱七八糟的箱笼杂物，罗家五十多岁的老妈被捆了跪在地上。工作组和农会在追她的余财余物。

罗家老妈被关在我寝室隔壁的一间土屋里。土屋一人高的地方有一个五寸见方的小孔，真像一间囚室。老妈不时发出断断续续的呻吟。我一夜辗转反侧不能入睡。约十二点后听到土屋里叫了几声“胡哥哥”。我佯装未听见，因隔壁就是顾若霖和蒲志高。后来她又叫两声“胡老师”。我轻声问：“怎么啦？”她有气无力地说：“我口干得很！请你给我点水喝。”我起来将陶壶里的凉茶倒了半口缸从小孔递进去。她喝完，又问：“还有吗？”我把剩下的全部倒了递进去，并叫她坚持，安慰她不会有危险。

一天晚上，几个民兵将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女人抓来，说她隐藏了浮财。这个女人也是地主，她丈夫已经被杀，她还背着一个一岁左右的奶娃娃。蒲志高审问她，她说没有金银。蒲志高找来几条细麻绳将妇人的双手捆在一条长凳上，再用细麻绳将她两手的五个手指捆在一起，然后把长约一寸多的子弹一颗颗插入捆紧的手指间。女人疼得浑身大汗，惨叫不止。那晚上折磨好几个小时，还是没有追出金银。

后来，我在六区的绵纱弯乡也目睹了土改的残暴。绵纱弯乡在金沙江右岸，左岸和四川金阳的新场相望，这里江岸狭窄，两岸高峰入云。绵纱弯乡场不大，有三十多户人家，工作队办公处设在一个刘姓地主家里，负责的干部叫杨森珍，我被派去搞人口统计和田亩调查，归杨森珍领导。杨森珍二十多岁，一身肥肉，脸如圆盆。她的“阶级立场”很坚定，斗地主时两眼圆瞪，唾沫横飞，指挥打手捆人打人时面不改色。她常常在夜里和一些妇女长谈，教她们如何在批斗会上诉苦，如何假装哭泣，如何才能流出眼泪。

每次开斗争会，都把地主五花大绑一排排地跪在主席台下，家属子女跪着陪斗。大会一开始，口号声如雷震天，单凭这个气氛就把地主们吓得魂飞天外。接着是安排的打手们上场，他们一上来就抓头发、撕胸脯、甩耳光，并像狼嚎一样地吼：“你的家产是不是剥削来的？！”识趣的、有经验的地主都一一顺着回答。那些没经验没尝过苦头的还想申辩，只要一申辩就招来一顿暴打。

刘地主有个儿子在县城读初中，放暑假回家来，农会说他回家是来破坏土改运动，杨森珍叫人把这孩子捆起来吊在屋檐上，要他交待破坏土改的罪行。这个学生娃才十三、四岁，他知道什么？他被吊得一声声的哀嚎惨叫，我不敢听，也不敢看。

那些日子，我亲眼目睹了野兽般的残忍。

1951年放暑假后，我匆匆赶回老家。一看，家已面目全非，各个门上都贴着封条，一大家人挤在两间又暗又潮的屋里。父亲已经被抓走，母亲满面惊恐。

我勉强住了两天就到县城去了。县文教科指示暑假里教师到县城集中。

县城成立了临时法庭，开群众大会，把地主拉出来，衣服剥得一丝不挂，用一种叫作火马草的来抽打。火马草是一种草酸，那种草一沾在身上就痛。还用这么长的一把竹条子来打。斗打一番之后，就拖出去枪杀。我看到太害怕了。

我父亲被关在县城江西庙里，里里外外布了几道岗哨。一天中午我去看他，把事先写好的纸条递给岗警，岗警叫我站在原地等。约半小时他出来对我说：“你父亲现在病了，叫你不要见他。（其实是监规不准探望）他叫你买一副猪小肠和一斤草烟送来给他就是了。”

那正是大热天，几百号人关在一所庙堂里，就是铁汉也熬不住，何况五十多岁的父亲。

我买了东西送去，以为父亲病了是要猪小肠治病。但他为什么要抽叶子烟呢？父亲从不抽烟也不喝酒。后来我自己当了囚徒才体会到，在苦闷和绝望中特别渴望抽烟。

几天后，我到街上散步，走到坪正街小水沟时，见墙上贴着好多张布告。我上前一看，在一张布告上突然看到我父亲的名字，名字上用红笔打了一个叉。我一看他的罪行，顿时天旋地转！布告上说他是恶霸地主，横行乡里，欺压农民，当过营长，勾结土匪，有两条血债等等。我一直在家乡同父亲在一起，对他的情况很了解，比如，他从没当过兵，怎么就成了“营长”。那全都是不实之词！

只是，他的确是个地主。父亲一生劳碌奔波，又十分节俭，一年四季都穿土织的粗羊毛衫，冬天时他才穿布鞋，其他日子都穿草鞋。他一点一点地挣钱买地，当了一个地主。

我们最后一面是半年前我去黑铁乡时。在县城那天我没能再见他一面，一副猪小肠和一斤叶子烟就了结了父子的情份。我后悔当时为什么没再买些吃的给他。父亲地下有知，六十多年来，我的心是何等的不平静！

六，我的一点看法

地主究竟犯了什么弥天大罪？不仅要杀人越货还要祸及子孙！

毛泽东曾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他把地主说成是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的代表，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地主将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是平等的租赁关系，不存在压迫和被压迫的问题。如果哪一方的要求过高，协议就不能成立，双方是平等的也是自由的。这就如今天的出租车一样，车主出钱买车，乘客坐车不付钱行吗？房主将多余的房子出租给人住而收房租这是剥削吗？

而且，地主并不永远都是地主，农民也不永远都是农民。地主可以变成农民，农民也可以变为地主，这种转变的关键是勤劳还是懒惰。我出生于农家，那些年常听长辈们说：某家日子好过都是勤劳的结果，某家日子艰难都是懒堕所致。据我自己在农村时的观察也是如此，那些勤耕苦作的人家，挣点钱置几亩地，一步步发家。这种例子在我故乡太多了。我二叔多年披星戴月地苦干才买了地当了地主；另一方面，就算有家产，但游手好闲，甚至还吸鸦片赌钱，几年工夫就把家产消耗殆尽，比如我大爷爷的几个儿子都曾拥有肥沃的土地，但由于抽鸦片把田地卖光了，土改时则成了贫农。我在故乡看到，没有一成不变的地主，也没有一成不变的贫农。

毛泽东为了制造阶级矛盾，挑起阶级斗争，把地主妖魔化。当局利用无耻文人，编造了《白毛女》、《南霸天》、《收租院》、《半夜鸡叫》等乌有之事来挑起对地主的仇恨。他们利用毫无人性的痞子向地主施酷刑逼浮财，把地主活活打死、逼死。我家乡里被划为地主的，不是被枪杀就是活活被关死、整死。这是图财害命，比强盗残忍百倍。其实，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毛泽东说的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而是民主和封建专制体制的矛盾，是下层老百姓和专制王朝的各级官吏的矛盾。这些大小官吏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人民有冤无处伸，这才是旧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

毛泽东搞土改使用暴力，用谋财害命的方式抢夺。他为了给自己的这种作法找理由，不惜制造大量慌言，说中国农民和地主的矛盾，是封建剥削和被剥削者之间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这个定义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没人置疑，甚至被奉为金科玉律。著名教授丁弘先生在他去世前（2013年7月）写下一篇石破天惊的文章《江河常照经霜月——漫谈中国农村地主经济的命运》。他指出：把地主作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敌人是一个“伪命题”。消灭地主实行共产，造成生灵涂炭，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为地主经济正名，是历史演进中的重大课题；是一个道德沦丧和道德回归的过程。

我当年如果按照我父亲和二叔的路一步步走下去，也会挣钱买地成为地主。新政权的到来改变了我的人生之路。可是，我虽然没有成为地主分子，但几年后当了右派分子，与地主、富农并列为“阶级敌人”。

我为什么当右派，因为他们一定要我给党提意见。他们说，我父亲被共产党镇压了，怎么会对党没有意见。在他们的一再逼迫下，我说，当年给我父亲列的罪状不实，他根本没当过营长，更没有什么血债。结果我被打成右派。21年后给我改正时，认为我当年没有说错。

但是，我因此被“专政”了21年，婚也离了。

那是另一部血泪史。

采访时间：2015年5月

地点：重庆市江北区

采访后记

胡开云，赵正荣等是云南昭通地区很有骨气的右派，他们曾联名上书中央，要求罢免当时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我在2015年采访了他们。后来，我又读了胡开云老人写的自传，从他的文字中，进一步了解了他的家史和经历。以上这些文字，主要就来自老人的自传。

1949年后，中国的历史有一种独特的“精彩”：一个奇冤之后往往又引出一串奇冤。原因就是，你居然敢喊冤！

1957年，胡开云因为说父亲的冤枉被打成了右派，入劳改营长达21年。这似乎已经够冤枉的了，其实还不是。

最冤枉的是，他本来因为害怕，不敢说父亲冤枉，共产党非要他说，一边强迫，一边信誓旦旦向他保证“言者无罪”！

胡开云只得说了。

这一下大祸临头——长达21年的人间冤狱是他人生的血泪行程！

胡开云如此，本书中的冉德玉如此，这片苦难深重的大地上，千千万万像胡、冉一样的人也是如此。

我不知人类文明史中，是否还有超过这种奇冤的现象。

晚年的胡开云，一字一句写下十多万字的自传，记录了他的一生。他在自传中说：“如果我对所经历的社会不秉笔实录，对毛泽东犯下的罪行轻易放过，那么我就无颜对历史，无颜对良知，也就是对历史犯罪。”

可是，制造浩浩沉冤的当局最害怕的就是揭露历史真相。

不知他们是怎么得知胡开云写了这些文字，也不知他们是怎么了解到他把这些文字托付给了重庆的朋友，知道的是，老人为这些文字，又遭当局打压，年近九旬的他被几个公安从云南押到重庆，强迫他和他的朋友，交出手稿！

据说，他从重庆返回云南昭通时万念俱灰。

我于是看到一条完整的“冤枉链”——1951年，胡开云父亲被冤杀；1957年，胡开云因喊冤被劳改21年；2018年，胡开云又因记录这一冤屈被迫害。

这真是一部精彩的历史，也是中共统治几十年的真实历史。

为了抹杀这段真实历史，当局费尽移山心力，不惜花费巨额“维稳经费”。

可是，抹杀得掉吗？

我亲眼目睹开膛挖心

讲述人：张彧
1942年生



我是酉阳县龙潭镇人，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叫张观泉，是个教师，也是酉阳有名的书法家和画家。

我家就住在龙潭镇街上。龙潭是个有名的古镇，以前很漂亮，一条清澈的河流从镇中穿过。1958年大炼钢铁前，我们那儿生态很好，镇的两边都是森林，到处是鱼虾。

共产党是1949年12月到龙潭的，龙潭两边是山，共产党打来后，人们跑到山上去躲起来，士兵到山里把这些人抓回来，只要是家境好一点的，就说他是土匪，不是枪毙就是判刑。这些事情要是去调查都能调查得到。



龙潭古镇全貌

石敦桥摄

现在龙潭街上的龙潭全景宣传照

我的一个堂伯叫张少清，他是龙潭的一个知名人士，是个很好的人。他被抓来砍了头，说他是国民党一个什么青年组织的成员。砍头后，他们把他的头挂在龙潭中山公园的一棵松树上，挂了六七天，后来人头掉下来被野狗吃了。那几天，我天天看到他的头，那张脸很慈祥，没有一点恐惧。他被杀时好像才三十多岁。

土改时我八、九岁，在龙潭读小学，我家没有田土，因此不是土改的对象。但是，我亲眼目睹的那一幕幕惨剧终身难忘！我家有个亲戚叫张行书，是龙潭三



前排左一是张彧，摄于龙潭河东岸边，背景是万寿宫围墙及楼门

村的人，他家在街上开了个磁器店，因此比一般人要富一点，因此就要批斗他。但是他已经生病了，病得很重，走不动路，话都说不出。他们把他抬到天府宫去批斗，他在批斗会场上当场断了气，他的家属哭都不敢哭。

龙潭有几个大家族，一个张家，一个王家，他们都被整得很惨，其实那些人都很和善，包括那些保长，不像现在居委会那些共产党的干部。

记得是1951年，好几个月龙潭街上三天两头杀人。龙潭是山区，那些地主有好点土地嘛？杀人后他们去刮地主的衣服，都是些土布衣服，蓝布、黑布，上面还打得有补丁，衣服刮了后，我看到大多地主都没有内裤，那算个什么地主嘛？一条内裤都没有，他们只不过比一般老百姓生活稍微好一点。我看了大约六次杀人，每次都刮了衣服，尸体赤裸裸地躺在那里。

杀人后，有的家属不敢去收尸，到半夜时，就听见豺狼在叫，豺狼争抢尸体，叫得很凶！那些尸体都被豺狼啃吃了。对了，1951年时龙潭的森林还很好，有豺狼出没，龙潭的生态是在1958大跃进时毁坏的。

土改杀人我去看过六次，我从小胆子大，不怕；现在我也敢说敢做，不怕，因此成了他们（中共）的“维稳对象”。

我给你讲一次让我终身难忘的杀人现场。

那天他们在天府宫开了大会后，推出去枪毙七、八个人，我记不清是七个还是八个了。为首的是一个保长，叫徐国武，这个人我认得，他是龙潭二村的人。地点在龙潭河大众桥的对岸，叫龙潭东，那里就是当年共产党杀人的地方。我有张照片，是1958年7月同一群朋友在那儿照的，我们的背后就是龙潭镇大众桥头，就是土改时中共杀人的地方。人像背后就是龙潭镇，那个亭子叫



左一是张彧，背后就是当年的杀人现场

望江亭，是民国时中山公园的一景。张少清的人头，就挂在公园内的一棵松树上。现在中山公园、望江亭、大众桥等都被中共拆毁了。

这七、八个人被五花大绑押到龙潭东，两个民兵杀一个，打的脑壳。打了后，人的手脚还在抽搐时，行刑的民兵一涌而上，用匕首把绑绳割断，把衣服服了，然后开膛剖肚——用刀在尸体的胸口上割开一个十字口。我看到那个肉是白的，带有红色。

这些民兵挽起袖子，伸手进去把心脏掏出来，那个心脏还在滴血水。我闻到很大一股血腥味，我现在都记得那股血腥味。地下全是血。有的民兵把胃里的饭都掏出来了。还有的人把打出来的脑水从地下捧起来，装在一个土碗里。我只离几米远，看得很清楚，那个脑水是白色的，上面还沾得有沙石。

他们怎么吃的我没看到，我听我父辈和老师说，他们把心子拿回去爆炒后下酒吃，但是脑子是怎么吃的没听他们说，我就知道了。我只知道中国人迷信，认为吃啥就补（养）啥。

掏心、吃人心肝的事人们只是在书上读过，而我是亲眼目睹！我没说假话，这段历史在龙潭还能调查到，还有人在，这些被杀的人的家属还在，我都可以给



龙潭古镇残房（谭松摄）

你提供名单，比如徐国武保长的儿子现在还在，叫徐朝阳（音），他在龙潭供销社退休了。只是我想他们可能不愿意谈这事。

你问那些民兵？他们名字我想不起，但我深深记得他们那种丑恶的嘴脸。这些人都是社会上的地痞流氓，一个个好逸恶劳，满嘴的粗话脏话，身上还有虱子。现在的流氓地痞还穿得比较干净，那时的痞子民兵一个个脏兮兮的。他们成天酗酒，大吃大喝，看到女人就去挑逗。

他们晚上巡夜，吃喝玩乐，提着刀枪打狗吃，几个月下来，居然把龙潭镇上的狗吃光了。龙潭是个比较大的镇，在抗战时，



龙潭古镇（谭松摄）

龙潭人口达到十万。以前龙潭人家都要养狗，土改仅几个月，龙潭街上居然没有狗了！

我家有条大黑狗，他们一刀砍下去，砍了近二十公分的口子，但是大黑狗居然挣扎跑回来了。那一刀砍在他肚子上，肠子都露出来了。他天天去舔他的伤口。但我们不敢吭声，只有一声声地叫他：“大黑，大黑！”我奶奶看他那个惨状，不停地说：“丧德呀（缺德，没天良），丧德呀。”最后那条狗还是死了。

那些地痞流氓有人支持，是叫什么军管会的人，共产党来了一个指导员，成立了临时政府，他们支持民兵乱搞，很丑陋。

我记得那段时间龙潭万马齐喑，人们脸上看不到一点笑容，我的老师和一些长辈说：“共产党太可怕、太恶毒了，我们这些人要遭殃了。”

土改时我家虽然没有受到迫害，但我看到的那一幕幕惨景，刻骨铭心！我给你讲的，都是我的亲眼目睹，我是个老知识分子，一辈子没说假话。我讲的你可以去调查，必要时我可以出来作证。

讲那段血腥历史我也不是不害怕，那些年我也是苟且偷生，否则早就死了。我父亲一直对我说：“儿哪，不要讲，讲了要遭殃。”我姐姐她知道不少事，但就是不敢讲。现在如果我出了事，家里肯定会受影响，首先是经济上的。但是我想，我都76岁了，我死了谁来讲？谁来揭露那段黑暗历史？

所以，我主动找你，那怕因此坐牢我都要说。



张摄（右）摄于文革

采访时间：2018年6月8号

地

点：美国洛杉矶——中国贵阳市

采访后记

这是一次极其独特的采访——通过微信跨国采访。

张先生前些日子看到了关于我作土改调查的报道，千辛万苦设法找到了我，他说，他了解一段土改时他的亲眼目睹，希望我去采访。

搞土改调查这么多年来，极少有人主动“请缨”，极少有人敢说“哪怕坐牢



侥幸保存下来的万寿宫（谭松摄）

我都要讲”，因此，一旦遇上，我自然是满心欢喜，立马出动。可是，这次我远
在异国他乡，而眼下又没有回去的可能。为了不失去一位老人珍贵的历史见证，
我同他做了视频交流。以上的内容，便是跨越万里重洋后的记录。

龙潭曾是川东一个美丽的古镇，我早就听说过它，并在2017年5月前往拜访。
虽说由于环境的破坏和“现代化”的开发，龙潭与中国绝大多数古镇一样，已经
没有多少古朴的韵味，但那残存的万寿宫、王家大院等仍然可以让人追思它当年
的风韵。

我曾走进王家大院，当时我就想到，这座豪华宅院一定有丰富动人的故事，
在土改到来时，这儿也一定惊心动魄。可惜，这座宅院早已人去楼空，眼下，诺
大的院落空荡荡地任几个孤客注视它哑然无声的存在。

我想向张先生了解大院的历史和人物的命运，可惜他也所知甚微。不过，他
说，我如果去，他可以提供一些人的名单供我采访。

我又一次砰然心动。

我多么渴望前去采访，多么渴望踏上那生我养我的故土、那让人魂牵梦萦的
山川！我的人生、情感、事业等等与那片土地紧紧相连。

前些日子，在好莱坞的山坡上，望着苍穹下连绵的群山，我感叹地说，它有
一种苍凉的美，可是，它没有让我产生一种惆怅和沉思，一种透彻心灵的感动，
一种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的悲壮和深沉。

也许，是这片美丽的新大陆缺失了数千年旌旗猎猎、悲风浩浩的壮烈；缺少
了黄土地那悲欢离合、烽火狼烟的厚重。

尤其是，它没有我曾耳闻目睹的那一幕幕鲜血加鲜血、苦难加苦难、尸体加
尸体的人间悲剧！

2017年10月7日，我采访完秀山县（离龙潭镇不远）一位老人胡祖暖后，
独自前往湖北，寻找他当年同他恋人最后分别的地方——咸丰县看守所。

从秀山到黔江，从黔江到咸丰，一路上云雾缭绕，峰峦叠嶂。当年，1963年，

胡祖暖就是同他 19 岁的恋人杨姑娘，沿着这条山路徒步走向他们悲壮的永别。我注视着沿途的群峰山峦田野村庄，想到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一种由苦难催生的深沉和山川唤起的热爱，交织奔涌，排山倒海涌上心头。

中华民族百年的血泪沧桑啊，我不幸看到了你喧嚣下面沉默的真实，我有幸读到了你遗忘后面苦难的记忆。

2003 年，我在《长寿湖》后记中写道：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感召——苦难的感召，仿佛苦难催生了一种深沉悲壮的情怀，唤起了内心金戈铁马般的冲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个荒唐人的梦》中说：“正是由于这里出现了不幸，我才更加热爱这片土地。”茨威格在《昨天的世界》里说：“如果我们能以自己的见证为下一代留下我们那个时代分崩离析的真实情况，哪怕只是一点半星，也算我们没有完全枉度一生。”

可是，面对张先生要提供给我的采访名单（线索），我却束手无策，心中悲愤，如太平洋万顷波涛！无奈中，唯有写下这段文字，一吐心中千重块垒。



酉阳县龙潭王家大院，无人知晓的故事？

注，本篇图片由张彧提供和谭松摄影

父亲给我的教诲

一个地主长工儿子的来信

郝春民
1941年生



谭松老师，我其实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跟你见面，我拜读了你的《我其实很幸运》，我想也许是我父亲在天有灵让我来看看你的。我以为人在做，天在看，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时候一到一切都要报。——郝春民

我父亲叫郝双庭，1900年2月出生在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县常峪村。由于家境贫寒，他16岁就开始去给地主家干农活（当长工），到1948年土改时，他共计当了32年长工。

1960年，我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第一中学读高中，年初放寒假，我回到常峪村老家，当时正值农村人民公社化的大跃进的后期，出现了饥荒，父亲有很多不满、抱怨和牢骚。

一天晚上，我对父亲说，在旧社会，你给地主当牛做马，受压迫受剥削；在新社会，你翻身当家作主人，不要老发牢骚。没等我把话说完，父亲大声向我吼道：“你说我在旧社会当牛做马，我吃得饱饭！你说我在新社会当家作主人，我挨饿！”父亲说完从炕上拿起被子离家到生产队的饲养场睡觉去了，直到我离开家里回学校上学，父亲一直没有回家跟我一起睡觉。

1960年7月，我高考后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当我回到家里时，看到父亲全身浮肿，脸部和腿部浮肿得都变了形。邻居大娘对我说，二侄儿啊，赶快给你爸爸想点办法吧，不然，你爸爸活不了几天啦！

面对着快要饿死的父亲，我一个穷学生，怎么办啊，我情急之中，走30里路到县城给在重庆第四军医大学念书的大哥发了电报，说父亲病重需去你那里治疗，速电汇路费。

很快，我收到大哥电汇的钱，去村里要来了父亲一个月的口粮——24斤全国粮票，马上带父亲到北京，买了一张去重庆的火车票，送我父亲上了火车，我提前到大学报到了。

两个月后，父亲从重庆回来，我在北京火车站接他，看到父亲浮肿消失了，但人很消瘦。

寒假我回到家里得知，全村有1千多口人，1960年死了68位，大多是饿死的，有的人在路上走着走着，倒下就死了。我父亲去大哥处，逃过了被饿死的劫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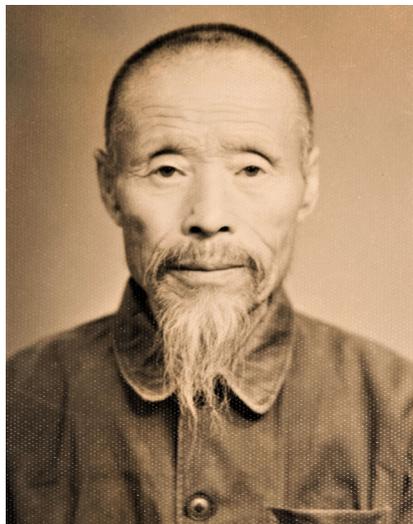
1979年3月，父亲在丰润县皇亲庄的大姐家时，不幸得了轻微脑中风话语不清，我从北京赶去大姐家，父亲经抢救治疗，不久就能正常说话了。

一天上午，我陪父亲在大姐家的院子里晒太阳，父亲对我说：过去咱们家穷，地少人多，我养活不了一家人，就去扛活（当地土话，就是去农村有钱人家去干活，共产党的话是给地主当长工），一年365天，白天给东家干活，在东家吃三顿饭，晚上回家睡觉。在东家吃饭时，东家、他四个儿子和我一个伙计或两个伙计先吃，我们吃完后老太太和儿媳妇孩子们再吃，一年365天，东家吃啥我吃啥。春天把东家的地种完了，因为咱们家没有牲口没有农具，我跟东家说一声，用东家的牲口和农具把咱们家的地也种上，秋天再用东家的牲口农具把咱们家地里的粮食收了。年终，东家给我工钱，我用这些钱买些粮食和日常生活吃用的东西，这样，我就养活了咱们一家人。

1948年土改，东家被划成地主被批斗，土改工作队总让我上台去批斗东家，让我说东家怎么不好怎么剥削压迫。我不愿去，就对他们说我没文化，笨嘴拙舌在乡亲们面前不会说话。每次批斗东家我都以此理由一言不发。

一天，土改工作队长把我叫去训话，说我被地主剥削压迫还不觉悟，跟地主划不清界限，下次批斗地主时要把我也拉上台去跟地主一起被批斗。他说，今天给我一个机会提高阶级觉悟，让我去用我穿的旧棉裤把东家的好棉裤换过来穿给他看。

从工作队长那里出来，我就去东家那里，把土改工作队长的要求跟他一说，东家说那赶快换吧，不然你要吃苦了。我跟东家换了棉裤，我穿着东家的棉裤给土改工作队长看。他看了后说，你的阶级觉悟提高了，不斗你了。于是，我马上又回去跟东家把我的旧棉裤换回来。



我的父亲郝双庭

父亲讲完这番话后对我说：做人要有良心。
两年后，1981年，父亲去世了，享年81岁。

郝春民
2018年11月

采访后记

我流亡美国后，《阳谋》一书的作者，当代史专家丁抒先生向我推荐了他清华大学的同学郝春民先生。于是，我同来美探亲的郝先生在洛杉矶见了面。郝先生说，他现在完全明白了他父亲告诉他的真相，他为当年他说那些话惹得父亲生气感到很内疚。他说，父亲离世快四十年了，但他觉得父亲的在天之灵一直在注视着他，他感到不安和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他应当把父亲告诉他的真相公之于众。这也是良心——做人的良心。

他回国后，传来了他父亲的照片和相关的文字。

可惜，郝先生已经无法看到它们“公之于众”了。郝先生于2020年5月去世。我们在洛杉矶的那次面谈，成了我们唯一的一次相聚。

但是，我相信，郝先生和他父亲的在天之灵，一定会看到他们的照片和文字“公之于众”。

（记于2023年4月23日）

“不回去了 我就死在泰国！”

讲述人：李存厚

85岁



我出生在云南省一个军政官员家庭。我父亲李郁高（1891-1961）年轻时考入保山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他后来投笔从戎，参加过北伐、台儿庄战役，任陆军少将。我的舅父余建勋是原云南第12军军长，起义后任解放军第14军副军长。我的义兄段希文任反共救国军第五军军长。我少年、青年时代在中国度过，读共产党的书。我亲身经历了比法西斯更专制、更独裁、更残暴的从土改到文革的一系列运动。

说土改吧，我们家是土改的受害者，我叔叔和外公在土改被杀了。我亲眼目睹了土改的酷刑，吊打，用开水烫，各种酷刑，古往今来罕见。我们同段希文将军是隔壁邻居，段希文将军的弟媳同我妈妈在土改时被斗，我妈妈跪在碎碗渣上，“你家的金银财宝埋在哪儿？”我妈妈的手和脚被打断了，我在下面哭，被人踢一脚：“小杂种，你哭什么哭？！”

段希文的弟媳被脱掉衣服，用砖吊在她的两个乳头上，她的一个乳头被扯掉了。



用砖吊在她的两个乳头上



她的一个乳头被扯掉了

我们这儿有个老人，两年前去世了，斗他时，用布蘸上洋油——不是汽油，是点汽灯那种油（煤油），缠裹在他手指上，点火烧，把他手指烧烂了。每一个村子，用的酷刑不一样。在那些偏僻的地方，一个地主的财产，还没有城市里一个拉黄包车（人力车）的人多，也把人家拉来整死。所以，有一次我骂：“蒋介石骂你们共匪，

一点没骂错！”

我有个表哥，当年在我老家保山施甸县当土改工作队的队长，土改时他亲自签字批准杀他爸。他爸被枪毙后，他家里的人很不原谅他。他被打成了右派后在昆明对我说：“表弟呀，你不知道我当时的心情呀，如果我不批杀我爸，别人也要批，而且他还要受好多活罪。”他说，为了让他爸少受酷刑，他就批准把他爸提前杀了。他说：“我弟弟他们了解我的心情吗？不了解。”还有的地主，叫他的子女去告发他，说他把金子埋在哪儿，银元埋在哪儿，就是以牺牲他自己来保存他的子女，使他们能好好读书。

土改还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骗人。你没有接触过那些老农民，他们说：“从前我们给地主干活，吃白米饭，初一、十五还有肉吃。”我曾对那些中共的官员说，你们当年要农民起来斗打地主，农民老实，不敢，土改发动不起来，于是你们就找当地的流氓、坏蛋来斗争地主，分他们的财产，看到地主的太太、小姐漂亮，就去强奸。其他农民看到，咦，分财产、土地了，才跟着起来。没有那些地痞流氓，土改发动不起来。

我还对中共驻清迈领事馆的人说，你们相不相信报应？受报应最大的是农民。当年在内战时，骗了多少年轻人去给你们卖命打天下？戴一朵大红花，敲锣打鼓送上战场。土改分地主财产，实际上，好的东西，金子银子是你们拿走了，把一些衣服、家俱分给农民，骗他们。土地分给了农民，没几年又把土地收回来。后来三年大饥荒，受报应最大的是农民。



当年的李存厚

1969年，我乘文革动乱时从中国大陆逃出来到了缅甸，后来到泰国的美斯乐定居下来，当了一名教师。

采访时间：2022年9月9日

地点：泰国清迈

采访后记

2022年，为收集国军孤军当年在泰国北部的征战和生存历史，我两次前往泰北山区采访。行到泰国的清迈市时，在友人的引领下我采访了李存厚老先生。

老人是泰北国军孤军第五军军长段希文将军的义弟，他从中国大陆逃出来后，便到了当时五军的军部所在地泰北美斯乐村。李先生关于孤军那段历史的讲述我已经做在了十集纪录片《泰北，最后的老兵》中。

李先生从大陆逃出后再没有回去过。我问他想不想回去，他的回答与那些流落他乡的老兵完全不同。

“不想回去！”他斩钉截铁地说。

他在大陆的那些年，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了太多的血腥和残暴，在讲述多年前的往事时，他仍然神情激愤。

“不回去了，我就死在泰国！”他说。



泰北国军孤军第五军军长 段希文将军塑像

枪毙啦枪毙啦！

讲述人：关德仁
忠县中学退休教师

我亲眼看见了李镇宇被枪毙。

李镇宇解放前是县中（今忠县中学）的训育主任，是我们村的人。他是在中坝子——甘井河中的一个岛上被枪毙的，那时我在甘井读小学，有9岁了，坐在会场前面。那天到处都架起机枪。听说打他的那个人，执行枪决的军人，是他的学生，他看了人情，没有把脑袋打开花。另一个被枪毙的人叫杨天香，他为人要讨嫌些，行刑的人就把子弹磨了再打，一打就开花了。听说把子弹磨了再打就能打开花。被枪毙的不止一个，多哟。我那时胆子大，走拢去看，杨天香的脑髓被人挑了出来，我回来一天都恶心，吃不下饭。

枪毙李镇宇前有600多人联名来保他，说他不该杀。区土改工作团说，解放后他还有这么大的势力，解放前不知有多大的势力呀，枪毙啦枪毙啦！材料报到忠县城，县里一看，枪毙不得，这个人还是共产党的朋友呢，枪毙了怎么行，马上派人送信来叫刀下留人。结果来人还在会通桥时（甘井场边的小桥，离刑场很近），这边的枪就响了。

李镇宇几十年后平反了，那有啥子意思嘛。我在忠州中学的一份材料上曾经看见过对李镇宇的介绍，说他是做贡献的人。

李镇宇有个隔房的嫂嫂叫冯国翠，丈夫死得早，守寡多年，人称“兴兴大少娘”。铁山那些民兵们把她整得惨啊！往她裤裆里放黄鳝，放蛇，让黄鳝和蛇往下身钻，又捆起来吊，还在背上压石头再吊。又把柴烧起烤她的下身，皮肉都烤得发臭，后来起码烂了一两年，好多人都看到的，皮肉都烂掉了，一些人还说她下面是个光板子，毛都没有一根。

冯国翠被折磨死了，她有个儿子叫李刚，还小，去赶鲍家湾（巴营场）和黄家场卖洋火（火柴）谋生，他发奋读书考进了忠县师范学校，没有钱，经常饿着肚子读书，毕业后分到云阳县教书。2000年，他的一个同学调到甘井中学工作，受委托来给他母亲修坟，哪里还找得到尸骨？最后勉强修了个坟，根本就不是他母亲埋葬的地方。

采访时间：2006年6月1日

地点：重庆市渝中区袁家岗

采访后记

中共的洗脑，特别注重从娃娃抓起。当年的血腥屠杀，也要让娃娃们前去接受“教育”。镇反和土改时，每遇杀人，学校便停课，组织学生前去观看。我采访的当年的小学生张美轩、初中生谢成陶等都谈到这一点。

中共有意要把恐惧植入人们的心中，连小学生都不放过。

他又成功了。几十年后，关德仁谈起他看到被打出的人脑时，近乎声嘶力竭；张美轩则说，他几十年来，一回想起那个杀人的地坝，就不寒而栗。

人们对中共强权的恐惧，随着一次又一次，一波又一波杀人的枪声，已经深深融入了国民的血液中。

注：因故隐去关德仁的采访照片。



天津，1951年3月31日杀人现场，人们鼓掌欢呼。小孩站在前排。（网络图片）

我参加革命，家人被“革命”

讲述人：邬锡昌

云阳县黄石乡人，1923年生



我出生在云阳县黄石乡，后来合并到双江乡，我们村叫凤凰村，后来改为东风村。我们村的地势很好，山梁环抱，像一条龙围着我们村庄。

我们邬姓在云阳是一个大家族，明末清初张献忠杀四川，下川东杀得只剩下冉家、柏家等几姓。我们邬姓是由湖南填四川来的。1723年，我们邬家的始祖邬玉石由长沙来到云阳，云阳出盐，又有煤，祖辈们靠熬盐和挖煤一步步发起家来，曾经买了七千多担谷。后来，五大房人分财产，一代一代分下来，到我父亲这一代已经是第十代了，他只分到了20多担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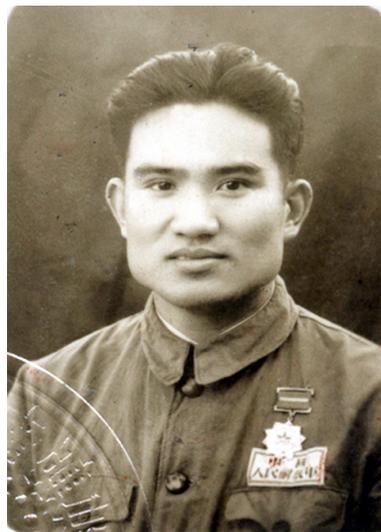
所以，我家的土地是祖传下来的。家族里的人有经营得好的，也有败家的，好的可以再买土地，差的就卖地。当时买卖土地先是由双方签字划押，有中间人作保，要有证人，证人也也要盖章，没得章的要写“亲笔签押”的字，还要由当地的保长盖章。然后到云阳县的田粮管理处盖章，盖章还要交税，大概要交相当于现在的两千来块钱。这样买卖才能生效。

我先说说我的经历吧。

我8岁时（1931年）到当地云峰小学上学。小学是我们邬氏宗祠创办的，教师都是高薪聘请，一日三餐都有荤菜，而且免费。寒暑假教师去来的行李费（挑夫力费）都报销。当时聘任的校长是吴锐菁，她是个民主人士，解放后任四川省政协委员。我在云峰小学读了7年，早晚升降旗时，四个小铜鼓、一个大铜鼓、一把大号、两把小号，全体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气氛热烈。云峰小学还聘任了多名中共地下党党员教师任教，如刘志大（解放后第一任巫溪县县长，后任湖北省恩施党校校长）、温载南、陈夕袭（解放后云阳县第一任人民银行行长）等，他们在学校传播革命思想。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在地下党老师的影响下，我不知不觉就产生了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抗日救国思想。而且，我认为共产党是抗日救国的。

1939年秋我考入万县致远中学。史地老师方惠田一直教育我们说，学好史

地就知道爱国的道理，历史地理就是爱国主义的好教材，这使我对历史特别喜爱，以致后来我选择了史地专业。1943年秋，我转到重庆唐家沱载英中学读书，校长就是大名鼎鼎的数学家何鲁。他曾坐轿子去拜望四川省主席刘湘，轿子前后打着灯笼，别人问为什么，他说天太黑暗看不见路。下轿后他又说，川西坝子天高了三尺，刘湘秘书问他此话怎讲，他说贪官污吏把地皮刮去了三尺，所以天高了三尺。我就是慕名去读他的载英中学的。1945年，我考入在万县的上海法学院专科，后又在辅成法学院学完本科。1949年12月8号万县解放，我参加了辅成法学院迎接解放军入城。1950年，我参了军，先在西南军政大学学习，后在第二高级步兵学校任教员。



郭锡昌在部队留影

家乡土改时，我在部队里，没有亲眼见到那些场面，不过，我家人的遭遇和我们郭氏家族一些人的遭遇我是了解清楚了。

先说我的家人：

我父亲叫郭筱藩，排行老八。土改时把他抓到黄石乡易家寨子批斗，那是一个保的公用地。一个叫刘XX的农民（易家寨子人）控诉我父亲当年打过他一耳光，于是就把他抓到黄石乡关押起来。当时整个乡的地主都关在那儿。

我父亲虽是地主，但只是一个很小的地主。他关在黄石时，那个刘姓农民又跑到黄石，告发我父亲霸气，说这个人应当枪毙。就这样，我父亲被镇压了。

与我父亲同时遇难的还有我哥哥郭锡荣（同父异母，他在黄石乡当了一个什么干部），那一天他同我父亲共赴黄泉。

我母亲叫郭柏氏，有一次，地主们被集中在黄石乡易家寨子开斗争会，那是六月的天气，他们先把地主们一阵暴晒，然后开斗争会。会上，一个姓王的土改民兵冲上来，一棒把我母亲打倒在地。这一棒打得狠，我母亲没能再站起来，她被当场打死了。

所以，土改我家死了三口人。

再说我了解到的我们郭氏家族一些在镇反和土改中被镇压的人：

- 1，郭百僚（毕业于四川大学，文笔很好，在云阳公报任主笔）；
- 2，郭月丹（黄石乡小学教师，因当过黄石乡乡长被枪毙）；
- 3，郭秉文（他文笔也很好，因当过黄石乡乡长被枪毙）；
- 4，郭仲明（因在黄石乡当过保长被枪毙）；

5, 邬锡雅（他思想很进步，想去陕北延安，但走到西安就被阻拦，被强迫入了国民党军校 14 期，国民党快垮台时他回到云阳）；

6, 邬子赤（黄石乡龚家湾人，收千担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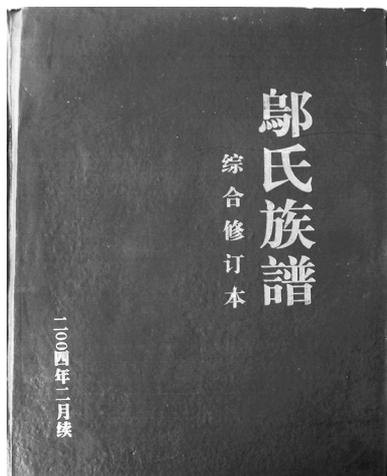
7, 邬孟生（土豪，当过国民党团总）；

8, 邬辑光；

9, 邬河光；

10, 邬锡纯。

以上这些都是我们邬家的，我们是第二房。



邬氏族谱

最后再说说我和我家人的情况：

我 1954 年 8 月从部队转业，当了一名中学教师，1957 年被打成右派，下放重庆长寿湖劳改。1963 年 7 月我又被放回我的出生地——云阳农村。我在那儿劳动了整整 15 年，直到 1979 年“改正”才回到学校。

我妈被打死时，我的妹妹邬锡兰才十来岁，她独自一人，吓得跑到外面去躲藏了一段时间。当时我在部队里有收入，是我寄钱给她读书。她读书很行，后来当了山西大学环保系副主任，现在她 70 多岁，退休了。

我弟弟邬锡根在高中时就参了军，抗美援朝，在部队当卫生员，他们那一排人守山头，一仗打下来只剩三人，其中就有他，他因此立了三等功。80 年代我右派改正后才同他联系上。他现在还在，在云阳，84 岁了。

采访时间：2014 年 2 月 6 日

地 点：重庆枣子岚垭

采访后记

12 年前，我在采访重庆长寿湖右派时曾经采访过邬锡昌老人，那时，记录下了他当右派的经历和他十分不幸但却万分感人的婚姻。没想到 12 年后，我又走进他的家，听到另一段远逝的历史。邬锡昌老人虽然已经 90 高龄，但却对当年的那些人名地名记得非常清楚，采访时，他脱口而出，仿佛说的就是昨天的人和事。分手时，他借给我一本厚厚的邬氏族谱，这本长达 464 页的族谱让我感到：

- 1, 云阳邬家的确是一个“气势磅礴”的大家族；
- 2, 这个家族近 300 年的发展演变一定“丝丝入画”；
- 3, 1949 年的到来一定让这个庞大的家族“乱石崩云”。

一对夫妻 生离死别的故事

讲述人：胡祖暖
1940年生



三年前，2014年，我遇到了我的一个的表嫂，她已经90余岁，带着她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孙子从上海来搬迁她丈夫的尸骨，她丈夫是我的表兄鲁世洋。她对我讲了她的经历，我把她的经历写下来了。

上海抗战时，学校停课，组织战地服务团，到医院去救护伤兵，当时医院人手少，送来的伤员很多。那个医院是一个临时搭的棚子，我在那儿干洗伤口、换药，包扎的工作，每天很累，因为伤员太多，一批接一批的送来。

由于伤员多，麻药紧缺，无法动手术。有的伤兵非常勇敢，要求医生没有麻药也开刀。他们说，没关系，敌人的枪炮我们都不怕，还怕你一把小小的手术刀。我在现场看到，子弹已经伤到你表哥腿上的骨头了，要划开很大一个口子才能取出。医生有些犹豫。你表哥一再要求，医生终于动手。唉呀，那个血直流，他痛得满头大汗，但他一声不吭。子弹取出来放到托盘里，当时我就端着那个托盘。

他的那种英勇深深打动了我，给他包扎后我用毛巾给他擦汗，心里有了一种感情。接下来，每天再忙我都要拐到他的病床前去看看他，同他说几句话。每天要是看不到他两次，心里就很失落。其他同学看出来，开玩笑地说：“你是不是爱上了？”这时我明白，我真的是爱上他了。

他在医院住了两个月，这期间他几次要求出院，他说他是个军人，现在国家这么危难，他要早日再上前线。记得他终于出院时，非常高兴。我约他走前到我家聚聚。他来了，对我父母彬彬有礼，向我父母表示感谢，感谢我对他的护理。父母看到这样爱国、勇敢的青年，十分赞赏，做了几个好菜招待他。同时，父母也看出我爱上他了。我父母都是教师，知书达理，他们对世洋说，你放心上前线，等战争结束了，同我女儿成亲。我没想到父亲会徒然这样说，我还是个少女，一下子满面通红，我捂着脸赶紧跑进了我的房间。其实我心里很高兴，很激动。

父母叫我送他。我们一起走，到江边河堤边时，天下雨了，我打开伞，我们两人站在伞下，贴得很近。

他拥抱我了！我的胸脯贴着他的胸脯。这是我第一次被一个男人拥抱，那种男人的气息让我心一阵狂跳。我很害羞，江边人很多，伤兵、难民，幸亏没有认识的人。

船开了，我们一直挥手。

战争结束后，我们如约结婚，但是当时上海饱受战争的创伤，父母就同意我们到他家乡去。这时世洋已经是连长了，部队上留他，准备提升他为营长。他谢绝了，他说，打了八年，国家要休养生息，我们士兵也要回乡了。所以他就带着我回到他的家乡，就是秀山中寨。

到土改前，我已经有两个小孩，过的是相夫教子的生活。共产党来的时候，有人组织了“九路军”，叫世洋加入去打解放军，世洋不愿去，我也不准他去。他抗战之后就回乡务农，从没同共产党对抗过，也没做过任何恶事，过的是小老百姓生活，我们就认为自己会是平安无事的。没想到有一天，四五个民兵突然闯进家来，把世洋捆起就走。我赶快喊：“他犯了什么罪？”一个民兵说：“什么罪？反革命！国民党军官！”我说他是抗战打日本呀。一个民兵转身一脚把我踢倒在地上。两个娃娃也大哭，邻居围着看，没有一个敢出声。

几天之后，几个民兵来把我和两个儿子关在一间小房子里，恶狠狠地说：“老老实实呆在这儿，不准乱动，否则一枪打死你！”

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把我们关起来。接下来听到外面喧闹，呼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打倒某某某！喊了一串名字，其中我听到有“打倒鲁世洋！”声音大得很。我从门缝里看，每个被捆绑的人后面都有三个民兵推着在走，往山坡上的公路走。



鲁世洋妻子当年奔跑上来的地方

不一会，从山坡上传来“啪啪啪”的枪声，我浑身一震：完了！世洋完了！我从窗子破窗跳出去拼命往山坡上跑。那是一大坡，我跑上去时，地上躺了十多个人，我看到了世洋，他的头打烂了。我扑到他身上哭：世洋啊，我们不该回来呀，你说家乡好，山青水秀。”哭了一阵，我把他的头皮一点一点的捡起来。

（此情景被一个15岁的孩子看到，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下面是鲁泽庆的讲述）

她一点点捡起 丈夫的头骨

讲述人：鲁泽庆
1936年生



1936年，土改时我15岁。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件事是最惨的，那就是在中平乡目睹杀人后的一幕。

我有个舅叫杨炳兰（音），是中平乡人，那天，我叔叔带信来，说我舅当天要被枪毙，叫我家去个人最后看他一眼，我妈不愿去，叫我去，我就去了。

那天在中平街山坡上的一个平坝里杀了13个人，我记得有个姓罗的，一个姓刘的，还有茶园周家的。我们鲁家杀了鲁世洋和鲁世骏，鲁世骏还很年轻。我讲的“最惨”就是鲁世洋被枪杀后他妻子的哭声。他妻子是上海人，我叫她大娘。杀鲁世洋之前，大娘就被关起来了。枪响之后，她从街上跑上来，那是好陡好大的一坡！她跑到刑场，到处看，找到了，鲁世洋的脑壳被打得粉碎。她一下扑在他身上：“世洋呀世洋呀……”唉呀，那个哭声好悲惨！“他们把我关起，不准我来看你呀……”她痛哭了一阵，然后去一点一点地把他的头骨捡起来合起。合起后，又把他的脑水一捧一捧地捧起来放好，最后用布把他的头裹起。你看，那是真正的夫妻呀，其他人谁敢去做这事？我在现场就吓得浑身发抖。她的举动我们鲁家再也找不到第二个。

胡祖暖：

下午，世洋的父母来了，这时其他人的尸体都被家属抬走了，他们叫我回去，我不走，我说我要最后陪世洋一夜，就是要埋也要等到明天。我让他们回去照看我的两个小孩。那一夜我趴在他身上，一点不觉得害怕，就像是平常他睡在我身边我靠在他身上的那种感觉。

我一会哭，一会又迷迷糊糊，一直到天亮。世洋的父母带着几个亲戚来了，还带来了一个木板钉的匣匣，我们就在刑场边上的山坡旁挖了个坑，然后把山壁

上的泥土挖下来掩盖，算是做了个坟。

一个星期后，有一天，一个民兵闯进来，说：“你不准再哭了！”他说着一把抱住我。娃娃以为他要打我，大哭起来。公婆赶快出来，这个民兵才放了手。

没多久，公婆相继去世，这一下，他们三天两头来骚扰，民兵也来，农会的人也来。我态度很坚决，我说，世洋虽然死了，但我们是一辈子的夫妻，我要守他一辈子！我当时非常刚烈，还把裤腰带打成死结。他们没能得手。但是，我知道他们不会死心，不被他们强暴，就要被他们毒打，这是早迟的事。我于是决定返回上海。我还有点私房钱，藏在一块楼板下没被他们发现。一个晚上，我带着两个小孩，没往秀山走，是往湖南方向走的。走了一个多星期，我回到了上海。上海是大城市，不像农村那样野蛮。

父母给我找了个工作。有人想给我找个男人，我不干，我从此一辈子独身。我父母很理解我，什么都没说。我小孩在上海长大，后来在工厂工作，现在也退休了。

我90多岁了，身体虽然还好，但知道来日不多了。我对孩子说，我最后的要求就是要回秀山，去把你们爸爸的遗骨带回来，今后清明好纪念。两个儿子不同意，说我年龄太大了，路又远，路上不安全。我坚持要回来，说这是我最后的愿望，我提出由孙子开车，路上若身体不适好上医院。我说，这是母亲对于你们最后的要求，如果你们不同意，我死不瞑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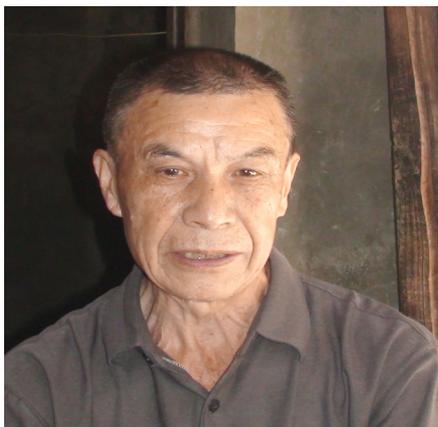
我回来看到，当年的旧房子全部没有了，坟也早没有了，找锄头来挖，什么都没有挖到，只好在当年埋他的地方包了一包土，准备带回去放在买好的骨灰盒里……

胡祖暖：那顿饭我们吃了两个多小时，她还想去走访一下当年的亲戚，住一段时间再走，可是她的两个子孙催着回去。她也没办法，虽然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回来，但还是不得不匆匆走了。

（下面是鲁世洋堂侄的讲述）

我带她去看， 早已没有坟了

讲述人：鲁泽爱
1944年生



我们鲁家以前是个大家族，家谱算下来我家是第三房，鲁世洋属第二房，高我一辈，我叫他叔叔。我爸爸鲁世福在江西当连长，我妈去看过他，她对我说，爸爸是抗日部队，还当抗日游击大队的大队长。她还拿回来了一张照片，我爸骑在一匹大马上，挎一把洋刀。可惜这照片失落了。

鲁世洋就在我爸爸手下当兵。抗战结束后他就回乡了。但是，我爸爸没有回来，也不知道他的下落，是死是活至今没消息。

鲁世洋带了个爱人回来，是个上海人，我叫她婶娘。他们回乡后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鲁泽文，一个叫鲁泽武。

土改时鲁世洋被抓去杀了，就在上面公路旁。他的罪名是土匪。其实他根本没参加土匪，是土匪自己给他安个中队长的名。我们鲁家还有一个也是这样被杀的，他叫鲁世俊，是大房的，他原本是个学生，刚从学校出来，土匪把他拉去给他安个书记官，他也是根本没去，但也把他枪毙了。

鲁世洋被杀后，他爱人带着两个小孩回上海了。十年前她独自一人回来过，那时她都是80多岁的人了，但头脑清楚得很。三年前她又回来了，带着她的两个儿子回来的，这时她都90多岁了，耳朵听不大到了。她还想看她当年的老房子，我对她说，已经没有了，老房子全部拆完了。她还回忆她老屋后面那一片竹山。我带她去看她老公被枪毙的地方，我说，后来开路，坟都被挖了。其实，也谈不上是坟，当时是挖点土掩盖到就完了。他家的情况我妈妈最清楚，她也给我说了不少，她已经过世了。

土改时，二房除了鲁世洋，其他几个：鲁世蒸、鲁世荫、鲁世全都被枪毙了。大房的鲁柏涛是中平的乡长，但他没被枪毙，动员两个乡的农民来斗他都斗不起来，为啥？因为他是个好好先生，一个善人，群众对他没得意见。没有杀他，只把他判了个劳改，他劳改几年后回来，活到前几年才死

我们是鲁家的第三房，也是较穷的一房，没什么财产和势力。按我家的田土和人口算，我们划为中农，所以，土改我家没挨整，不像大房和二房，遭得惨。

大房、二房的人被枪毙，财产被收缴后，他们的儿女们都流落出去了。他们没得饭吃，家也抄完了，只得跑出去。比如鲁世凡家的鲁泽川，他爹妈死时，他才几岁，他讨饭到秀山，后来抱给人家了。鲁世仪家的鲁泽富，也是抱给别人的。多年来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直到前些年他们长大成家了回来认祖大家才联系上。三房中只有我们这房还没得出去讨饭的。

但是，在土改复查时，又把我家评成了地主！

原因是，我家有一个亲戚叫鲁平（音），他爹妈死得早，死时两个小孩才几岁，于是我们就帮他家经营。土改复查时，农会把他家的田也算在我家头上，于是把我家也评成了地主。

就是这顶地主帽子把我压住了，否则我哪里还在这儿呆着！

采访时间：2017年7月6日；7月9日

地 点：秀山县石耶镇半边街；中平乡中寨

采访后记

刚到秀山不久，胡祖暖就带我去看一个当年的刑场——离他家约20里的中平乡中寨刑场。刑场就在公路边，是山坡里一块不大的平地。胡老人说，当年这儿一次枪毙了13个人，他专门赶来看到了那一幕。他还走到刑场草丛中说，有一个上海女人在这儿包了一包土回去，因为她丈夫被枪杀在这儿。

当时，我因为不知道这个故事，因此没有特别在意。后来得知了这场生死之恋，感动之余，我又专程来到中寨，查看当年她奔跑到刑场的那一坡山路，寻找鲁家后代的知情者。

还算幸运，找到了鲁世洋的表亲鲁泽爱，不仅得知了一些有关信息，而且还看到了族谱上关于鲁世洋的记载（由于他是被作为反革命枪杀的，至今没有获得平反，因此族谱上没有写他的死因，甚至连死亡日期都没有记载。）

采访完鲁泽爱之后，我又来到那片刑场，此时，我的感受同几天前完全不同了。

66年前的一个夜晚，一个年轻女人，在这儿抱着一具破碎的遗体，与他度过了最后一夜……

3年前的一个白天，一个苍老妇人，在这儿挖起一捧泥土，带走了她永恒的遗恨和思念……

第一次刚到这儿时，天，突然落下大滴大滴的雨点；第二次来时，云淡风轻，四周一片寂静，刑场上的凄凄芳草，在风中悄无声息地随风摇曳……



鲁世洋遇难地（中平乡中寨刑场旧地），他生于1918年，遇难时33岁